

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

本书揭开了20世纪中期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关系的迷雾，展现了斯大林对印度尼西亚乃至整个亚洲的战略思考。

斯大林和印度尼西亚

1945~1953年苏联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
不为人知的一页

COLD WAR



(俄)叶菲莫娃 / 著 吕雪峰 /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丛书

斯大林和印度尼西亚

1945~1953年苏联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不为人知的一页

(俄)叶菲莫娃 著
吕雪峰 译

Copyright © 2004 by Moscow St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МГИМО) и Efimova Larisa Mikhailovna (Ефимова Л.М.)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World Affair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大林和印度尼西亚：1945~1953年苏联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不为人知的一页 / (俄罗斯) 叶菲莫娃著；吕雪峰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4

(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丛书 / 李丹慧主编)

ISBN 978-7-5012-5189-6

I. ①斯… II. ①叶… ②吕… III. ①苏联对外政策—研究—印度尼西亚—1945~1953 IV. ①D8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455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4-4050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柏英
王勇刚
张琨

书 名

斯大林和印度尼西亚：1945~1953年苏联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
不为人知的一页

Sidalin he Yindunixiya——1945~1953 Nian Sulian Dui Yidunixiya de
Zhengce: Buwei Renzhi de Yiye

作 者
译 者

[俄] 叶菲莫娃
吕雪峰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电 话

010-65265923(发行) 010-85119023(邮购)

投稿信箱

xueshuchuban@126.com

网 址

http://www.ishiz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980×680毫米 1/16 10¼印张

字 数

160千字

版次印次

2016年5月第一版 2016年5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189-6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李丹慧

编 委 (以姓氏拼音排序)

白建才	蔡佳禾	陈 兼	崔 丕	戴超武
邓 峰	黄民兴	李丹慧	刘晓原	罗养毅
牛大勇	牛 军	沈志华	王晓德	夏亚峰
徐 蓝	徐思彦	杨奎松	于 群	余伟民
翟 强	张小明	张曙光	章百家	赵学功

“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

总序

在历史研究中，冷战国际史研究不仅着眼于国际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而且还在这一基础上向外扩展，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内延伸，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影响。故而，就此意义上说，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于国际关系史范畴的新的研究领域。

冷战国际史区别于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特征即在于它的国际性，它是一个国际史。所谓“国际史”，其含义有两个层面，其一在于，无论是学者队伍和史料来源，还是研究对象和观察视角，凡在冷战史的范围内，都不能再以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为中心，而已经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其二则在于，冷战首先表现为以意识形态、制度为分野的分庭抗礼，不同制度的国家卷入其中，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国际斗争，由此引发美苏集团对各地区、民族或国家事务的卷入，除阵营国家外，处于中间地带的各民族国家多分别依附于一方，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与两极国际格局的演变已经融为一体。这种历史现象的内涵与外延，已不是一般的国际关系史所能囊括的了。

1991年，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两德统一为标志，冷战作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即之，以俄国档案的解密为契机，一系列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档案也纷纷见诸于世，加上原有的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定期公开的档案，学者们可以通过大量的一手材料更加真实地描述和解释冷战时期的历史。所有这些构成了冷战史研究在1990年代异军突起的时代机遇。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于1991年率先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随之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或团队。此后，“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便开始流行，并被国际学界广为接受。

当20世纪中叶开始的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相互对抗成为过去，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也即逐渐拉开，各国冷战史学者得以在摆脱冷战环境及其思维定式束缚的条件下，对冷战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冷战的起源，冷战思维对各国决策层的影响，大国关系对国际政治力量改组的影响，小国在冷战格局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及其对两极格局的影响，美苏之间冲突、遏制、对抗和缓和的交替过程，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冷战因素，冷战框架和冷战思维对后冷战时期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影响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进行比较客观的再思考。由此，国际学术界掀起了对冷战历史研究的新的热潮，参与学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课题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文献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等，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几十年的研究。这种新的国际学术潮流，被国际著名冷战史专家约翰·路易斯·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称为“新冷战史”（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近些年来，冷战国际史的新研究日渐深入，其主要学术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众多冷战史研究群构成了国际学者队伍。在美国和西欧，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位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冷战研究项目、以瑞士联邦技术学院安全研究中心为依托的合作安全平行历史项目（The 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Cooperative Security）等，是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冷战史研究中心；此外还有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冷战史研究中心，法国的“欧洲认同、国际关系和欧洲文明”研究所等冷战研究机构。而中东欧各国也几乎都建立了冷战史研究机构，除俄罗斯科学院冷战史研究中心外，经常在国际学界露面的是匈牙利冷战史研究中心和保加利亚冷战研究组。在亚洲，比较活跃的有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韩国参与冷战史研究的主要是韩战研究会和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近年也成立了冷战研究中心，侧重于冷战的东南亚的历史研究。香港大学历史系的美国研究中心经常与各国冷战中心合作举办国际会议，是亚洲冷战研究的主力之一。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组建了一个专门研究冷战时期海峡两岸关系的研究群，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也有冷战史研究小组。印度学者最近也开始加入

冷战史的研究队伍。

2. 档案开放、收集的国际化与多国档案的综合利用。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以第一手的档案文献构成学术论著的叙述主体，不仅如此，这项研究还强调综合利用双边档案或多国档案从事学术考察，以往的冷战史研究，依靠的主要是美国档案，故形成“美国中心论”——冷战史实际上是美国外交史——在所难免，目前，各国档案的开放、收集、整理、翻译及综合利用，已经成为冷战史研究领域首先关注的事情。正是这种档案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化趋势，从根本上突破了“美国中心主义”倾向，使冷战史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国际史研究。

3. 研究者学术关怀的重点集中在历史事实的重建。冷战国际史之所以被称为“新冷战史”或“冷战史新研究”，并不是因为研究者持有相同的、统一的观点，更不在于他们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而是恰恰相反，学者之间在很多观念、概念、定义以及对史料的解读方面，往往存在不同的释义和看法。就学术关怀而言，研究者的共同努力首先和重点在于重新描述历史过程，重新构建历史事实。冷战时代结束后，世界现代史在基本史实的认定方面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档案文献的阙如，冷战双方的研究者无法看到或不想看到铁幕的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学者眼中的历史常常是片面的、虚假的、错误的，甚至是扭曲的或被歪曲的。如今，随着对峙双方档案文献的解密和公布，以及学术研究中意识形态因素的弱化，冷战历史的原貌开始浮出水面。冷战史演进的全过程进入重建阶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各国学者首要的和主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4. 档案交流和专题研究方面的国际合作日益加强。冷战史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趋势，是冷战结束以来各国档案大规模开放的现实促成的，也是其研究领域本身的内涵所决定的。冷战史研究领域的重大专题研讨会，需要多国学者利用多国档案共同参与讨论，如此才能更有效地辩明事实真相，总结历史教训。

5. 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目前，在持续关注冷战起源、苏联与冷战的关系、中美和中苏关系、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诸多热点问题的同时，冷战史学者也开始走出大国关系史研究的光环，注重考察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区的互动关系。

从战后基本同步、并列延伸的冷战和殖民主义瓦解的进程来看，冷战的发展实际超出了东西方对抗的范畴，成为一种更为复杂、更具多元化特征的历史过程。两个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地区争斗的日益激烈，使得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中的冷战对峙和民族独立运动这两大历史脉络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冷战的规模由此拓展至全球。这期间，第三世界扮演的角色不容忽略。只有进一步考察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中的地位和影响，才能使人们更加深刻而全面地了解冷战年代世界格局的内涵，以及在这一总体格局中各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此外，冷战国际史研究还进一步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范畴，把观察的视野转向经济、文化和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冷战”、“文化冷战”、“宣传战—心理战”等研究逐渐兴起，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发展趋向。战后以来，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社会等各类专门史，都不可能摆脱开冷战这个核心；与此相应，研究冷战史，研究国际格局产生和变化的过程，也必须考察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社会等问题，因为正是这些问题与国际关系问题融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冷战时代本身。也只有运用多维视角，才能完全展现出冷战史作为一部国际史的价值和魅力。而就方法论言之，一些学者正尝试着在合理的新历史证据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冷战国际史概念、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而这种做法本来就是冷战国际史研究者所关注的，重新建构历史活动之中的应有之义。

作为冷战中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角色和作用冷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的发展轨迹与冷战进程交织在一起。以此，中国学者在冷战史新研究兴起之初就参与到了这一学术潮流中。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正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新中国对外政策、台海危机、越南战争等一系列冷战史重大课题的研究中，许多中国学者的观点及其所依据的史料都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具备了与国际一流学者对话的能力。因此，与其他学科稍有不同的是，中国的冷战史学科一开始就是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同步的，目前冷战史学界的新趋势也是贯穿在中国冷战史学科发展之中的。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其作为中国学术界新兴学科的地位也已经确立起来。

不过，中国学者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仍然存在着某些不足和需要

改进之处。其一，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仍然是中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大宗产品”，从事其他方面研究的学者比例过低。其二，多国多边档案的互证对比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三，偏重政治、外交和军事史研究，对社会、科学、经济和文化方面冷战的研究尚嫌重视不够。在中国日益崛起的今天，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还须迈出更为坚实的步伐，学者们的视野应该不断“扩张”，探索也应该“面面俱到”。毕竟冷战的历史极其丰富和鲜活，队伍庞大的中国的研究者应当尽可能均衡地关怀和揭示冷战史的方方面面。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的要求。

近年来，“新冷战”（New Cold War）问题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大国之间围绕利益和权力展开的对抗，国际政治中出现的对峙和遏制，似乎重演着冷战年代的是是非非。面对新产生的“世界是否会进入新冷战时代”、“目前国际紧张状态中有哪些因素来自于冷战年代”、“国际局势今后将如何发展和演变”等问题，人们只有通过思考过去的经验教训，才能做出合乎逻辑的解答。由于当代世界的结构性因素和重大国际问题的渊源都与冷战时期密切相关，所以，冷战史研究可以为理解和把握后冷战时期的历史运动规律、应对及管理现实的国际危机，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和战略性评估。这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加强冷战国际史研究，并在学科建设方面将这一研究提高到应有地位的现实意义所在。

有鉴于此，为了推动中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继续拓展和深入，促进中国现代史、世界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以及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选择对外方针提供政策咨询，我们着手编辑并出版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丛书。这套丛书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既有中国学者的最新专题研究成果，也有国外学者的冷战史研究新作，以及口述历史著作。该套丛书将持续编辑出版下去，以期集中反映中外学者冷战史研究的面貌，拓宽中国冷战史学者的思路，开掘冷战史研究的新材料。

我们相信，经过中国学者的努力，中国的冷战国际史学科，必将不断走向成熟；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也必将以其客观、严谨、厚重、创新的学术品质，跻身于世界史林。

“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2012年6月

目 录

总 序 / 1

前 言 / 1

绪论：历史片断 / 8

第 1 章 二战结束阶段苏联对印度尼西亚的态度和苏联关注印度尼西亚的最初迹象 / 17

第一节 苏联关注印度尼西亚的最初迹象 / 20

第二节 殖民地问题和冷战的起源 / 23

第三节 在联合国安理会支持印度尼西亚独立 / 24

第 2 章 苏联和印度尼西亚接触的缘起 / 26

第 3 章 苏联派驻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第一批记者 / 33

第 4 章 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建交的具体步骤 / 47

第 5 章 国际青年运动中的印度尼西亚问题 / 56

第一节 加尔各答东南亚青年会议（1948 年 2 月） / 58

第二节 东南亚国家青年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 / 60

第三节 加尔各答会议前夕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委员会的印度尼西亚

之行(1947年5~6月)/63

第四节 1948年2月加尔各答青年会议的工作及其结果/69

第6章 慕梭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新道路》的制定/77

第7章 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关系的建立/101

第8章 斯大林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复兴/114

第9章 斯大林和艾地/128

结 论/148

前言

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关于印度尼西亚我们所知甚少，对这个国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在与斯大林的多年接触中我不记得有过任何一次谈话、哪怕是唯一的一次提到过印度尼西亚。他对这个国家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我无法说出斯大林对这个国家的情况具体知道些什么。在我掌权时期，苏联领导层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谈起过那里的人民。”^①

但是，不久前对研究者开放的国家档案文件（其中包括斯大林时期的档案文件），完全驳斥了赫鲁晓夫的观点。档案文件表明，尽管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中不占主导地位，但斯大林本人并且通过政府机构还是对这个国家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

本书是对不久前对研究者开放的联共（布）——苏共中央档案、苏联外交部档案和斯大林档案进行研究的成果。其时间段涵盖 1945 ~ 1953 年苏联对印度尼西亚政策的开始、建立和发展时期。

^①（苏）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回忆录》，《历史问题》1994 年第 10 期，第 87 页。

可供研究的档案资料包括联共（布）中央机关（尤其是国际部）、苏联外交部、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青团中央和其他一些涉及 1945 ~ 1953 年苏联和印尼关系的机构的内部和部际之间的秘密和非秘密的通信文件。无论是从时间顺序的角度还是从信息量的角度来看，供研究者使用的文件非常分散，不连贯的情报无法完整而全面地描绘事件。尽管如此，这些文件还是打开了苏联和印尼关系历史上新的一页，帮助我们以新的视野来审视苏联和印尼关系建立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因素。

历史文献

20 世纪 90 年代前，涉及阐述苏联和印尼关系这个课题的国内外史学著作都具有片面性。苏联对 1945 年 8 月 15 日宣布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政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建立的条件形成的。该体系的主要特征是冷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体系（其中首先是美国和苏联）之间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抗，每一天、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全方位的”的对抗和竞赛，美国和苏联都想统治世界，因此，一方任何微小的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进展都被另一方看作挫败。

亚洲成为两大体系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的场所。激烈的对抗和竞赛渗透了苏联和西方国家在这一地区的所有政策。因此，西方学者使用“冷战”这一术语来描述苏联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关系以及苏联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与此相反，苏联学者努力强调苏联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无私援助和支持，完全忽视了冷战在苏联和印尼关系形成中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的任务之一是揭示冷战对苏联对印度尼西亚政策的影响程度和性质，揭示冷战对苏联和印尼关系整体上的影响程度和性质，揭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政策在亚洲冷战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研究冷战的学者对二战后苏联对外政策动机进行了讨论。揭示苏联对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政策形成因素和出发点，对于这一讨论会有所裨益。

一些西方研究者坚持相当“传统”的观点，认为战后苏联对外政策（包括它的亚洲政策）都植根于——如美国学者小施莱辛格（Schlesinger A. M.）指出的——“列宁的弥赛亚思想和斯大林的极权

妄想”。^① 这样的回答忽视了冷战形成和发展的复杂性，只强调苏联的强硬、斯大林主义的残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密谋。^② 一些西方的印度尼西亚学专家在描述苏联对印度尼西亚政策时都倾向于类似的极端观点，如布雷克曼、范登堡、巴特维尔、汤普森、阿多夫、科鲁夫。^③

其他一些学者持较温和和审慎的观点。他们关于苏联对印度尼西亚政策的很多阐述也不尽相同。著名的冷战问题专家帕特森指出，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学者“把共产主义对手妖魔化成它从未有过的样子，把它描绘得具有某种其实从未有过的力量，揭露它从未实施过的所谓可怕阴谋，谴责它从未犯过的罪恶，把它描写成完全不是那样的独裁国家，捏造它从未实现过的成就”。^④ 这一领域有代表性的印度尼西亚学研究者有卡欣、麦克威、辛德利^⑤等。

不管怎样，无论是哪个学派的学者都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点：他们的推理没有足够多和足够有说服力的文件证明。他们的论点可能是正确的，但没有证据，其史料基础局限在二手文献上，他们挖掘了苏联媒体、官方演讲和其他类似的史料。

说说国内的研究。其中确实有以档案为基础的详细研究。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著作的作者不可能正确地强调什么，而是

① Schlesinger A. M., Jr.,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NO. XL VI, October 1967, pp. 22 - 52.

② Almond G. A.,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0, p. 18.

③ Brackman A. C., *Indonesian Communism. A History*, New York: F. A. Praeger, 1963. Thompson V. and Adloff R., *The Left Wing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Sloane, 1950. Vandenbosch A. and Butwell R. A., *Southeast Asia among the World Powers*,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58. Krouf J. 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65.

④ Paterson T. G., *Meeting the Communist Threat / Truman to Reag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IX.

⑤ Kahin G. McT.,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3. Ruth T. McVey, *The Soviet View of the Indonesian Revolution (Interim Report Series,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Southeast Asia Progra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McMahon R. J., *Colonialism and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onesian Independence, 1945 ~ 1949*, Ithaca and Lond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Donald R. Hindle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1951 ~ 1953*,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被迫遵循官方的观点。^①现在，随着苏联档案对广大研究者部分（不是全部！）开放和书报检查制度的废除，更正和接近真理的时候到了。

史料基础

本书以俄国档案文件为基础。首先是联共（布）—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文件和资料。该部1948年7月前被称为“对外政策部”，1949年3月前被称为“对外联络部”，1952年10月前被称为“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这些文件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1917～1952年）档案馆和当代文献保管中心。

在这些档案馆中发现的涉及印度尼西亚的文件以及本书的其他主要文献，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外政策部部门内部的通信，尤其是东南亚司的工作人员同高层官员之间的通信。这些文件包括报告、情报、证明及随文附信。所有这些文件都是绝密文件，不久前才对研究者开放。这部分文件使我们得以考察苏联政府和联共（布）在涉及印度尼西亚形势和该国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时制定和形成观点的过程。

第二部分档案文件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慕梭（Musso）收集的情报材料。这是慕梭在莫斯科逗留末期和由苏联返回印度尼西亚的漫长途中（1948年4～8月）所写的说明以及致联共（布）中央的信件。这部分档案文件非常清晰地展现了慕梭在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基本问题上的观念，同时有助于我们考察他如何看待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荷兰共产党在印度尼西亚问题上的立场。

第三部分是与荷兰共产党^②相关的文件。这包括联共（布）中央国际部关于荷兰共产党的报告，荷兰共产党领导人保罗·德·格鲁特（Paul de Groot）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联共（布）的信，1948年秋联共（布）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同荷兰共产党领导层的会谈记录。这些材料可以使我们厘清与三个共产党——联共（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①（苏）阿列申：《1945～1962年的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关系》，莫斯科：1963年。（苏）绍尔莫夫：《苏联和印度尼西亚：1945～1954年》，莫斯科：1976年。（苏）扎罗夫、康德拉什金：《苏联和印度尼西亚的友谊与合作》，莫斯科：1961年，第348—382页。（苏）马列金：《印度尼西亚对外政策，1945～1969年》，莫斯科：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79年。

^②在所研究的档案文件中称为“荷兰共产党”。稍后该党被称为“尼德兰共产党”。

和荷兰共产党之间关系有关的许多重要问题。

上述档案文件均首次应用于学术研究领域。

联共（布）—苏共中央档案文件中单独有一部分是给苏联代表团（主要是青年代表团）的指示以及这些代表团关于所做工作的报告。这些材料展现了苏联代表在国际舞台上的真实目的和内幕。

毫无疑问，与印度尼西亚相关的斯大林档案文件具有特殊意义和重要性。这包括一些斯大林用“菲利波夫”署名寄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加密电报、斯大林本人写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的信件，苏联领袖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性文件所做的大量批注。这些文件表明，莫斯科和斯大林本人并未无视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件和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

在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中有大量与所研究时期苏联和印尼关系相关的文件。以前处于保密状态的、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全宗091”文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莫洛托夫秘书处档案（全宗06）和维辛斯基秘书处档案（全宗07）中也有一些涉及印度尼西亚的材料。上述提到的这些资料是苏联外交部内部的来往文件、苏联大使的报告、外交部领导人的日记以及呈报给联共（布）—苏共中央核准的决议草案。依据这些材料可以考察决议通过的机制、部内的意见分歧和协调方式。其中大部分档案文件也是首次应用于学术研究领域。

反映二战期间苏联在印度尼西亚问题上的立场的文件已经部分刊登在《史料》杂志上，并被研究这一时期外交的苏联学者进行了分析。^①

研究目标和任务

尽管“1945～1953年苏联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政策”这个研究题目无论是在问题范围上还是在时间断限上都比较窄，但对所列文献进行研究使我们可以重新诠释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大问题以及蕴含其中的意识形态。

苏联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关系是苏联史学作品和政论作品最受喜爱的主题之一。这一关系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劳动人民无私同情

^①（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文件》，《史料》1995年第4期。

和友情援助亚洲人民反资本主义剥削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辉榜样，同时，作为回应，摆脱殖民枷锁的亚洲人民在反西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斗争中对苏联人民和盟友致以谢意。

文件揭穿了 20 世纪关于苏联的一个谣传，例如，苏联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是从社会主义自身属性出发，而不是基于国际政治形势的研判，即摆脱殖民依附的亚非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天然盟友，不是利用冷战来谋取私利。

档案文件帮助我们弄清楚在亚洲、首先是在这个大陆的边缘地区东南亚冷战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相关研究较少，因为直到目前历史学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东北亚地区。研究这些材料对于深入了解共产主义思想在亚洲冷战加剧中的作用也有意义。

披露的档案有助于我们考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阶段和战后初期印度尼西亚在苏联亚洲政策中的地位、斯大林是否明确构想过在亚洲这一地区（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的国际政治纲领。这些文件揭示了苏联在制定对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政策动机，帮助我们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支援印度尼西亚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是二战前共产主义扩张（在二战过程中这种地缘政治取向得到强化）的继续，抑或苏联在印度尼西亚的措施是苏联、西方国家和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相互碰撞的错综复杂的结果？这也有助于考察印度尼西亚卷入冷战的过程。当谈到亚洲冷战时，通常援引与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相关的事件。^① 印度尼西亚也可以成为冷战在亚洲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发展的直观例证，因为这个国家从独立伊始就成为苏联和西方大国争夺影响力最为激烈的场所。档案材料还呈现出苏联领导层通过关于印度尼西亚问题决议的机制，印度尼西亚事件情报在苏联的公开范围，苏联领导人对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解。档案文件引导我们关注冷战中令人感兴趣的、但研究较少的一个方面：亚洲领导人——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如何利用东西方对抗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

本书研究了斯大林时期即 1945 ~ 1953 年苏联对印度尼西亚政策的主要阶段和走向。开始于印度尼西亚独立，结束于斯大林逝世和苏联

^① LaFeber W. Wiley ed., *The Origins of Cold War 1941 ~ 1947: a Historical Problem with Interpretations and Documents*, 1971.

政治体制变化，由此导致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在对待两国关系上出现了新的态度。上述时期斯大林负责领导全国，包括对外政策，本书的书名由此而来。要知道，正是斯大林确定了对外政策的主要方针和行动，自然，也涉及苏联印尼关系。

本次研究不打算系统全面地阐述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国内外的史学研究已经充分阐述了其中的基本事实和事件。笔者给自己定的任务是：用新的首先是以前未知的史料补充、论证、明确或驳斥现存观点和看法，强调一些东西，揭示一些细微差别。

本书的结构是依据笔者接触到的、能够阐明苏联印尼关系史的系列档案文件来安排的。专著中所引用的档案文件，除极少数文献外，均是首次应用于学术研究领域。

绪论：

历史片断

现代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坐落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群岛。它不仅是亚洲大国之一，也是全世界大国之一。印度尼西亚领土（包括内海）从西到东的距离相当于欧洲从西到东的距离。印度尼西亚的人口数量在世界上排第四位，在中国、印度、美国之后。

从古时起，罗斯就已经知道了印度尼西亚群岛及其民族的存在。编年史家、基辅佩切尔修道院僧侣涅斯托尔在 11 世纪编撰的《往年纪事》中写道，在遥远的边缘地区有一个神奇的岛国——印度尼西亚。俄国旅行家、诺夫哥罗德商人阿法纳西亚·尼基京在日记《三海行记（1466 ~ 1472 年）》中提到，在东南亚有个神秘的沙波特国家，一些学者把它视为印度尼西亚王国。^①

印度尼西亚民族拥有非常丰富和光荣的历史，曾建立过几个大的王国——室利佛逝、麻喏巴歇、马打蓝。但是，从 15 世纪末开始印度尼西亚群岛成为殖民扩张的对象，开始是葡萄牙和西班牙，随后

^①（苏）绍尔莫夫：《早在基辅佩切尔修道院时期了解到的印度尼西亚》，《国际生活》2000 年第 6 期，第 100 页。

是英国和荷兰（尼德兰）。17世纪，荷兰在印度尼西亚领土成功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命名为“荷属东印度”。

尽管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阻碍了群岛居民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往来，但关于遥远的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消息还是传到了俄国。18—19世纪，俄国船队不止一次到达过这个地区，同沿岸各城市进行贸易，从事科学考察。俄国驻海牙、布鲁塞尔、君士坦丁堡、伦敦的外交代表向彼得堡报告了关于印度尼西亚的形势。1894年，俄国在荷属东印度首都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正式建立了第一个领事馆，由著名的社会政治活动家巴古宁领导。1870～1880年，著名学者密克鲁哈-马克拉曾到过印度尼西亚。

罗曼诺夫王朝的成员没有忽略对荷属东印度的关注。1890年，皇储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舰队在巴达维亚停靠。1911年，鲍里斯·弗拉基米尔大公到过巴达维亚。^①但是，沙俄政府并没有对东南亚地区表现出特别的政治兴趣。

从西方国家殖民征服伊始，印度尼西亚人民就对外来侵略者进行了顽强抵抗。20世纪初，民族解放运动开始采取现代组织方式。

殖民地的反帝运动引起了欧洲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它的左翼的关注。列宁的观念是：正在腐朽的资本主义从殖民扩张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自然，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将瓦解资本主义和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在著名的文章《亚洲觉醒》中，向爪哇的反帝运动致以敬意，怀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人民群众打着伊斯兰的旗帜参加了运动，生活在那里的欧洲知识分子和中国居民参加了运动。列宁指出，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正密切关注着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②

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关注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联盟成立以后。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联盟不仅是印度尼西亚，也是整个亚洲殖民地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联盟是由生活在殖民地的荷兰知识分子团体建立的。^③联盟的右派支持荷兰社会民主工党，而左派支持社

①（苏）绍尔莫夫：《早在基辅山洞修道院时期了解到的印度尼西亚》，《国际生活》2000年第6期，第101页。

②《列宁全集》，第23卷，第145—146页。

③（俄）别林斯基：《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5年，第245—246页。

会民主党。两派都是第二国际的积极参与者，在第二国际中，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党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国际格外关注社会民主党人中在殖民地问题上存在的分歧。社会民主工党不仅反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殖民主义政策开展原则性的斗争，因为殖民改善了宗主国工人的状况，同时还赞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保留殖民地，因为该党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发达国家实现，而殖民地居民需要欧洲的文明。^① 社会民主党人持更为激进的观点。该党认为，欧洲人和印度尼西亚劳动人民拥有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必须与之一起斗争。但社会民主党把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革命混同在一起。据此出发，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联盟左派把在人民群众中宣传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作为自己的任务，提出了反帝、革命的口号。^② 在此，关于荷兰同印度尼西亚中断联系的问题还没有被明确提出和研究过。虽然左派支持印度尼西亚摆脱殖民压迫的斗争，但认为争取独立的斗争同阶级斗争相比是次要任务，对民族自决问题也关注不够。不仅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持这样的观点，就连那些加入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联盟的印度尼西亚人也是如此，例如最早加入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联盟的印度尼西亚人西曼（Semaun）。他不打算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让印度尼西亚彻底脱离荷兰。他认为，民族的社会主义运动太弱了，如果印度尼西亚脱离了荷兰，那么，掌握国家政权的要么是民族资产阶级，要么是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或英国——的资产阶级，将迫使印度尼西亚再次走上资本主义道路。^③

1917年，在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联盟内的印度尼西亚人——如西曼、达尔索诺（Darsono）同荷兰人发生了分裂。前者退出了社会民主联盟，建立了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印度尼西亚支部。左派继续留在社会民主联盟内。退出的成员都是荷兰人，因此，在他们离开后印度尼西亚人在社会民主联盟内的比重大幅提高，包括在组织上和在领导层中。西曼成为领导人之一。

①（苏）别林斯基：《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5年，第248页。

② Ruth McVey,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1965, p. 15.

③ *Ibid.*, p. 32.

直到1917年以前，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联盟都没有自己的纲领。同右派领导层分裂后，社会民主联盟使用了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章程，其中包括荷兰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埃尔福特纲领。^① 纲领中详细谈到殖民剥削问题时这样写道，外国的资本主义把当地的绝大多数居民变成了失去生产工具和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由此出现了工业无产阶级和种植园无产阶级。但是，在文件中完全没有提及印度尼西亚农村存在的剥削和封建主义残余，没有提出符合农民利益的农业问题要求。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联盟领导人不认为本国是殖民地，号召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论证说，民族运动既没有能力改变剥削性质，也没有能力改变剥削程度，印度尼西亚的解放可以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途径实现。1918年的社会主义民主联盟纲领明显展现了欧洲首先是荷兰社会民主党对印度尼西亚领导人的影响。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建立后，苏联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由于印度尼西亚是荷兰的殖民地，苏联与之没有国家层面的关系。但是，苏联领导人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范围内的接触迅速增多。

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和协调中心建立于1918年。它把全世界的左派政党和组织都团结起来。许多共产党甚至宣布自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以此强调自己同国际共产主义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共产国际总部位于莫斯科，这为同苏联领导层联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随着共产国际的建立，荷兰社会民主党宣布变更为“荷兰共产党”。^② 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人以其为效仿的榜样。1920年5月23日，社会民主联盟宣布自己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西曼任主席，达尔索诺任副主席，有几位荷兰人加入了领导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为苏联边界之外的整个亚洲的第一个共产党。

前印度尼西亚民主联盟领导人、荷兰人斯内夫利特（Sneevliet）^③

^① （苏）别林斯基：《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5年，第301—303页。

^② Ruth McVey,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1965, p. 46.

^③ 即马林。——译者注

和巴尔斯 (Baars)^① 被殖民当局驱逐出印度尼西亚，开始成为荷兰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工作。他们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那里获得了在这个共产党人联合体内代表印度尼西亚利益的全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通过斯内夫利特和巴尔斯与荷兰共产党保持着联系。1920 年 12 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宣布自己是该组织的支部。此时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无论是在理论纲领上还是在实践活动上都保持着独立性，有时会与共产国际路线发生严重分歧。

例如，共产国际批评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在对待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继续执行荷兰共产党人从欧洲大陆实践出发制定的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路线，在应用于印度尼西亚时把民族主义等同于异己，对其他民族一律持敌视态度，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对民族主义运动也持否定态度。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坚定地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认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不是自己的主要目标。由于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软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得出结论：必须把民族解放运动和阶段性的阶级斗争统一起来，直接目标是在印度尼西亚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②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存在分歧的另一个问题是：农民及其在东方革命中的作用。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纲领号召亚洲共产党人根除大土地所有制和平均分配给农民，争取他们支持革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认为，这个纲领在印度尼西亚不适用，因为这里没有大土地所有制，而是村社所有制。^③

总体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层认为，加入共产国际后不需要改变自己的纲领，因为莫斯科活动家对印度尼西亚局势的了解未必比自己更好，在加入共产国际以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拥有足够丰富的反帝革命斗争经验，因此，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表示，在“莫斯科之手”出现之前，他们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坚持了共产主义路线，在加入共产国际后没有做任何

① 巴尔斯 (1892 ~ 1943)，荷兰人，1915 年到荷属东印度任工程师，后从事反殖民主义宣传工作。1921 年到莫斯科，同年到柏林担任苏俄驻柏林商务代表。——译者注

② Ruth McVey,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1965, pp. 61 - 62, 65.

③ *Ibid.*, p. 74.

改变的必要性。^①

1924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通过了新纲领。党的领导层强调说，这已经不是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荷兰党员协商后批准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了，而是在没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的荷兰党员参与下制定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纲领。但是，这份纲领在实践中没有背离1918年的纲领。在新文件中突出强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指出，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来讲主要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民族解放斗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层重点关注城市工人阶级，尽管民众对荷兰人持敌视态度，共产党领导层还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不准备如此反对荷兰。^② 这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和先前一样深受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而欧洲中心主义是他们从欧洲人——首先是荷兰人、社会民主党人，后来是共产党人那里借用的。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工作和争取农民的重要性，而农民恰恰是印度尼西亚劳动人民的主要组成部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轻视本国人民追求民族解放的强烈心理，他们希望立即带领人民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同时不割裂印度尼西亚同荷兰之间的密切联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这些有代表性的世界观在二战以后仍继续存在。

应该指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战略和策略问题上仍有其独立性，尽管共产国际不止一次地批评过它的左倾错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仍坚持自己的路线。这种独立性和坚持自己的、独特的路线的努力，成为群岛共产主义运动的鲜明特征。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共产国际及其附属组织——如红色工会国际（又称“国际工会联合会”）、农民国际（农民国际联合会）的活动。被印度尼西亚殖民当局驱逐出境的共产党人，既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组织部门工作，也在设在欧洲和亚洲的办事处工作。西曼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陈马六甲（Tan

^① Ruth McVey,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1965, p. 48.

^② *Ibid.*, pp. 188 - 190.

Malaka)^①、阿利敏 (Alimin)^②、达尔索诺 (Darsono)^③、慕梭^④和其他一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曾多次前往莫斯科。这为苏联领导人同印度尼西亚代表之间的接触创造了良好条件。

1920年苏联领导层在东方的关注中心是中国，那里爆发了革命，还有印度，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破坏了资本主义堡垒（例如苏联在欧洲的主要敌人之一英国）的根基。印度尼西亚远离苏联国界，从属于二流资本主义国家荷兰，因此，处于苏联对外政策关注的边缘。但是，苏联领导人经常尽可能多地了解关于印度尼西亚的形势，但不存在同殖民地的国家层面接触。对苏联领导层来说，关于印度尼西亚情报的唯一来源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荷兰共产党人，他们同遥远的殖民地保持着定期联系。但是，通过这一渠道获得的消息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和不客观的，而在苏联没有可以对这些情报进行分析和辨伪的地区研究学者和专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苏联领导层开始组建东方学研究中心，东南亚地区进入研究中心关注的范围。在研究中心的工作中，印度尼西亚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从这一中心成长起来第一批印度尼西亚学学者，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古贝尔院士。还建立了一系列为东方国家共产党人培训革命领导人的学校。一批印度尼西亚杰出的活动家——陈马六甲、阿利敏、慕梭等曾在这些学校中学习过。

需要强调一下，科学研究和培训中心都是处于斯大林领导的人民委员会民族事务部的监管下。1924年人民委员会民族事务部撤销后，这些机构转交给联共（布）中央监管，仍处于斯大林的领导下。印度尼西亚人（包括培训学校的学生和共产国际各机构的工作人员），同时从事收集本国情报，研究荷兰、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外媒体，为共产

① 陈马六甲（1896～1949），又译作“坦·马拉卡”，华裔，又名王松利、陈昆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和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之一，1963年革命后被迫授印度尼西亚英雄称号。——译者注

② 又译作“阿里阿罕”，原名马斯·普拉沃依洛戴鲁乔·阿明（1896～？），印度尼西亚人，曾化名王大才、张然和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译者注

③ 达尔索诺（约1897～？），印度尼西亚人。青年时期参加反对宗主国荷兰的殖民统治，是伊斯兰联合会创建者之一，后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1920年参与创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译者注

④ 慕梭（1898～1948），印度尼西亚和国际共运活动家，1948年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8年起），1923年加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1948年在“茉莉芬事件”中牺牲。——译者注

国际领导层——其中联共（布）中央的代表起主要作用——准备情报以及情报分析。受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的委托，他们为共产国际的出版物撰写文章和小册子。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同苏联领导人保持着直接联系。例如，西曼曾与列宁会晤过。尽管没有关于他和斯大林直接会面的证据，但众所周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及其执委会的框架内参与了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讨论，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也会积极参加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这样的话，斯大林就不可能不了解东南亚的事情，包括荷属东印度的事情。

但是，共产国际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之间的主要联络还是通过荷兰共产党。被驱逐出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定居在荷兰，在荷兰共产党组织内工作，他们都精通荷兰语。印度尼西亚通过商船上的印度尼西亚海员与荷兰共产党人保持经常联系。从西曼抵达荷兰起，这个国家就成为印度尼西亚在欧洲的活动基地。但是，荷兰共产党关于殖民地局势的信息并不全面，有时荷兰共产党人对事件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常常从欧洲的立场出发分析事件。同时，荷兰共产党还努力严格看管和领导自己的“小兄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度尼西亚人不喜欢这样，时常与荷兰同志发生争吵。不过，荷兰共产党仍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伙伴，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思想观点起到非常大的影响。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层不顾共产国际的建议，自主决定在1926~1927年发动劳动人民进行反荷兰帝国主义者的起义。显然，这一时期中国发生的革命推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迈出了这一步。尽管对荷属东印度在时间不合适和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发动武装起义持反对态度，但共产国际还是表达了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同情，对殖民者的镇压措施予以谴责。印度尼西亚劳动人民遭到残酷镇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被禁止合法存在。共产党人被关进监狱或流放。为数不多的领导人在欧洲首先是苏联找到了避难所。

1928年召开了共产国际六大会议，在这次会议的决议中建议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重建政党并加强在工人和农民中的工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层尽可能接受了这些建议。1932年，处于地下状态、起义后尚未恢复元气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通过了新党纲。新党纲基本上具有民主主义性质，但在涉及独立和在印度尼西亚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

时仍存有先前左倾观点的余波。^①

1935 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会议要求第三国际各支部必须密切注意在东西方正在兴起的法西斯主义以及与之相伴的战争危险。1935 年上半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遣其成员慕梭返回印度尼西亚重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把党建设成为全民族的党，并使之有能力充当反帝斗争先锋队。^② 慕梭成功地建立了地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核心，出版秘密杂志。但是，慕梭离开后的 1936 年秋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遭到荷兰警察镇压。大部分党中央委员被逮捕或流放。共产国际和苏联同荷属东印度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中断了。更不幸的是，1943 年共产国际解散。但是，许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流亡到苏联，同苏联领导人和机构积极合作。

① （苏）德鲁戈夫：《共产国际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共产国际与东方。评论者的批评》，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8 年，第 358 页。

② 同上，第 366 页。

第1章

二战结束阶段苏联对印度尼西亚的态度和苏联关注印度尼西亚的最初迹象

二战前夕苏联同日本之间在远东地区发生过武装冲突（1938年哈桑湖冲突和1939年哈勒欣河冲突）。为保障苏联远东边界安全，斯大林努力让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指向南方的海洋方面。^①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又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后，斯大林和先前一样认为，南海（包括印度尼西亚）应该是日本的势力范围。这一观点反映在1940年11月9日斯大林关于同希特勒就德国和苏联在欧洲和亚洲势力范围以及就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进行谈判给莫洛托夫下的一系列指示中。莫洛托夫在亲笔记录的指示中写道：“我们不反对承认印度尼西亚是日本的势力范围。”^②

①（俄）丘耶夫编著：《帝国的士兵。对话，回忆，文件》，莫斯科：方舟出版社，1998年，第324页。

②（俄）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一个不受欢迎的见证者的笔记》，莫斯科：盖亚出版社，1996年，第495页。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德国对荷兰不宣而战，荷兰政府领导人流亡到伦敦。5月14日，荷兰军队投降。国内建立了法西斯“新秩序”。荷兰共产党被禁止存在，被迫转入地下。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夏威夷美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二战爆发初期，苏联没有参加太平洋战争。早在1941年4月时苏联同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斯大林指望日本把侵略矛头指向西方在东南亚的殖民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荷属东印度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被日本占领，被纳入“大东亚共荣圈”。驻守在殖民地的荷兰军队投降，殖民当局官员逃往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处于日本军阀的统治之下。

在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及其盟友的伟大卫国战争中最艰难的时刻，希特勒军队攻到了莫斯科，兵临列宁格勒，深入苏联南部地区，苏联政府开始制定战后秩序的基本原则。关于印度尼西亚在苏联战后亚洲政策的目的和计划中的地位，对于理解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亚洲的政策以及研究两大对抗体系在印度尼西亚地区“冷战”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在不久前公布的档案文件中可以发现关于战后世界秩序的基本构想。1942年1月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П 36/87号决议《关于东欧、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战后体制安排方案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收集和整理关于战后世界体制的材料，包括重新确定殖民地、托管地和势力范围。任命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为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的助理、一些著名外交官以及经济学家兼国际关系专家瓦尔加为委员会成员。^① 依据地区原则对委员的工作进行分工，责成每名成员研究某一国家或某一组别国家的材料，对涉及该组别国家的问题进行汇总。太平洋群岛和东亚委托给著名外交家洛佐夫斯基和乌曼斯基。他们提交的报告和建议目前还未对研究者开放。

1943年9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П 41/223号决议《关于建立和约与战后重建问题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著名外交家李维诺夫领导，一些学者和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参加该委员会。^② 到

^① （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文件》，《史料》1995年第4期，第116—117页。

^② 同上，第118页。

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前夕，苏联战后安排的纲领形成了一套具体建议。这些建议首先体现在1943年9月9日李维诺夫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报告中。报告中列举了他领导的委员会将要研究的问题并请求批准这一问题清单。^①关于殖民地问题收录在总共34个章中的第26章。第26章由7点组成。第一点涉及殖民地共性问题，其余是关于各个殖民地。第二点是关于英国殖民地，第三点是关于法国殖民地，第四点是关于意大利殖民地，第五点是关于比利时殖民地，第六点是关于荷兰殖民地，第七点是关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②报告对一些章节进行了必要的解释。关于第26章的解释指出，其中仅指不被日本占领的殖民地，^③因为当时苏联未对日本宣战，也没这个打算。

关于苏联领导层对日本在占领的殖民地（包括印度尼西亚）的忽视，另一位著名外交家迈斯基在1945年1月11日提交给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报告《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中有解释。这位颇具影响力的外交家在报告中谈了自己的意见，以供在最后制定苏联关于战后世界重建的立场时使用。^④报告由24章组成，其中第17章是关于日本的。迈斯基认为，苏联对同日本作战没兴趣，但对灭掉日本感兴趣并准备把这份“荣耀”让给英国人和美国人。他强调苏联得到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的必要性，但只字未提被日本占领的殖民地。^⑤迈斯基报告的第18章专门谈殖民地问题。迈斯基直接写道：“苏联不会直接关注殖民地问题。”但他认为，在战后调解过程中苏联必然会遇到这个问题。他以荷属东印度为例指出：“战后这一地区的未来还是一团迷雾”，他在括号中指出，“美国人对该地区将会有所企图”。^⑥迈斯基在通报美国关于成立由美国、英国、苏联、荷兰和其他大国组成的国际“同盟”以利用荷属东印度和马来亚自然资源的想法时也提到了荷属东印度。他接着写道：“毫无疑问，殖民地问题是战后重建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个问题研究很少。必须立即启动这项工作。”^⑦

①（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文件》，《史料》1995年第4期，第119页。

② 同上，第120页。

③ 同上，第123页。

④ 同上，第124—144页。

⑤ 同上，第133—134页。

⑥ 同上，第136页。

⑦ 同上。

1945年1月10日，在雅尔塔会议前夕，李维诺夫起草的《关于同美国的关系》报告中也强调了苏联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李维诺夫写道：美国战后的目的之一是在贸易、市场、投资等方面“打开大英帝国的大门”。殖民地问题可能成为苏美合作的基础，如果苏联支持美国的这些（反殖民主义——作者注）行动。^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阶段苏联领导层对殖民地问题和日本占领的殖民地，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荷属东印度——作者注）关注较少，这是雅尔塔会议势力范围划分的结果。太平洋地区和日本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南亚和东南亚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东北亚是苏联的势力范围。

苏联和美国都不追求在东南亚拥有势力范围，只对该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持欢迎态度，但并不公开表示支持。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儿子回忆了父亲讲述的同荷兰国王会谈的情况，让荷兰女王朱丽安娜许诺战后赋予荷属东印度自治地位，如果印度尼西亚人民提出脱离荷兰，则给予完全独立。^②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当时都未公开表达过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显然，他们不想在战争结束阶段破坏战争期间形成的反法西斯同盟关系，也不想破坏与其他拥有殖民地国家的关系。

档案文件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很少关注东南亚殖民地（包括印度尼西亚）问题，他们认为当时这一地区在经济上和军事战略上对苏联意义不大。

第一节 苏联关注印度尼西亚的最初迹象

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选择这一时机宣布独立并不是偶然的。日本当时仍继续占领荷属东印度，但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准备向盟国投降，因此，群岛上的日本武装力量军心涣散，而盟国军队尚未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登陆。借这个有利时机成立了

^① Vladimir O. Pechatnov, "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 New Document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 War Relations with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for Scholars", Working Paper, July 1995, No.13, pp. 1, 10 - 11.

^② (美) 埃利奥特·罗斯福：《在他眼中》，莫斯科：国家外文出版社，1947年，第221—222页。

主权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通过了《宪法》，组建了政府和其他政府机构。苏加诺^①任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哈达^②任副总统。这是公认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但按照共产国际的说法，他们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荷兰当局不承认自己的这块殖民地独立。殖民地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之前、在日本占领的条件下宣布独立，荷兰利用这一事实诋毁年轻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被称作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孩子”，而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和日本占领时期领导解放斗争的苏加诺和哈达被痛斥为附敌分子和占领者安插的人。

在可供研究的档案文件中无法找到苏联政府对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和成立共和国的反应。对这一事件没有做出官方反应，大概既因为国际形势复杂（此时苏联在满洲积极展开军事行动以应对日本关东军的猛攻），也因为缺少关于与苏联相距甚远的群岛所发生的事件的可靠情报。

反法西斯盟国军队（主要是英国军队）于1945年9月末开始在印度尼西亚登陆，其主要任务是解除日军武装并遣送回国。早在1945年8月英国同荷兰就签订了协定，根据该协定，英国军队必须将群岛的政权转交给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很快，荷兰军队开始登陆印度尼西亚，而荷属东印度殖民行政机构则由澳大利亚返回雅加达。

荷兰军队同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之间开始出现武装冲突。英荷军队占领了主要城市和爪哇港、苏门答腊港和其他岛屿。只有爪哇中部和东部地区还处于共和国的控制之下。

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年轻的共和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争取国际承认。8月23日苏加诺在广播讲话中强调了这一点。^③为解除日军武装，登陆印度尼西亚的英军统帅克里斯蒂森（Christison）最先承

① 苏加诺（1901~1970），1901年6月6日出生于东爪哇苏腊巴亚（泗水）的土著贵族家庭。致力于民族独立斗争，历任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联盟主席、印度尼西亚党主席、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等职务。一贯主张执行反帝反殖的不结盟外交政策，促进亚非人民的团结合作，1965年“九三〇事件”后，总统权力被军人集团剥夺。1967年3月，被撤销总统职权并遭软禁。1970年6月21日，在雅加达病逝。——译者注

② 哈达（1902~1980），印度尼西亚政治家。他与苏加诺同为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领袖，印度尼西亚独立后任首任副总统，曾兼任总理和外交部长。由于与苏加诺政见不合，他辞去了副总统之职，但仍为印度尼西亚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译者注

③ Raliby O. , *Dokumenta historica*, Djakarta: Bulan - Bintang, 1953, p. 17.

认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的事实存在，并与之进行谈判。^①但东南亚战区盟军副统帅帕特森（Patterson）将军表示，英国不打算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1945年10月1日，荷兰发表了不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声明。^②10月17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证实说，英国政府不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美国声称不干涉印度尼西亚事务。^③1945年10月25日，雅加达刊登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同外部世界关系的公报。文件中强调，准备在承认印度尼西亚人民自决权的基础上同任何国家进行谈判。^④同时，印度尼西亚政府呼吁苏联和其他大国关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件。在可供研究的档案文件中暂时没有发现涉及苏联政府对这一呼吁做出反应的文件。

麦克威指出，在1945年9月12日《真理报》关于英国占领帝汶的消息中，称其东部为荷兰领土，完全没有提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1945年10月24日《真理报》才在说到苏加诺抗击荷兰军队时第一次提到了苏加诺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政府，但是仍称之为荷属东印度。^⑤

外交部文件证实，1945年11月10日，苏加诺致电苏联领导层祝贺十月革命胜利28周年。根据研究材料判断，苏加诺的这份电报没有得到回复。^⑥

可以说，从1945年12月8日起苏联间接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真理报》称共和国总理沙里尔（Syahrir）^⑦为“印度尼西亚总理”，之后，公开称共和国政府为合法的印度尼西亚政府。^⑧

1945年12月，印度尼西亚政治流亡人士联合会在致莫洛托夫的电

① Wolf Ch. , *The Indonesian Story*, New York: John Day, 1948, p. 19.

② Fisher L. , *The Story of Indonesia*,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9, p. 81.

③ Woodman D. ,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London: Cresset Press, 1955, p. 210.

④（俄）尤里·阿列申：《1945～1962年的苏美关系》，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63年，第19页。

⑤ Ruth McVey, *The Soviet View of the Indonesian Revolution (Interim Report Series,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Southeast Asia Progra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57, p. 3.

⑥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2，卷宗3，案卷1，页码7。

⑦ 苏丹·沙里尔（1909～1966），又译“夏赫里尔”，印度尼西亚政治家，是一位激进而又理想主义的人物，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领导人之一，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印尼独立后他成为首任内阁总理，曾三次组阁。“九三〇事件”后流亡海外，客死他乡。——译者注

⑧ See ⑤.

报中坚持承认沙里尔政府。但是，在外交部档案馆和其他机关的档案馆中暂时还没有找到关于莫洛托夫的反应或回应印尼人的文件。正如外交部文件中指出的，印度尼西亚当局没有直接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及其政府对苏联的态度发表过任何声明。^①

右派社会党人沙里尔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在对苏联的态度问题上持极为谨慎的立场，担心此举会影响其同美国和英国的接触，而印尼政府还指望依靠他们来对抗荷兰。此外，同苏联加强联系势必会导致国内的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势力加强，而共和国领导人不希望这样。至于苏联领导层，根据可供研究者接触的文件判断，他们对印度尼西亚内部的政治进程所知甚少，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苏联为什么对印度尼西亚人的呼吁持谨慎态度。

第二节 殖民地问题和冷战的起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使得殖民地问题成为国际政治中的头等重要问题。殖民地问题成为苏联领导人在亚洲进行冷战所使用的工具之一。

从1945年年末起，在苏联的学术政治报刊中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得到更多支持。^②最初，把这个国家称为荷属东印度，在随后关于英荷军队镇压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战争的报道中则被称为印度尼西亚。从1945年11月4日起，《真理报》开始谴责美国、英国和荷兰在印度尼西亚推行的殖民政策，不像先前那样对印度尼西亚问题多半持中立态度，但也没有直接倒向苏加诺政府。从此时起，苏联报刊开始“从温和的反殖民主义立场”转向定期批评西方大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③

荷兰和英国成为主要的批评对象，苏联旨在削弱他们在亚洲的势力。苏联首先致力于削弱英国在亚洲或东南亚乃至在整个世界舞台的势力。此外，在其他关于战后国际政治问题的外交博弈中，可以利用英荷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战争问题作为反击武器。在战后重建过程中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2，卷宗3，案卷1，页码7。

^② Ruth McVey, *The Soviet View of the Indonesian Revolution (Interim Report Series,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Southeast Asia Progra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p. 7-8.

^③ *Ibid.*, 1957, p. 3.

可以很直观地看到这一点。联合国成为苏联与西方对抗的舞台。

第三节 在联合国安理会支持印度尼西亚独立

在1945年6月25日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上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负责安排联合国活动初期各主要机构的工作。筹备委员会为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制定了议事议程。

1946年1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苏联代表团参加第一届联合国大会的指示。在这份题为“安理会第一次会议”的文件第八章中指出：“需要努力让安理会第一次会议的问题限定在筹备委员会建议的那些问题范围内。”^①在文件的最后一章说：“如果一些代表团试图讨论领土托管、难民等苏联方面不希望讨论的问题，苏联代表团应该让联合国大会关注荷属东印度和印度支那地区的局势。必须在一开始以询问安理会关于这一地区形势情报的形式提出这个问题。同时，应该利用各国媒体刊登的关于印度尼西亚军事行动的事实材料，关于使用英国军队、美国军队和其他外国军事力量镇压当地居民的事实材料，关于甚至吸收日本军队反对民族运动的事实材料。但是，一旦必须将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必须向政府提出自己的建议以供研究。”^②

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在伦敦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安全理事会（以下简称“安理会”），安理会从1946年1月19日起开始工作。安理会的第一项活动是研究伊朗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列入筹备委员会事先协商好的会议议程。伊朗政府向安理会抗议苏联干涉伊朗的内部事务。因此，根据指示来看，“苏联不愿意”在安理会讨论这个问题。鉴于此，苏联代表团决定尽快提出指示中的监管措施并提出印度尼西亚问题。此外，正如苏联人指出的，参加联合国会议的苏联、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代表团收到了许多印度尼西亚各组织和个人关于请求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英荷干涉的信件和电报。^③大

① 俄罗斯现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89，目录38，卷宗65，页码7。

② 同上，页码7—8。

③（苏）绍尔莫夫：《苏联与印度尼西亚，1945～1954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6年，第33—34页。

概是苏联代表团向政府汇报了自己关于局势的建议，而政府决定不由苏联代表团、而由乌克兰代表团向安理会提交印度尼西亚问题，显然，此举是为了淡化伊朗问题同印度尼西亚问题之间的联系。

1946年1月21日，乌克兰代表团团长马努伊尔斯基致信安理会主席说，英国正规军和日本军队针对印度尼西亚当地居民的军事行动已持续数月。^①马努伊尔斯基谨遵指示，援引了许多媒体关于英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军事打击印度尼西亚的报道。乌克兰代表团建议安理会进行必要的调查并依据《联合国宪章》采取措施结束这一局面。

1946年2月7日，开始讨论乌克兰代表团关于印度尼西亚问题的信件，安理会共召开了六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乌克兰代表团坚持在印度尼西亚人民问题上应使用《联合国宪章》原则——承认每个民族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国体。乌克兰代表团要求安理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讨论当地的局势。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也积极参加了讨论，完全支持乌克兰代表团的提议。^②

麦克威曾指出，苏联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显然是权宜之计。^③绍尔莫夫则强调，苏联政府和人民一贯同情亚非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④联共（布）中央的指示似乎证实了麦克威关于苏联政界在印度尼西亚问题上的目的。但毫无疑问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政府在对外政策中坚持推行反殖反帝方针，继续执行共产国际战前实施的在世界范围内削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路线。不应否定苏联人民非常同情亚非人民争取自由和国家独立。但必须强调，苏联并没有具体的想法和打算，苏联在联合国这样拥有威信的国际组织内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严厉谴责帝国主义的企图及西方大国的行动，这都有助于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其他亚非国家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有助于传播和巩固苏联是被压迫国家和人民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的捍卫者的观念。反殖民主义宣传及其相应的实际措施，是冷战时期苏联领导层在亚非地区的重要手段。

①（苏）绍尔莫夫：《苏联与印度尼西亚，1945～1954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6年，第34页。

② 同上，第35—42页。

③ Ruth McVey, *The Soviet View of the Indonesian Revolution (Interim Report Series,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Southeast Asia Progra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57, pp. 11 - 13.

④ 同①，第31—32页。

第2章

苏联和印度尼西亚接触的缘起

荷兰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签订《林芽椰蒂协定》之后，苏联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英国确信印度尼西亚人将会坚定地捍卫共和国的独立，甚至不惜武装抵抗荷兰殖民政府统治，于是坚持让荷属东印度殖民当局开始同共和国政府代表进行谈判。谈判从1945年11月17日开始，时断时续地持续到1946年11月。同时，荷兰人对独立的印度尼西亚采取了敌对行动，随着岛上兵力的增加荷兰的行动越发升级。荷兰殖民者扩大了在印度尼西亚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对其实施海上封锁。

同时，荷属东印度当局着手在其控制的领土上建立傀儡共和国，旨在分裂印度尼西亚和削弱民族解放运动。为此采取的第一步是1946年7月在马里诺（南苏拉威西）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在群岛建立印度尼西亚联邦的决定。规定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仅处于联邦之一的地位。在许诺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的独立时，殖民者计划保持印度尼西亚与荷兰的密切联系和合作。

这些内容和其他一些内容记录在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同荷兰代表团签订的条约中，该条约名为《林芽椰蒂协定》（根据签署地命名）。1946年11月15

日，草签协定，1947年3月25日协定生效。根据《林芽椰蒂协定》，荷兰事实上承认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爪哇、苏门答腊、马都拉的政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被迫同意建立印度尼西亚联邦以及荷兰庇护下的荷兰—印度尼西亚联盟。

但是，文件为各种阐释留下了空间。共和国领导人认为，在1945年1月1日建立印度尼西亚联邦以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有权独立地开展对外活动。荷兰人坚持认为，只有印度尼西亚联邦拥有主权，因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无权同其他国家进行官方接触。

尽管存在着分歧，《林芽椰蒂协定》的意义首先在于荷兰在事实上承认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随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得到了英国、美国 and 印度等国的承认。

但是，在印度尼西亚，争取完全自由和彻底独立、反对荷兰殖民主义的斗争仍在继续。在这场斗争中，印度尼西亚政府主要依靠的不是军事手段，而是外交手段。共和国领导人积极而广泛地开展外交活动，努力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有影响力的大国的帮助。同时，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领导人没有错过利用冷战双方对抗谋求自己利益的机会。当时这一地区的条件对此极为有利。

随着“冷战”对抗的加剧和向亚洲转移，苏联对印度尼西亚的兴趣逐渐增加。苏联对印度尼西亚政策是在亚洲、欧洲乃至全世界局势的影响下自然形成的。此外，斯大林利用一切机会来扩大苏联的影响力和削弱西方大国的势力。这为苏联对印度尼西亚政策提供了新的发展前景。

1947年3月末4月初，在德里召开了旨在巩固该地区国家间联系的泛亚洲会议，会议期间苏联代表同印度尼西亚代表进行了初次接触。这是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参加的第一个国际会议。代表团由总理兼外交部长沙里尔率领。

沙里尔向苏联代表通报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严峻形势，尽管荷兰事实上承认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但仍继续推行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的政策。沙里尔向苏联代表团坦诚，得不到援助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就会崩溃。印度尼西亚代表表示希望利用苏联驻曼谷（泰国）公使馆

进行联系。^①同时，沙里尔没有直接请求关于苏联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沙里尔在“冷战”开始阶段总体上持亲西方方针，他期待苏联出于同西方争夺在这一地区影响的需要而自发地支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可以利用在东南亚加剧的“冷战”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不必直接求助苏联。

1947年4月4日，印度尼西亚人再次通过广播间接地暗示了自己得到苏联承认的愿望。在谈及印度尼西亚同其他国家的相互关系时，印度尼西亚广播说，印度尼西亚致力于同“加入苏联的所有国家”建立关系。^②许多欧洲、亚洲、非洲国家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承认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沙里尔在印度尼西亚对外关系领域也开展了活动，特别是向苏联发出的间接呼吁，引起了荷兰当局的关切。1947年4月19日，荷兰驻莫斯科大使馆向苏联外交部递交了一份照会，在照会中对《林芽椰蒂协定》做出了自己的解释，首先涉及的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同外部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照会中强调说，只有依据《林芽椰蒂协定》建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加入的印度尼西亚联邦，才拥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权力。在印度尼西亚联邦建立以前，荷兰政府负责荷兰王国（包括荷属东印度）的一切外部联系。^③沙里尔政府方面发表声明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境外设立代办处，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相关国家的事，没别人什么事”。^④

在这种形势下，尽管在苏联公开出版物（既包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民族解放运动的学术理论研究，也包括思想宣传的）中有不少反殖反帝的长篇大论，但苏联领导层对印度尼西亚的正式立场仍不确切。高层没有明确的方针，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责成苏联外交部第一欧洲司和条约法律司总结荷兰照会中阐述的问题的本质。

苏联领导层似乎对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政治进程和事件所知甚少，和先前一样对印度尼西亚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对东南亚这一地区没有明确的规划。苏联高层领导对印度尼西亚问题没有明确的态度，这反映在苏联外交部的活动中，外交部没有得到关于印度尼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1，卷宗1，案卷1，页码6—8。

② 同上，页码5。

③ 同上，页码1。

④ 同上，页码4。

西亚的明确指示。表现是，苏联外交部各部门从苏联对殖民地问题的总原则——反对西方殖民国家恢复在亚洲的殖民统治——出发，就苏联对印度尼西亚政策提出了各种建议。

条约法律司从国际法的角度，评价了《林芽椰蒂协定》签订后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国际法地位。条约法律司认为，荷兰对协定解释的出发点是：首先应该建立印度尼西亚联邦，此后才能解决新政府的法律主体及其国际法代表问题，这样的解释符合协定的字面规定，但忽视了问题的本质，即得到事实承认的政府有权同外部世界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对外关系只能在事实承认的框架内进行，不应超出此范围。根据国际法基本原则，条约法律司得出结论，苏联当下不能从法律层面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因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国际社会的代表是荷兰王国。不过，苏联可以在事实层面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条约法律司建议，第一步可以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所在地雅加达派驻苏联领事。条约法律司认为，这样的措施并不是法律层面的承认，荷兰也就不能对此表示反对。与此同时，这将凸显苏联对同印度尼西亚发展友好关系的关切。^①这样，条约法律司建议，在严格维持国际法框架的同时表达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关切并与之保持友好关系。

外交部第一欧洲司的态度更为谨慎。该司在1947年5月15日的报告中指出，荷印条约中没有任何一条直接禁止或允许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外国设立代表机构，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事实上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一欧洲司同时指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国外代表机构的问题上观点不一致。^②第一欧洲司指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利用欧洲国家在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争夺，强调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致力于与国外建立独立的外交关系，为此利用了美国 and 英国对荷兰施加的压力，美国和英国有各自的利益，彼此矛盾，他们希望赋予印度尼西亚在对外关系中拥有一定权力，以保障美国和英国的资本自由地进入印度尼西亚。^③

根据印度尼西亚希望得到苏联承认的间接暗示，第一欧洲司得出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1，卷宗1，案卷1，页码11。

② 同上，页码2—4。

③ 同上，页码4。

结论，苏联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或者声称苏联政府正在研究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可行性的相应声明，都将对提高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殖民地国家和全世界的声望产生积极影响，还能巩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及其政府在自己的领土和在其他荷属东印度国家的权力和影响。^①但是，第一欧洲司在1947年5月20日致维辛斯基的报告中持更温和的立场。报告中说：“由于我们关于印度尼西亚局势的情报太少，建议先与维辛斯基商讨我方是否承认印度尼西亚以及是否与其建交，如果维辛斯基认为合适，再与莫洛托夫商讨。”^②

1947年5月23日，东南亚司在致外交部副部长马立克的报告中强调了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以及与其建交的益处。报告中强调，苏联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建立和承认印度尼西亚的正面态度已经表现在1946年1~2月苏联代表团就印度尼西亚问题致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中。强调了荷兰经济封锁导致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严峻形势，并援引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理沙里尔在德里的泛亚洲会议期间同苏联代表团非正式会晤中对苏联代表的话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得不到援助就将崩溃。

东南亚司首次明确提出了苏联对印度尼西亚的目标：

1. 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提供各种援助。
2. 禁止荷兰在印度尼西亚恢复殖民制度，禁止美国人占领印度尼西亚以实现美国在东南亚的侵略政策。

苏联不可能向印度尼西亚提供实质性援助，因此，东南亚司认为第一步应该事实上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这一行动对印度尼西亚人民是极大的道义支持，将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有助于再次把印度尼西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同时，东南亚司强调指出，苏联外交实践中还没有事实上承认某个国家的先例。

东南亚司认为，苏联同荷兰关系有可能恶化。东南亚司的结论是，苏联事实上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将不可避免地引起荷兰方面的反对。但是，东南亚司强调，苏联领导层不同意荷兰在1947年4月19日的照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1，卷宗1，案卷1，页码2—5。

^② 同上，页码1。

会中对《林芽椰蒂协定》的解释。

东南亚司建议，在巩固在印度尼西亚势力方面不能落后于美国。该司提醒注意，美国已经事实上承认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尽管荷兰官方和报刊一度出现不满的论调，但美国的这一举措并没有招致荷兰方面的任何官方措施。因此，苏联采取这样的步骤是有法律依据的。

东南亚司密切关注“冷战”在亚洲的发展，意识到苏联和美国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竞争正在加剧，东南亚司认为苏联事实上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有可能迫使美国为避免丢掉印度尼西亚而与之建立直接联系，理由是印度尼西亚同东南亚各国建立直接联系已经得到了荷兰当局批准。东南亚司不排除事件如此发展的可能性，并把尽快打破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孤立看作主要目的。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在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势力增强相比，东南亚司对荷属东印度的殖民统治权持更为强烈的否定态度。显然，东南亚司认为，保障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对于扩大苏联在这个国家的影响以及利用印度尼西亚问题扩大苏联外交声望是必要条件。

东南亚司在致马立克报告的结尾部分指出，事实上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后，苏联将更有理由正式提出印度尼西亚问题，而且更有理由通过苏联驻万隆大使馆同印度尼西亚建立联系，何况在德里的泛亚洲会议期间印度尼西亚代表亲自表达了利用苏联驻万隆公使馆进行联系的愿望。^① 东南亚司的独到见解似乎归功于这个司的同事对印度尼西亚及其周边局势有更多的了解，因而认为捍卫苏联在该地区的利益是他们的职责。

显而易见，在了解了其他部门关于印度尼西亚问题的专家意见后，东南亚司在1947年6月15日致马立克报告中再次肯定了通过报刊或广播报道事实上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是合适的，这将在印度尼西亚国内以及国际社会舆论中引起广泛的反响，缓解印度尼西亚的复杂局势，这是对年轻的共和国最有力的支持。东南亚司建议的实际措施是向雅加达派遣苏联代表和塔斯社记者。东南亚司认为，派驻领事不合适，因为按照国际准则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得到荷兰的执行认可书。东南亚司强调说：“这与我们不承认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权的原则路线有矛盾。而从事先期谈判的特派代表可以使我们避免荷兰介入的必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1，卷宗1，案卷1，页码6—8。

要性。”^①

鉴于收到埃及王国驻莫斯科公使馆关于埃及法律上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普通照会，1947年6月11日东南亚司再次敦促苏联外交部副部长马立克加快研究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问题。^②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团长沙里尔因为安理会讨论印度尼西亚问题而在华盛顿逗留，这期间他再次暗示了印度尼西亚巩固同苏联关系的愿望。关于印度尼西亚同苏联的关系，他表示，这个国家花了很大精力关注印度尼西亚问题，印度尼西亚打算同苏联保持最友好的关系。尽管如外交部的报告中指出的，截至1947年年底没有任何一个印度尼西亚机构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及其政府与苏联的关系发表过一份直接声明，^③但1948年年初苏联外交部对事实上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总体上还是持赞同态度的。此外，努力消除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统治，在苏美关系中谋求均势，逐渐扩大在印度尼西亚（此前位于苏联在亚洲的利益范围之外）的地缘政治影响，这些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在这一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1，卷宗1，案卷1，页码9—10。

② 同上，页码12—13。

③ 同上，页码7。

第3章

苏联派驻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第一批记者

1947年，第一批苏联记者——塔斯社记者格奥尔基·阿夫林和年轻出版机构的工作人员奥列加·切切特金娜来到印度尼西亚。他们的报道成了殖民战争和革命性改变中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事态的第一手目击证据。苏联记者的消息是苏联领导层了解当地事件和进程的重要来源。

众所周知，这一时期所有的决定毫无例外都是斯大林做出的。毫无疑问，领袖所遵循的原则是意识形态目的和苏联的地缘政治利益。不同来源的情报对于具体决定也是不小的动机和材料依据。但是，正如丘巴良院士指出的，苏联领导人得到的消息——既有来自外交机构、各类代表处、记者的，也有来自兄弟国家共产党的——常常不够客观，受意识形态准则和本本主义的影响。这种基本上有偏向性和“滞后性”的情报使苏联领导人对世界的认识是歪曲的。^①

涉及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关系的档案文件表明，

^①（俄）丘巴良：《冷战新史》，《近现代史》1997年第6期，第12—13页。

党和各部的官僚制度也对苏联领导层的这一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他们首先得到情报，然后整理、分类并放到最高领导人的办公桌上。各级官员努力避免递交的情报会引起最高领导人的不满和愤怒，努力使这些情报展现出他们的活动处于有利态势。“不利的”消息被排除了，而报告这些不利消息的工作人员被调离工作岗位。结果，苏联领导人并不真正了解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件，这有时表现在做决定的过程中。

有两份文件的命运可以作为上述情况的直观展示。塔斯社驻印度尼西亚记者格·阿夫林的通讯稿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团成员奥·切切特金娜关于该团出访印度、缅甸、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报告。两份文件都涉及 1947 年下半年印度尼西亚的内政形势。这两份文件的命运展现了各党政机关官僚部门的政治惰性，他们关于印度尼西亚问题的分歧和对抗。结果是苏联领导层对印度尼西亚实际形势了解得不够好。

塔斯社记者格·阿夫林 1947 年下半年开始在印度尼西亚工作。他发回了一系列仅供苏联领导层审阅的绝密通讯稿。他在这些通讯稿中通报了他所了解的印度尼西亚的真实情况。其中一份通讯稿出现在莫洛托夫秘书处。^① 这份文件首次出现在学术领域。

首先，阿夫林描绘了荷兰人如何为了尽力恢复在印度尼西亚的地位而残酷剥削，他们依靠当地的封建傀儡和自己的军队夺回印度尼西亚人在西瓜哇的种植园。接着（不止一次），阿夫林报告说，在雅加达的所有外国代表都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臭名昭著的敌人”。他们极其害怕共和国“带有如此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共和国领导人考虑在赶走荷兰强盗和美国匪徒后在印度尼西亚“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格·阿夫林报告了自己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领导人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会谈的情况：“我经常听到苏加诺、阿米尔·沙里夫丁（Amir Sjarifuddin）^②、谢贾济特（Setiadzhit）、阿布杜尔·马济德（Majid），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莫洛托夫秘书处，全宗，全宗 06，目录 10，卷宗 631，案卷 46，页码 3—21。

^② 沙里夫丁（1907 ~ 1948）：又译作“谢里夫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争取民族解放斗争领导人之一。1945 ~ 1946 年任情报部长，1946 ~ 1948 年任国防部长，从 1947 年起任第二任内阁总理，因在与荷兰的圆桌会议谈判中让步太多而下台。他在“茉莉芬事件”中被军方逮捕，不久遇害。——译者注

阿利敏和其他领导人的抱怨——为什么直到目前在印度尼西亚还没有一位苏联外交家、没有一位民主国家的外交官，毫无疑问，他们会帮助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格·阿夫林充满激情地描绘了同共产党人和其他一些左派领导人——尤素福·穆达达姆（Mudadam）、马鲁托·达鲁斯曼（Darusman）^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和一些积极分子会谈的情况，按照他的话说，他们盛情地款待他，“不停地问到苏联的成就、问到斯大林。我只能说一点：在场的所有人都让人感到亲切，都是杰出的人，在血缘上和精神上都亲近”。

1947年9月24日，格·阿夫林会见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按照阿夫林的话说，苏加诺“对苏联的支持表示感谢，把印度尼西亚的形势同1917年的俄国形势相比较，回忆了列宁关于革命的作品”。

第二天，阿夫林同共产党领导人阿利敏进行了会谈。阿夫林是这样报告的，阿利敏说：“苏加诺是我们的人。对他需要做工作。但毫无疑问，他是我们的人。”与此同时，阿利敏抱怨共产党人在印度尼西亚开展工作的困难：“我知道，您对我和这里的情况不满意，但您应该明白，这里的形势很严峻……请伟大领袖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明白，请伟大的苏联人民明白，我们是同你们站在一起的。”

另一位左派领导人阿米尔·沙里夫丁当时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理，他向塔斯社记者阿夫林表示：“是的，我们想学习你们，我们想在印度尼西亚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他还请求得到武器，“大量武器和指挥官”。沙里夫丁同时指出：“我们对中国朋友寄予极大期望，不过还要等等。”

阿夫林把通讯稿中的一章专门命名为“印度尼西亚人民对苏联的态度”。

“可以感受到印度尼西亚各阶层广大民众对苏联、对我们的领袖、对我们人民的热爱。在日惹、雅加达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其他城市，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我随时都能感受到当地人民对苏联炽热而真诚的喜爱。从日惹到雅加达的报刊亭里，列宁和斯大林的书籍堆满书架。到处可以见到印度尼西亚语版的斯大林宪法。到处都有

^① 马鲁托·达鲁斯曼（？~1948）：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活动家，在1948年“茉莉芬事件”中被害。——译者注

人向我索要斯大林同志的相片。我们的电影非常受欢迎。”

格·阿夫林的材料被引用在一些重要的工作文件中，包括在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致斯大林的报告中，该报告建议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领事关系：“印度尼西亚人民普遍对苏联怀有好感。列宁和斯大林的作品以及《苏联宪法》等被译成印度尼西亚语并到处传播。”^①

这份通讯稿件被分发给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沃兹涅先斯基、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看来，无论是苏维埃政府人士还是级别较低的官员都非常喜欢它。显然，这份通讯稿没有经过官员们的处理就被一字不改地放到了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同一时间（1947年5～6月）出访印度尼西亚的切切特金娜的报告则是另一番命运。

除了给世界民主青年联盟领导机关的正式报告外，切切特金娜还起草了一份关于自己出访东南亚国家的秘密报告，呈送给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和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报告是1947年9月12日提交的。切切特金娜在报告中介绍了自己看到的这些国家的形势。^②

她在分析东南亚各国的形势前先讲了她所到国家所共有的一些国内政治形势主要特点。切切特金娜提出，战争和日本占领促使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民族意识增强。按照她的观点，这使共产党、工会、农民组织和青年组织的地位得到巩固、影响得到加强。这些都推动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切切特金娜对比了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件，指出这些国家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是在民族解放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③切切特金娜还指出了阶级斗争的加剧。所有这些引起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反应，他们同当地的资产阶级结盟，努力压制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政治积极性。这样，奥列加·切切特金娜认为应该重视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的勾结。

与国际反动势力联合起来相抗衡的是殖民地人民的不断团结。“现在，无论是殖民地国家内部的广大人民群众之间还是他们同欧洲和美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6，目录10，卷宗633，案卷46，页码2。

^②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249，页码23—52。

^③ 同上，页码24。

洲劳动大众之间，都极有可能发展团结。”切切特金娜强调，东南亚人民关心的是，他们能否从欧洲和美国的民主力量那里得到实际援助和对自己斗争的支持。“殖民地人民已经不再满足于决议案（尽管他们支持其中的抵抗精神），他们希望得到更能感受到的东西。”^①

切切特金娜指出，殖民地人民对能得到苏联方面的援助最为期待。“在我到过的所有国家，我看到了对苏联非比寻常的兴趣和热爱……尽管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报纸在那里进行反苏宣传令人气愤，但人民群众对苏联的信任不仅没有下降，而是正相反，那里对得到苏联援助的期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活力。”^②

接着，切切特金娜写道，在最为偏远的农村有人问她，他们群起暴动（指反殖民者——作者注）时所做的是否正确；苏联能否给他们送来武器；如果他们发动革命（反殖民主义的——作者注），我们能否向他们提供支持：“我们能够战胜英国人，但我们需要知道你们是支持我们的。”^③ 奥列加·切切特金娜就这样特别讲述了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些国家准备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准备完成反殖民主义革命。她强调，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中这些国家希望得到欧美进步力量的帮助，首先是苏联的帮助。切切特金娜援引了几句东南亚国家人民代表的话，显露出他们不满足于只是得到苏联方面道义和外交方面的支持，他们渴望得到苏联更为实质性的支持，包括送来武器。一些外国人也描写了苏联在国际舞台的反殖反帝宣传燃起了殖民地人民的这些期待。^④ 同时应该指出，切切特金娜在提交给联共（布）中央的秘密报告中只字未提殖民地人民进行激进的社会主义变革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努力。

在报告中关于印度尼西亚局势的章节，切切特金娜描述了1947年夏天荷兰下达最后通牒时，在荷兰实施封锁和国内进行反殖民主义战争的情况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报告中含有许多对印度尼西亚领导人的有意思的评价以及对印度尼西亚国内政治局势的评价，这些评价与苏联领导层、党的机关和塔斯社记者阿夫林的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249，页码24。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George McTurnan Kahin,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2, p. 269.

观点不同。

首先是关于沙里尔的，当时他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理。1947年夏天之前，苏联领导层对印度尼西亚社会党领导人沙里尔持肯定态度，把他看作左派力量的代表。这种态度似乎源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意见。例如，在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的文件中有一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层成员马鲁托·达鲁斯曼于1946年6月18日致荷兰共产党中央的信。达鲁斯曼认为沙里尔是亲共的。“当沙里尔有机会组建自己的第一届政府时，第一步就是朝向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策的道路。”^①马鲁托·达鲁斯曼强调了两党立场的相近之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斗争都反对异国统治，都反对喊着激进的口号而事实上削弱革命的团体，”这指的是当时持反苏加诺立场的“托洛茨基分子”——陈马六甲和苏巴尔诺（Soebardjo）。^②信中指出，社会党人在农民中和妇女组织中拥有很大的影响力。^③

显然，这封信对1946年10月1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问题情报局内部简报№18（42）刊登的关于印度尼西亚局势的文章（未署名）不无影响。^④在这份简报的结尾部分得出了如下结论：“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群众做好了为了获得自由付出任何牺牲的准备，广大劳动人民向往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关的一切，这些为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应对国内困难的政治局势和掌握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创造了客观条件。”^⑤参加1947年3月在德里的泛亚洲会议的苏联代表团成员图尔松-扎得在报告中指出：“各代表团对待印度尼西亚政府首脑沙里尔博士的会议发言热烈而亲切。”^⑥

切特金娜似乎同意对沙里尔的积极评价，毫无疑问，她在出访东南亚国家之前了解了苏联领导层关于印度尼西亚政治力量的观点。但是，切特金娜在自己的报告中改变了对沙里尔的看法。“需要说的是，从我们抵达巴达维亚的当天与他会面那一刻起，我们就注意到沙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216，页码39。

② 苏巴尔诺（1896～1978）：印度尼西亚政治活动家，马斯美友党人，1945年、1951～1952年任外交部长，1957～1961年任印度尼西亚驻瑞典大使。——译者注

③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216，页码42。

④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94，页码9。

⑤ 同上。

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239，页码81。

里尔的看法有所改变。那天晚上，他向我们谈到了政府准备毫不妥协地、坚定地反抗荷兰人的任何压力。”^① 不过，切切特金娜接着写道：“但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在我们离开的前夜（在荷兰下达最后通牒之后——作者注），我们确信，他的坚定信心已经所剩无几了，十之八九他倾向于让内阁对荷兰人妥协。至于我们的代表团，有人告诉我们说，他‘害怕’我们来到这片土地以及对印度尼西亚青年发表支持他们斗争的演说好像‘损害’了共和国，因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开始卖力地写关于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性质的文章。”^②

看来，关于对总统苏加诺的评价切切特金娜与苏联领导层一样更倾向于否定态度，虽然也确定和强调苏加诺在共和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在印度尼西亚独立的最初几个月里，苏联领导层对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及其总统没有给予任何认真的关注，大概是由于没有关于那里事件的可靠情报。从1946年年初起，苏联开始积极支持这个国家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但对该国的领导人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好感。这大概是由于国际媒体的影响，有些报刊认为苏加诺是日本的附庸，还由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对总统持矛盾态度。在上文援引过的马鲁托·达鲁斯曼的信中，苏加诺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领导人，摇摆不定，性格懦弱”，“真正的妥协分子”（指对待同荷兰人谈判的问题——作者注），马鲁托·达鲁斯曼写道：“考虑到国内形势，我们不得不暂时保留他。”^③

与此相反，切切特金娜在亲自见过苏加诺后，说他无疑是一个既聪明又狡猾的人，而且“极度自命不凡”。“他努力获取民众的爱戴和承认。”“在他的身上能感受到他维护共和国所有权利的顽强和对未来的忧虑。”他很担心苏联方面是否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问题。当他提出这个问题时，可以听得出来他的请求和害怕拒绝。苏加诺还表达了与苏联进行贸易的愿望。^④ 切切特金娜强调，苏加诺在印度尼西亚民众中非常受欢迎。“有代表性的是，对数千农民来说，对贫苦的人来说，苏加诺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共和国的象征。”^⑤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249，页码44。

② 同上，页码44—45。

③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216，页码47。

④ 同①，页码49。

⑤ 同①，页码46。

切切特金娜对阿米尔·沙里夫丁抱有更大的好感，当时他任国防部长职务。“他是社会党人，但同志们（共产党人——作者注）告诉我，他是亲共产党的。”但切切特金娜的好感与其说源于这些信息，不如说源于这位领导人同荷兰人斗争的坚定性和不妥协。按照沙里夫丁的话说，“共和国拥护者将斗争到底。他们宣布将采用‘坚壁清野’的政策，毫不留情地开展游击战”；“共和国拥护者将为游击战准备自己的军队。他向我们展示了游击队、正规军和人民警察的部署图。必要时他们可以分割成更小的组织，分散到全国各地”。^①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切切特金娜对印度尼西亚领导人评价的主要标准，与其说是他们属于左派力量，不如说是他们对荷兰殖民者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和开展反殖民主义武装斗争的坚定性。显然，这位苏联记者的立场是从苏联领导层 1947 年上半年总的政治路线出发的，毫无疑问，她熟悉这条路线，她也必须遵循这条路线。麦克威也强调了这条路线，指出，苏联对战斗中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好感比对同殖民者和平达成国家解放协议的印度及其领导人尼赫鲁要强烈。^②

同时，切切特金娜提醒联共（布）中央特别注意印度尼西亚军队极其糟糕的装备状况。“但是，为了避免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我要说，共和国军队的装备状况非常不好。我们看到了共和国的某些部队，看到了许多士兵，去了游击区，共和国拥护者的装备状况给人留下极为沮丧的印象（这一段落是联共（布）中央的一位工作人员在读文件时强调的——作者注）。他们的武器大多是日本人留下来的武器，一些从荷兰人那里夺来的英式和美式的冲锋枪，其余的就是自制武器：迫击炮和手榴弹。

人民警察是用精心打磨的竹制长矛武装起来的农民。自然，开展游击战总要抢敌人的武器。但是，说到对印度尼西亚的实质性帮助，其实就是给他们提供武器。他们从中国和印度得到一些武器，经新加坡运到苏门答腊再到爪哇。”^③ 这样，切切特金娜再次提醒，武装反对殖民制度的人（包括印度尼西亚人）希望得到的来自苏联的具体援助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 17，目录 128，卷宗 249，页码 45。

② Ruth McVey, *Soviet View of the Indonesian Revolution (Interim Reports Series: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Southeast Asia Progra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57, p. 43.

③ 同①。

就是得到武器。

尽管多数印度尼西亚人具有战斗精神，切切特金娜还是指出他们缺乏一致性和应有的警惕性。“但是，与此同时，国内弥漫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散漫，在共产党人当中也是如此：数十名美国的、英国的和荷兰的‘观察家’在共和国领土上自由地四处活动，包括苏加诺总统和前总理沙里尔在内的共和国领导人身边总缠着荷兰女人。”^①（关于散漫尤其是共产党人的散漫读文件的人做了强调——作者注）

切切特金娜用专门段落描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群众中增长的不满情绪：“到目前为止，共和国的公告带给人民群众的都是精神鼓舞，而不是社会和经济变化。在日常生活中，农民和先前一样没有土地，也没有享受到共和国制度的成果。他们认为，这是国家被封锁和必须集中所有资源投入新战斗的结果。不过，现在他们已经越来越强烈地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②（文件审阅者对这一整段画了线——作者注）

“在农民和工人中出现了不满情绪，因为共和国政府仅仅止步于发表公告。我认为，如果政府不进行社会经济改革，不把劳动人民从共和国之前时期就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的不满情绪会越来越强。”^③（文件审阅者对这一整段画了线——作者注）同时，在谈到改革的必要性时，奥列加·切切特金娜指的不是激进的社会改革，而是反封建改革，尤其提到了1947年春通过的社会主义阵线纲领中的要求：“降低赋税，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农业合作社。”^④

在介绍共和国的政党和社会组织体制时，奥列加·切切特金娜指出：“近几个月来社会主义阵线（加入的有共产党、社会党和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作者注）得到了极大巩固，并对全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主义阵线总工会、农民联盟和民兵武装（游击队、大学生武装力量等）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⑤不过，切切特金娜强调了印度尼西亚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软弱性，最主要的是缺乏有经验的干部。共产党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之家——在雅加达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学校——为党以及工会和农民组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249，页码46。

② 同上。

③ 同上，页码45—46。

④ 同上，页码47。

⑤ 同上。

织培训干部。但是，切切特金娜认为，“在组建这样的学校时中央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把‘学习托洛茨基主义’这门课也列入了教学大纲。同志们解释说，这是为了避免托洛茨基主义渗入党内的危险”。^①

在切切特金娜的报告中没有特别关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可能是因为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团给自己定的任务是尽可能广泛地同印度尼西亚各政党和组织进行接触，而不是特别关注共产党人。不过，毫无疑问是有这类会面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也向记者切切特金娜谈了自己的问题和困难。“跟其他国家一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书记阿利敏同志请求我向联共（布）中央转达关于提供持续援助和同其他党建立联系的强烈请求。他请求转达，他公开承认，没有莫斯科的建议、不和莫斯科联系，有些问题常常很难解决。他还请求转达，希望慕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一名工作人员（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尽快从苏联回国，还希望塔斯社向印度尼西亚派驻记者。”^②

自然，奥列加·切切特金娜对印度尼西亚青年运动的关注要多得多。切切特金娜指出：“在亚洲国家中，青年组织都没有起到像在印度尼西亚那样重要的作用。”她同时指出：“对青年在革命和独立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的普遍认同使某些青年领导人自我膨胀，他们有明显的激进倾向。更认真的、政治素养更高的人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并与之进行斗争。”^③

在奥列加·切切特金娜的报告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在独立斗争中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各人民军队的团结问题。“现今，印度尼西亚人民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团结。”^④“社会主义阵线给自己确定的任务是同其他政党进行合作。”^⑤还谈到了全体印度尼西亚青年团结起来的可能性问题。^⑥

在报告的结尾，奥列加·切切特金娜提醒联共（布）中央注意必须解决“一些重要而又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涉及切切特金娜造访的亚洲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 17，目录 128，卷宗 249，页码 48—49。

② 同上，页码 49。

③ 同上。

④ 同上，页码 45。

⑤ 同上，页码 48。

⑥ 同上，页码 51。

各国（包括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所有国家的共产党特别是殖民地的共产党，毫无疑问，需要得到持续的、认真的帮助和领导。各党之间需要建立联系，否则就有被孤立的重大危险，就不可能正确而且迅速地弄清最重要的国际和国内问题。在有可能（以某种形式）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国际组织之前，完全有必要为各国政党联络建立一些机构。这些机构可以是地区性的，既可以进行地区间联系也可以进行国际联系。我认为，尤其是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阵线可以倡议召开国际会议或者哪怕是召开各国代表会议。”

切切特金娜的第二个重要建议涉及派遣苏联贸易代表。“我认为，如果苏联在……印度尼西亚……有常驻贸易代表，我们会赢得政治和经济优势。”

接着，她强烈建议向印度尼西亚派遣塔斯社记者。“塔斯社向……印度尼西亚……派遣记者是完全有必要的（在我看来是可行的）。”

奥列加·切切特金娜建议将邀请这些殖民地国家大学生到苏联学习作为苏联影响这些国家和培养干部的一条途径。同时，她指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因为美国人和英国人已经在这方面非常积极。

她还建议向亚洲国家输出更多的宣传苏联的电影，多向那里邮寄苏联杂志，以当地时间为依据改变对亚洲国家广播的时段，促进青年代表团的交流。^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947年秋切切特金娜在印度尼西亚没有看到任何社会主义革命的征兆和必要性。正相反，她强调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团结，尽管人民群众对自身的困境非常不满。她指出了印度尼西亚左派力量（包括共产党在内）的领导脆弱，对马列主义理论所知甚少。切切特金娜强烈建议推动亚洲共产党之间建立稳定的联系，以建议的方式向他们提供帮助，加大力度在亚洲国家宣传苏联的生活方式。

从切切特金娜的报告中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联共（布）之间实际上没有联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强烈希望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彼此之间以及同联共（布）之间建立经常性的密切联系。

切切特金娜的报告在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的待遇是消极的。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249，页码51—52。

提交到联共（布）中央书记苏斯洛夫（负责对外政策事务）秘书处的不是足足有 30 页机打纸的完整的总结，而是一个月后即 1947 年 10 月 17 日缩写成 4 页纸的节选。^① 在节选的开头强调，这份总结“是对代表团与当地政党和组织见面的个人观察和意见”。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报告提供的信息和建议的政治意义完全被抹杀。在节选总结中关于印度尼西亚只有一句话：“总结中关于印度尼西亚局势的材料没有不为人知的。”

这份总结的改编者——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东南亚司司长弗·弗·普雷舍夫斯基和教导员伊·伊·科兹洛夫认为，只把切切特金娜如下建议列入自己的文件中并付诸实施是正确的，按照他们的观点，“这将有利于增强东南亚国家人民对苏联的好感和提高苏联的威望”，这些建议包括：

1. 将东南亚各国代表列入苏联邀请的工会代表团、青年代表团、妇女代表团、文化界代表团；
2. 鉴于东南亚各国没有苏联电影发行机构，推荐苏联的妇女组织、青年组织和工会在东南亚国家组织推广电影；
3. 建议广播委员会采取有效措施优化对东南亚国家广播的质量和时间的。^②

这份节选总结首先呈送给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副部长列·谢·巴拉诺夫审阅。普雷舍夫斯基在 10 月 22 日的随文报告中强调：“只是把那些对我们来说是新的问题和具有某种价值的东西列入到了简介中。”^③ 至于奥·切切特金娜的建议——首先是关于亚洲共产党和派遣贸易代表的建议，受到了严厉批评，说这些泛泛而谈，没有实际价值。“例如，关于东南亚共产党需要援助和意识到彼此之间建立密切联系的必要性，其本身是正确的。但考虑到东方国家的政治形势和共产党在那里所起的作用，现在向联共（布）中央领导层提出建立由这些国家共产党组成的地区性组织未必合适。确切地说，我认为，可以谈谈将来利用设在贝尔格莱德的情报局通过媒体或其他方式对这些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 17，目录 128，卷宗 249，页码 58—61。

② 同上。

③ 同上，页码 56。

国家的共产党提出建议。”

奥·切切特金娜关于向东南亚国家派遣苏联贸易代表的建议也受到驳斥。普雷舍夫斯基指出，这个问题不像切切特金娜以为的那么简单，提出这个问题只能说明她不了解这些国家目前的形势。关于印度尼西亚，普雷舍夫斯基指出，“共和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荷兰要为恢复自己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而斗争”。^①他强调说，在节选中只保留可付诸实施的建议。

1947年12月10日，对外政策部副部长莫舍托夫向中央书记米·安·苏斯洛夫提交了一份报告，^②在报告中以更为严厉的语气对切切特金娜的总结和建议进行了批评。莫舍托夫在报告中指出，切切特金娜的总结基本上是消息，鉴于其提交的材料有损声誉，免去切切特金娜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杂志《世界青年》的苏联代表工作。在报告中强调说，“大多数建议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接着重复了普雷舍夫斯基的表述：“结论是：关于东南亚共产党需要援助和意识到彼此之间建立密切联系的必要性，其本身是正确的。但考虑到东方国家的政治形势和共产党在那里所起的作用，现在向联共（布）中央领导层提出建立由这些国家共产党参加的地区性组织未必合适。”“向联共（布）中央提出向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派遣苏联代表而不考虑总的政治形势以及我们同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是没有根据的。”接着，文件表示同意普雷舍夫斯基准备的节选和随文报告中的建议。

就这样，切切特金娜的总结先在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被整理了两个月左右，然后被送到苏斯洛夫办公桌上。同时，删除了总结中最尖锐的、最重要的意见，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思想和组织薄弱，关于他们孤立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关于他们没有做好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好好开展运动的准备，关于印度尼西亚军队装备不好，关于印度尼西亚青年的激进和缺乏自制力。从提交给苏斯洛夫的切切特金娜总结中的信息以及她被免除国际青年组织工作的事实可以得出结论，切切特金娜对东南亚国家局势的理解、对当地共产党人和其他左派力量的评价以及相关建议基本上被否定，她的意见太激进、太革命性，这不符合对外政策部、其实也就是联共（布）中央领导层所遵循的温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249，页码56。

② 同上，页码53—54。

和立场。

切切特金娜总结中最准确的、对苏联和联共（布）领导层特别是对党的机构来讲最客观的意见和建议，并没有被呈送给在印度尼西亚问题上做决策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在这种重要信息材料的准备机制中，政府官员对决策（其中包括苏联对印度尼西亚政策）的影响力非同小可。

第4章

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建交的具体步骤

在西方的历史文献中确立了这样一种观点：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建立领事关系的尝试是苏联倡议的结果，是斯大林强加给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领导人的。这一事件被看作精心谋划和制定的在东南亚传播共产主义和扩大苏联影响的计划的具体实现。著名学者弗吉尼亚·汤姆逊（Virginia Thompson）和理查德·阿道夫·汤姆逊（Richard Adolf Thompson）写道：“战争结束前后，俄国人在印度尼西亚找到了在这一地区开展直接的和隐蔽的行動的最佳土壤。”^①

英国学者杰克·布里梅尔（Jack H. Brimmell）论证说，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建立领事关系的倡议源于莫斯科：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向印度尼西亚驻捷克斯洛伐克代表苏里普诺（Sulipno）建议缔结苏联和印度尼西亚领事协定，1948年1月苏联批准了该协定，但被沙里夫丁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否定

^① Thompson V. and Adloff R., *The Left Wing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 1950, p. 193.

了，当时苏联是单方面批准了这一协定。^①

麦克威最为接近事实，她说，关于这个问题她零星地收集到了一些材料。她还说，对研究者来说苏联同印度尼西亚签订领事协定的这段历史仍是一个大秘密。^②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的文件解释了这个“秘密”。根据档案资料，事情是这样的。

1947年7月20日，荷兰军队开始发动第一次反共和国的“警察行动”。印度尼西亚的局势急剧紧张起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领导人看到，尽管美国和英国事实上承认了年轻的共和国并口头上强烈谴责荷兰的侵略，但他们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制止措施。1948年1月17日，共和国政府被迫同荷兰签订了《伦维尔协定》。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领土大大缩减，爪哇的大部分地区、苏门答腊的重要地区处于荷兰的占领之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地位问题被回避，这就导致该协定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主权做出不同的解释。总体上，《伦维尔协定》带给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灾难要比《林芽椰蒂协定》更深重。

由于在签署《伦维尔协定》时美国起到了居间调停的作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社会舆论中先前存在的亲美情绪开始急剧降温，怀疑美国是站在荷兰一边的。随后，联合国的表决促进了印度尼西亚人对苏联好感的增强，苏联始终号召荷兰军队退回出发点。印度尼西亚人越来越相信，在安理会成员国中只有苏联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真诚朋友。^③随着荷兰扩大侵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局势变得更加困难，必须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从1947年年中开始，印度尼西亚政府由埃米尔·沙里夫丁领导，他是著名的解放运动左派领导人。可以想见，恰恰是这些因素决定了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关系中最初的具体步骤。

1948年1月26日，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代办博德罗夫向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佐林报告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代表带了一封信来找他，信中含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建议。报告附有印

^① Brimmel J. H., *Communism in South East Asia: A Political Analysi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32.

^② Ruth McVey, *The Soviet View of the Indonesian Revolution (Interim Reports Series: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Southeast Asia Progra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57, p. 47.

^③ George McTurnan Kahin,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 215 - 216, 220.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公使苏里普诺（Sulipno）1948年1月23日的信。信中说，1948年1月13日他收到了任命自己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东欧各国特命全权公使的电报，工作是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东欧国家之间建立关系。1月23日，他收到了关于同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关系的补充指示。苏里普诺通报说，他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那里得到了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名义同苏联代表进行谈判的全权。他还说，作为印度尼西亚情报部门的首长他已经在布拉格逗留好几个月了。^①

苏联外交部没有关于苏里普诺的任何情报，所以，佐林指示东南亚司收集关于此人的信息。东南亚司确定，苏里普诺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和印度尼西亚青年联盟的领导人。他参加过一系列国际会议，在德里亚洲国家会议（1947年3~4月）上他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代表团的成员和秘书，在那里，他同苏联代表团进行了近距离接触，表现得对苏联持友好态度。苏里普诺领导的印度尼西亚青年组织参加了布拉格世界青年联欢节，作为印度尼西亚代表进入了国际学生联合会（也在布拉格——译者注）执委会。但是，他在德里亚洲国家会议期间就已经通知苏联代表团，说他得到了外交岗位任命、要离开青年运动了。^②

收到这些消息后，苏联外交部允许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公使同苏里普诺进行会晤。这次会晤于1948年2月17日举行。苏里普诺说，他受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委托同苏联政府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和缔结友好与互助条约的问题进行谈判。苏里普诺答应稍后将递交照会证实这个情况。^③1948年6月10日，东南亚司收到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和副外长塔姆季尔（Tamzil）博士署名的照会副本，证实了上述苏里普诺的权限。^④

不过，东南亚司不明白苏里普诺是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哪个政府开展工作的，是以已经于1948年1月23日下台的沙里夫丁政府的名义？还是以取代沙里夫丁的哈达政府的名义？苏里普诺是否有哈达政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2，卷宗3，案卷1，页码1—2。

② 同上，页码4。

③ 同上，页码7。

④ 同上，页码13。

府进行谈判的授权？在此，东南亚司认为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不久前荷兰同印度尼西亚签订的《伦维尔协定》是否使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失去了同外国进行直接外交联系的权力。^①因苏联方面要求就此问题予以澄清，1948年3月10日，苏里普诺向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公使转交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通知说，在签订《伦维尔协定》时保留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同荷兰签订最终协定前的现有地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已经发表过声明，它将保持自己的独立的对外政治联系，将同其他国家签订任何协定或建立关系。备忘录中还说，新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已经向其驻外代表分别下达了指示，继续遵循以前的政策。^②

苏联外交部领导层对这个解释不满意，要求对苏联同印度尼西亚建交的问题进行法律鉴定。1948年3月16日条约法律司提交的结论中说，苏联可以同任何一个它认为是独立的国际法主体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1945年8月17日苏加诺和哈达签署的宣言中，宣布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根据《林芽椰蒂协定》和《伦维尔协定》，荷兰事实上承认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同时，哈达总理在中央国民委员会（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临时议会）上指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将保持主权和同外国政府的相互关系。因此，苏联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在法律上是可行的。^③

根据条约法律司的法律结论和苏里普诺的权限证明，东南亚司建议外交部领导层接受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建议，着手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工作。东南亚司指出，这将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政治形势产生积极影响，为苏联在欧亚兴起的“冷战”带来政治红利：促进和提高苏联在东南亚国家以及伊斯兰国家的威信。东南亚司指出了支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进行反荷兰殖民主义的斗争和帮助对抗英美帝国主义的政治重要性，毫无疑问，这符合苏联的利益，苏联关心的是缩减西方在亚洲的势力范围。同时，东南亚司认为，尽管苏里普诺提出的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就签订友好和互助条约进行谈判的建议是有利的，但当下要搁置。^④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也建议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2，卷宗3，案卷1，页码7—8。

② 同上，页码11—12。

③ 同上，页码9—10。

④ 同上，页码15—16。

对印度尼西亚人提出的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建议持积极态度，事实上承认共和国之后着手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设立苏联领事馆。苏联驻荷兰大使也同意这个意见。^①

1948年4月14日，在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会议上，关于苏联同印度尼西亚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得到积极解决。^②然后必须征得苏联最高领导层的同意。1948年5月14日，莫洛托夫向斯大林呈交了报告，其中通报了关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同苏联建立联系的愿望。报告文本如下：

致斯大林同志：

今年1月23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特派公使苏里普诺（按照他的话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带着一封信来找我国驻布拉格代办博德罗夫。苏里普诺在信中通报了关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同苏联建立联系的愿望。

今年2月17日，苏里普诺告诉博德罗夫，他所说的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建议是受现今哈达领导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的委托。他还表示，1948年1月17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同荷兰签订的《伦维尔协定》没有使共和国丧失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权力，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已经得到事实承认（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法律承认（埃及、叙利亚、伊朗、阿富汗和其他一些国家）。

接着简要介绍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领土和居民情况。结尾部分说道：

印度尼西亚居民对苏联普遍怀有好感。列宁和斯大林的作品、苏联《宪法》等已被译成印度尼西亚语出版。

已经有十多个国家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了领事关系，鉴于此，我们认为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领事关系是可行的，可以通知苏里普诺稍后将研究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根据上述内容，请求批准附上的联共（布）中央决议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2，卷宗3，案卷1，页码18—19。

^② 同上，页码22。

草案。

维·莫洛托夫

在联共（布）中央决议草案中说：

1. 采纳苏联外交部关于苏联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领事关系的建议；
2. 责成苏联外交部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交换照会。

在附件中还有供发表的消息文本，稍后刊登了。^①

1948年5月22日，在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办公室苏联特命全权大使西林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公使苏里普诺交换了关于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建立领事关系和互换领事的文书。在由布拉格报送到苏联外交部的关于互换建立领事关系文书的报告中附有苏联大使同苏里普诺的会谈记录，在这份会谈记录中我们看到了这一过程中有趣的细节。报告说，苏联大使邀请苏里普诺来到苏联大使馆，并向苏里普诺递交了印度尼西亚政府致苏联政府照会草案的俄文本。照会立即被翻译成了英文和印度尼西亚文。苏里普诺完全同意照会的内容，随身带走，过了不一会儿又带着这份已经打印成印度尼西亚语的照会返回苏联大使馆。没有对文本做改动。苏里普诺签署了印度尼西亚的照会，并盖上了自己的印章。之后举行了互换照会的官方仪式。苏里普诺在转交照会时请求尽可能快地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派驻苏联领事。他指出，这将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领土上的第一位外国领事，尽管其他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国家（美国、法国、中国、印度支那）派驻了领事，但都在荷兰占领的领土巴达维亚。此外，苏里普诺指出，由他转交的照会是第一份使用印度尼西亚语——前殖民地的语言——的国际文件。^②

我们在互换照会的过程中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关于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关系的倡议来自印度尼西亚方面。在苏里普诺的照会中写道：“我真诚地告诉您，在考虑了我们双边意见交换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得出结论：从今天开始建立领事关系和互派领事是合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6，目录10，卷宗633，案卷46，页码1—3。

^② 同上，页码28—29。

适的。”在苏联的照会中证实收到了印度尼西亚的照会，指出，苏联政府接受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领事关系和互派领事的建议。苏联外交部着手制定具体措施，在印度尼西亚建立总领事馆。^①

1948年5月26日莫斯科和布拉格刊登了关于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建立领事关系的公报后，在荷兰掀起了强烈的抗议风暴。所有的报纸都要求采取坚定措施反对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之间达成的协议批准和生效。荷兰报刊在表达执政集团的意见时，开始恐吓年轻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而荷兰驻印度尼西亚当局开始积极开展打压和消灭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活动（经济封锁、推行统一的货币以扼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经济独立）。同时，在荷兰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谈判结束之前就在巴达维亚成立了全印度尼西亚“临时政府”，事实上意味着恢复了荷兰殖民统治。

但是，荷兰当局对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压力没有带来预期结果。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当局竭力拒绝执行荷兰人不承认苏里普诺活动效力的要求，因为不只是沙里夫丁左派集团（苏里普诺所属的沙里夫丁政府成员），就连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右派集团也清楚地知道，得到苏联方面的承认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对于捍卫自身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

在苏联外交部的文件中列举了摘自荷兰报纸的消息，关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活动家对同苏联建立领事关系的反应。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阿古斯·萨利姆（Agus Salim）表示，他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事情闻所未闻。他指出，他不完全知道苏里普诺的立场，因为按照他的看法，苏里普诺没有签订协定的任何权限。萨利姆补充说，他作为共和国政府的外交部长不承认苏里普诺的活动。同时，他不能不指出，通过广播报道这一事件或许证明是苏联提出的倡议，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方面没有提出过任何请求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承认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独立，他——萨利姆对此感到欣慰。当时，荷兰的另一份报纸援引了收自海牙的消息，报道说，苏里普诺的确从雅加达收到了同俄国进行谈判的任务。^②

据伦敦《泰晤士报》援引印度尼西亚情报部长1948年5月30日的通报，从布拉格召回了苏里普诺。情报部长还确认，苏里普诺没有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6，目录10，卷宗633，案卷46，页码25—26、84。

② 同上，页码46、37。

得到签订这份协定的特别指示，他是按照1947年12月颁发给他的委任状开展工作的。报纸还报道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代表团通知“斡旋委员会”和参加荷兰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谈判的荷兰方面，除了《伦敦协定》签订前已存在的外部联系外，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不打算采取措施建立新的对外关系。^①

但是，荷兰坚持以官方的形式宣布取消苏里普诺的代表资格，要求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发表不打算批准同苏联签订协定的声明。荷兰代表团团长范·布雷登堡（Van Brandenburg）表示，因为按照《林芽椰蒂协定》第一条原则，印度尼西亚全境的主权属于荷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不能依法独自开展外部联系。代表团主席鲁姆（Lum）答复说，放弃印度尼西亚的外部联系，对拥护共和政体的人来说，将只意味着在印度尼西亚联邦建立前取缔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印度尼西亚联邦应该既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也从印度尼西亚领土上的荷兰那里接收主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认为，在印度尼西亚联邦建立前，是它而不是荷兰对自己的领土拥有主权。^②

荷兰政府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同苏联建立领事关系的官方反应接踵而至。5月末6月初，在致苏联外交部的备忘录中和荷兰外交大臣同苏联驻海牙大使的会谈中，荷兰政府抗议苏联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领事关系，说这是与《伦敦协定》的字义和精神相矛盾的。苏联驻海牙大使在同荷兰外交大臣会谈时指出，许多国家——包括英国和美国承认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但荷兰外交大臣强调说，这些国家的领事都在荷兰控制的领土上，苏联也可以在那里有自己的代表。苏联大使对此指出，这与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关系无关，此前荷兰也不允许苏联代表（塔斯社记者和其他代表）在荷兰控制的领土上驻留。^③从中可以看出，荷兰当局在对待印度尼西亚、对待苏联在事实层面承认印度尼西亚、对待苏联代表的态度上是抱有偏见的，这与其他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不同。

1948年9月，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爆发了“茉莉芬事件”——左

^① *Times*, May 31, 1948.

^②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2，卷宗3，案卷2，页码31—32。

^③ 同上，页码54、58—60。

派力量组织了反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的叛乱，刚刚重建的在慕梭领导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参与了叛乱。“茉莉芬事件”爆发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慕梭在茉莉芬市集会上发表演说，坚持尽快同苏联互派领事和建立贸易关系。^①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那些支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的温和的右派领导人拒绝批准同苏联建立联系的协定。结果，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苏联建立领事关系未能实现。1948年5月22日以互换文书方式确定建立外交关系的协定也未能生效。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2，卷宗3，案卷2，页码91。

第5章

国际青年运动中的印度尼西亚问题

苏联对印度尼西亚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国际组织、首先是在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强烈影响下的青年组织中支持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解放斗争。

1946年10月24日，负责同其他国家青年联系的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发布命令，从10月25日起脱离苏维埃情报局，开始由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领导。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通过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在1945年11月建立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和1946年8月建立国际学生联合会的过程中、在巩固这些组织中左派的领导地位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在联共（布）中对外联络部的报告中指出，这些组织的活动的主要成果是：“在国际局势越来越紧张和反动势力的阴谋手段层出不穷的条件下，这些组织，首先是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展现出了自己的生命力，坚守在反帝国主义的阵地上。”^①到1946年年初，这些国际青年组织的总的政治路线是支持西方国家的左派力量。从1946年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428，页码74。

年初开始，苏联掀起了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运动。这些国际青年组织都加入到这场宣传活动中来。

继在联合国发言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之后，从1946年1月起，苏联开始吸收这些国际青年组织参加反殖民主义的宣传活动。被列入国际青年组织日程的所有实践活动都是关于同正在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印度尼西亚青年团结起来的问题。例如，在1946年1月21日由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起草、经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绝密文件《给参加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执委会会议的苏联代表的指示》中规定，苏联代表团要完全支持印度尼西亚青年组织的要求，力争让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支持停止对印度尼西亚的干涉行动。^①与此同时，苏联代表还注意到印度尼西亚代表努力呼吁国际社会进步力量关注印度尼西亚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并支持这一努力。在提交给联共（布）中央的关于参加布拉格国际学生大会（1946年8月18日至9月3日）的苏联代表团的工作报告中，谈到了印度尼西亚代表（包括苏里普诺）的积极活动，他们坚持把在这次大会以及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学生联合会的所有决议中写入反帝国主义斗争这一任务，列入大会的建议书。^②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说：“我们同情在那些尚未取得独立的国家中正在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学生们。我们要团结我们的印度尼西亚同志，承诺支持他们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③苏里普诺被选为国际学生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946年，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执委会收到了全印度学生联合会的邀请信，邀请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委员会访问印度。委员会由四人组成，其中包括苏联代表、杂志记者切特金娜。代表团在1947年2月访问了印度，当时那里正在召开亚洲国家会议。代表团与来自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与会青年代表举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提出了1947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东南亚青年会议的想法。但是，由于荷兰对印度尼西亚发动了新的殖民战争，这次会议改到1948年年初在加尔各答举行。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71，页码42。

② 同上，页码106。

③ 同上，页码126。

第一节 关于加尔各答东南亚青年会议（1948年2月）

1948年2月在加尔各答召开的青年会议，直到现在一直吸引着西方印度尼西亚问题研究者的关注。在“冷战”时期的史学作品中广泛流行这样一个观点：在这次会议期间苏联向一系列东南亚国家（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共产党人下达了直接指示，要求他们武装反抗殖民主义者和本地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府，夺取政权，确保自己的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①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持客观立场，对这次会议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细心的和审慎的分析。^②

西方学者谈到了从1948年年初后苏联对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件改变了态度，并把1948年秋印度尼西亚发生的共产党起义（“茉莉芬事件”）与这种改变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苏联对亚洲（包括当时处于苏联利益范围边缘的印度尼西亚）没有明确的政策，那么，从“冷战”爆发开始以及随着英国和荷兰发动反对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殖民侵略，苏联就开始倾向于支持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因为运动旨在反对英国和荷兰在这一地区的优势，尽管运动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领导。这些学者的理由是，在苏联的报刊和政治类学术作品中指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政治影响的增强，迫切地建议为共产主义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统一而斗争。同时，正如麦克威指出的，不要求共产党人像以往一样争夺民族解放

^① Arnold C. Brackman, *Indonesian Communism. A History*,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3. Thompson V. and Adloff R., *The Left Wing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 1950. Jack H. Brimmel, *Communism in South East Asia: A Political Analysi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Amry Vandenbosch and Richard Butwell, *Southeast Asia among the World Powers*,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58. Krouf J. 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65.

^② 关于这个问题最好的研究成果是麦克威的著作：Ruth McVey, *The Calcutta Conference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Uprisings (Interim Reports Series,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Southeast Asia Progra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 Ruth McVey, *The Soviet View of the Indonesian Revolution (Interim Report Series,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Southeast Asia Progra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运动的领导权。^①按照她的观点，苏联领导人持这样的态度有许多原因，首先是他们不相信共产主义在亚洲、甚至是同一时期的中国有胜利的可能。^②

因此，西方研究者认为，在1947年秋之前苏联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是不断加大对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领导的旨在反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分子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

按照他们的观点，从1947年秋天开始，苏联的方针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建立和宣布世界分裂为两大对抗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理论有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领导摆脱殖民压迫和争取独立的斗争被称作假象，被视为当地民族主义者与封建主义者相勾结的结果。只有进行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人民民主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中国宣布的“新民主主义”应该成为亚洲人民效仿的榜样。现在，苏联开始号召亚洲人民在自己的国家为建立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反帝国主义的统一集团而斗争。^③

西方学者多半是从苏联亚洲问题专家在杂志上刊登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政论性文章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材料出发，而没有列出关于苏联从事秘密活动的任何具体证据。

西方分析家论证关于从1947年秋天开始苏联对印度尼西亚政策发生变化的一个论据是，苏联宣传中充满好战性的反殖民主义的言辞（号召进行武装斗争）的数量在不断增多。^④但是，如果说使用对外政策宣传材料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那么，使用对研究者开放的联共（布）中央对外联络部的秘密工作文件就可以看出，并没有遵循强化好斗精神的方针，政论性文章仍保持惯有的、足够谨慎的特点。不久前解密的涉及苏联对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政策初始阶段的联共（布）中央档案文件（包括加尔各答会议的文件）无法证实大部分西方研究者的观点。

① Ruth McVey, *The Soviet View of the Indonesian Revolution (Interim Report Series,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Southeast Asia Progra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4.

② Ibid., p. 19.

③ Ibid., pp. 32–33.

④ Arnold C. Brackman, *Indonesian Communism. A History*,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3, p. 67. Jack H. Brimmell, *Communism in South East Asia: A Political Analysi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255–263.

为了论证我的观点，我想分析以前未对研究者开放的联共（布）中央对外联络部档案——在准备东南亚青年会议材料时给苏联代表团的指示和代表团的报告；党和团的领导层对东南亚当前局势的反应；直接与1948年2月加尔各答青年会议相关的文件。在我看来，这些文件比宣传材料和代表团的发言更准确地反映了苏联领导层的立场和观点。

第二节 东南亚国家青年会议的准备工作的

关于亚洲国家青年会议的问题是布拉格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委员会在1947年8月决定的。关于殖民地青年的需求问题和准备东南亚国家青年会议的问题，苏联代表收到了如下指示：

- 争取让委员会批准执委会关于支持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斗争，赋予印度、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人民完全独立和民主自由的决议。

- 争取让委员会批准关于帮助殖民地和附属国青年的具体纲领，在这些国家广泛组织捍卫殖民地青年的权利和需求的运动。

- 支持1947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东南亚青年会议的建议，以便巩固这些国家民主青年的团结。

- 提交关于组织曾去过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委员会委员访问各国（首先是英国、法国、美国和荷兰），以便让广大青年群众了解殖民地青年的状况和需求的建议。

- 支持关于把委员会访问印度的材料和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提交给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建议，以便在报刊上广泛刊登。

- 赞同秘书处关于接收印度尼西亚青年联合会加入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决定。^①

鉴于印度尼西亚战火重燃，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委员会通过了关于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247，页码199。

在印度召开东南亚国家青年会议的相应决议和决定。

国际学生联合会还广泛开展了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主要是通过维护正在为自由而斗争的青年的决议。在国际学生联合会领导层的框架内建立了殖民地局，从1947年11月起由印度尼西亚代表苏吉奥诺（Sugiono）领导。^①1948年1月，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学生联合会执委会会议前夕，苏联代表团再次收到表达同印度尼西亚和其他殖民地的战斗青年团结在一起的指示，开展支持他们的运动和号召全世界的青年都支持他们。^②代表团还要努力让执委会指出国际学生联合会在帮助殖民地和附属国学生的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建立殖民地基金会支援正在为国家独立而斗争的学生们的决定。^③关于筹备和召开东南亚国家青年会议的决议案得到国际学生联合会的支持，国际学生联合会决定也参与进来。

1948年2月16~24日，就在加尔各答召开东南亚国家青年会议之际，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在罗马召开了非常会议。会议讨论了殖民地局的报告并基本上批准了。^④

在给参加罗马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执委会会议（1948年夏天）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中规定：

- 根据指示——通过由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秘书处圆满执行联盟委员会会议关于召开东南亚国家青年会议的决定。指出，这一决定和声援印度尼西亚战斗青年的运动……是巩固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同民主青年之间联系的重要手段。

- 批准书记处关于每年2月举办世界民主青年和为自由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青年团结的纪念日。

- 在1948年8月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委员会会议上听取委员会关于东南亚国家青年会议的情况报告。^⑤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430，页码7。

②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430，页码7；卷宗432，页码3—5。

③ 同上，页码20。

④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429，页码104—120。

⑤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432，页码39—43。

在罗马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执委会殖民地局的报告中指出，殖民地和附属国总共 99% 的委员来自 7 个东南亚国家的 11 个组织，这是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大量工作和青年委员会访问这些国家的结果。在加尔各答召开东南亚国家青年会议对于巩固这一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报告指出了支持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殖民地青年的那些措施的重要性，如呼吁抵制向印度尼西亚海岸派遣军舰。与此同时，报告中还强调了巩固殖民地局的重要性，组织殖民地局帮助和恢复对殖民地青年的物质支持，因为只是号召这样做不会取得应有的效果，出版殖民地局新闻简报，在印度建立同东南亚国家的联络局，作为国际学生联合会参加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常设机构。

报告的中心内容是关于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殖民地政策的新表述问题：如果说早先反殖民主义的浪潮主要是针对英国、法国和荷兰的，那么，现在建议把美国作为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对象，如今美国是“老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统帅”。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建议“殖民地的青年以及全世界的青年的斗争对准反动派的旗手——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英国、法国和荷兰”。强调了“把殖民地的战斗青年同全世界的战斗青年联合起来、建立反对挑拨战争的维护和平与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敌人。

报告指出了各殖民地出现的新现象：当地的反动派与帝国主义结成了反本国青年的同盟，例如印度、伊朗、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并没有被列入这类国家的行列，尽管当时哈达的反共产主义政府已经掌权。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很有可能是：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苏联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代表在进行关于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的谈判。报告强调：“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世界民主青年联盟都应该干预、支持青年进行反这种进攻的斗争（对殖民地青年权利的反应——作者注）”。这种干预的例子比如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动员民主社会舆论和行动来声援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的青年。提出了全世界青年伸出援助之手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干预中东青年的斗争——“如果其自身力量过于软弱，就需要这样做”——的任务。指出了开展援助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青年运动的必要性。

1948 年 3 月 10 日，由参加罗马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会议的苏联代表起草的关于罗马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执委会工作问题的报告，提交给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和联共（布）中央对外联络部，报告中说：

“执委会号召殖民地青年开展更为坚决的反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斗争，挫败他们破坏人民团结的企图。”指出了联盟工作的优点：开展捍卫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殖民地青年权益的运动，筹备东南亚国家青年会议。^①

第三节 加尔各答会议前夕世界民主青年联盟 委员会的印度尼西亚之行（1947年5~6月）

1946年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执委会收到了印度学生联合会方面邀请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委员会访问印度的信。委员会由四人组成，其中包括苏联代表——东南亚问题专家、记者切切特金娜。1947年2月，代表团前往印度访问。在德里，代表团受到了同一时间应尼赫鲁的邀请前去参加亚洲国家会议的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的青年代表的欢迎。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团接受了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一些东南亚国家的邀请，于1947年5~6月对印度尼西亚进行了为期三个星期的访问。

1947年6月，代表团在前往东南亚之前向莫斯科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执委会报告了自己的行程。按照惯例，执委会中的苏联青年代表收到了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下达的、经联共（布）中央对外联络部批准的指示。关于“殖民地青年的状况和需求”问题，指示中谈到必须争取让执委会发表关于支持殖民地人民和殖民地民主青年的民族解放斗争，赋予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埃及完全独立和民主自由的声明。根据该报告，前往东南亚访问的代表团奉命力求通过具体建议，其目的是为了保障：

- 巩固联盟同殖民地和附属国青年的联系；
- 在所有国家的青年中组织开展援助殖民地青年的运动，提高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平；
- 向联合国提交关于殖民青年问题和捍卫其权利的报告；
- 在报刊广泛开展关于殖民地青年的问题和需求的活动。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429，页码5。

在指示中还含有支持关于在 1947 年年末或 1948 年年初召开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青年会议的建议，其主要目的是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建立与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保持联系的劳动青年联合会。

赞成在印度或印度尼西亚召开青年会议，支持关于不仅邀请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进步青年和学生联合会，也邀请蒙古、朝鲜和一些苏维埃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客人参加会议的建议。

在会议筹备委员会的组成问题上，执委会中的苏联代表应该坚持由参加会议的组织的代表以及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和国际学生联合会的代表组成，同时，筹备委员会应该在会议召开国开展工作，在 1947 年夏天布拉格青年联欢节期间就应该着手工作。^①

这份指示还附有联共（布）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巴拉诺夫的信件。信中指出，指示中的主要立场事先已征得对外联络部的同意，而关于召开殖民地青年会议的思想也得到对外联络部的支持，并已征得联共（布）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的同意。^② 巴拉诺夫在附信中写道：“苏斯洛夫同意了，可以行动了。1947 年 11 月 6 日。”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执委会在莫斯科逗留的后期，1947 年 6 月 16 ~ 23 日，执委会中的苏联委员向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库兹涅佐夫、苏斯洛夫提交了工作报告。报告中谈到了前往东南亚代表团成员——切切特金娜、罗歇（法国）、托米奇（南斯拉夫）也参与了执委会工作。执委会批准了委员会的报告，声明支持殖民地人民和这些国家的民主青年的民族解放斗争，认为应该赋予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人民完全独立和民主自由，认为必须支持殖民地和附属国青年的斗争，委托秘书处给这些国家的青年寄信以号召他们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同时，执委会指出，目前联盟在殖民地国家青年中的工作还很薄弱，强调必须竭尽全力加强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捍卫殖民地青年的权利和利益的工作，扩大和巩固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同殖民地和附属国青年之间的联系。

通过了在各国和在青年刊物上开展帮助殖民地青年的运动的决定，努力改善他们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状况，以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名义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 17，目录 128，卷宗 247，页码 183。

② 同上，页码 182。

向联合国提交关于殖民地青年问题和捍卫青年权利的报告。

报告中还谈到了关于1947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东南亚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青年会议，以便增强这些国家民主青年的团结的决定。决定邀请印度、缅甸、锡兰^①、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暹罗^②、越南、菲律宾的青年以代表团的身份参加会议，邀请中国、朝鲜、蒙古、苏联的各中亚共和国以及新西兰、伊朗、伊拉克、埃及的青年以观察员国的身份参加会议，邀请英国、法国、荷兰、美国以及斯堪的那维亚、巴尔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国家的青年以客人的身份参加会议。

执委会认为有必要让前往东南亚的委员会造访英国、法国、荷兰、美国和其他国家，在这些国家宣传执委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定。执委会还决定把委员会的材料和自己的材料寄给其他国际组织——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民主妇女联合会、联合国善后基金组织等，同时随文附带他们关于在捍卫殖民地青年利益问题上共同工作的建议。

执委会讨论了印度尼西亚青年联合会致联盟的信件，信中请求支持禁止荷兰向印度尼西亚新派遣军队，并从共和国领土撤出原有军队，为此向联合国和荷兰政府寄发关于满足印度尼西亚青年要求的信件，号召装载着军需物资的法国和荷兰的军舰停靠口岸所在地的青年们阻止把这些物资运往印度尼西亚和越南。

根据执委会工作的结果，苏联代表向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和联共（布）中央提交建议，准许来自中亚和哈萨克斯坦苏维埃共和国的代表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东南亚青年会议，准许切切特金娜作为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委员会成员前往英国、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讲述殖民地青年的状况并宣传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委员会关于支持殖民地青年争取权利和需求的斗争的决定。^③

总体上可以指出，在宣布世界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的“日丹诺夫理论”出台后，在国际青年组织和苏联青年组织的文件中没有找到有关他们在殖民地问题上的活动性质发生变化的任何迹象。他们在东南亚各国的活动可以被看作宣传一种思想，即真正独立的社会主义革命或者反对“与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分子相勾结”的本地资产阶级集

① “锡兰”是斯里兰卡的旧称。——译者注

② “暹罗”是泰国的旧称。——译者注

③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247，页码187—191。

团的斗争不可分割。

在“冷战”爆发的情况下，苏联把针对美国、英国、荷兰、法国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列为自己的任务，在它的积极参与下建立了亲共产主义的国际青年组织——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和国际学生联合会，并向其提供财政资助。一个主要方式是强烈谴责西方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活动，积极宣传支持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

坚持捍卫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代表们，竭力支持国际青年组织的反殖民主义宣传，努力利用这些组织的活动作为向殖民主义者施加压力的有效手段，并争取国际社会舆论站在自己一方。

在国际青年组织的文件中广泛使用充满激情的和好斗精神的宣传性言辞可以解释这一切。

至于苏联的秘密工作文件——指示和报告，其中使用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言辞非常温和，在1945～1948年这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言辞并不严厉。

与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和负责国际青年运动事务的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保持工作联系的联共（布）中央对外联络部的文件证实了这个结论。

1947年秋，鉴于9月初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和通过了九国共产党会议宣言——其中包括宣布世界分裂为两个世界的“日丹诺夫理论”，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和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讨论了面临的新任务。1947年10月21日，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通过了关于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作的决议，在决议中说：“委托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和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局，在一个月内准备和提交关于在各国恢复和建立共青团或劳动青年组织的建议，以便供联共（布）中央研究，要考虑每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和民主青年运动的政治水平。”^①随后，这个问题在没有经过任何事先研究和与联共（布）中央协商的情况下就于1947年11月在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会议上进行了广泛讨论，全体会议委员、委员会工作人员、来自莫斯科共青团组织和学生界的嘉宾出席了会议。

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代理主席沃伊诺娃在自己的报告中指出：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249，页码99。

“从这次会议的角度来看，从这份宣言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考虑各个民族的特点，争取恢复和巩固各国的青年团，帮助创造条件：交换青年团的工作经验、协调行动、考虑为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培养领导干部的问题。这是非常繁重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解决起来不那么容易。但是，我们生活和工作在苏联，在共青团中央的领导下做团的工作，我们应该思考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了在各国建立共青团组织，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可以帮助现存的团组织，为了让共青团组织达到它应有的状态，为了让广大民主青年阶层在共产主义组织中团结起来……我们应该做哪些工作？”^①

沃伊诺娃说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了共青团，而其他一些发言人说在欧洲各国建立了共青团。切切特金娜在大会发言时提出了在亚洲各国建立共青团组织的任务：“我认为，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做这件繁重的工作，帮助建立殖民地国家工人青年联合会，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②

这些讨论以及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和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根据这些讨论通过的决议，均遭到了联共（布）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坚决否定。1947年12月末，对外联络部就这个问题起草了一份报告，在1948年2月提交给联共（布）中央书记苏斯洛夫。^③ 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巴拉诺夫在报告附信中特别摘选了沃伊诺娃、谢维尔和切切特金娜的发言。

在这次关于委员会工作和任务的大会上谈到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宣言时，委员会代理主席沃伊诺娃同志指出了委员会工作中的不足，如委员会没有详细解释恢复共青团问题的建议，没有把这个问题列为委员会的迫切任务。乌克兰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谢维尔和委员会全会委员切切特金娜在发言中要求委员会为恢复国外青年团采取积极措施。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认为，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犯了一个错误，臆想在其他国家恢复和重建共青团，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249，页码99—100。

② 同上，页码101。

③ 同上，页码99—101。

实际上这是试图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还认为，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沃伊诺娃）表现出了不负责任的态度，走上了公开讨论不属于委员会的任务——关于在其他国家恢复和重建共青团的问题——的道路。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建议取消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不正确决定。”^①

在1948年11月19日由联共（布）中央对外联络部起草的报告《关于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国际工作》中，对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有关国际青年运动的工作提出了严厉批评。^②在这份报告中，对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持肯定态度的是：苏联青年代表在组织青年会议——包括东南亚青年会议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极大地提高了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在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的威信。同时，文件中说：

联共（布）中央对外联络部掌握的材料证实：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在国际青年运动问题上有时给自己的代表团和国外代表的指示是不正确的，也没有追踪对联共（布）中央近来指示的执行情况。

正因为如此，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和国际学生联合会中的苏联代表经常表现出不负责的态度，通过的决定给我国在国际青年运动和学生运动中的利益造成了损害。^③

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领导人没有向联共（布）中央报告本部门国际工作中的其他重要问题。苏联代表团在与外国人进行业务会谈时通常没有做记录，也没有向联共（布）中央报告会谈内容。^④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249，页码102。

^②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428，页码74—83。

^③ 同上，页码74—75。

^④ 同上，页码76。

在没有仔细地研究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和国际学生联合会的状况、没有分析世界青年运动状况的情况下，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有时会匆忙地就国际工作的问题通过一些未经深思熟虑的决定（作为例子援引了关于在一些国家恢复和重建共青团的决定）。^①

在分析了上述文件后，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联共（布）中央领导层在宣传性讲话、文件和报刊上激发苏联青年和世界亲共产主义青年的革命热情，同时对苏联青年活动家采取具体措施把热情号召付诸实际的尝试持否定态度，坚决制止了苏联青年领导人把宣传性言辞当作行动指南。

第四节 1948年2月加尔各答青年会议的工作及其结果

1948年2月19~26日，青年会议在加尔各答（印度）召开。有93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分别来自25个国家的左派青年团体。以代表团身份参加会议的青年组织有：印度18人；巴基斯坦9人；缅甸7人；马来亚1人；印度尼西亚5人；越南6人；锡兰1人；菲律宾2人；中国7人。总共56名代表拥有决定权。还有15人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他们分别来自北朝鲜、蒙古、苏联的一些亚洲共和国。以客人身份参加会议的有：苏联一些青年组织的代表（3人）、加拿大、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总共22人。

苏联青年代表团收到了经联共（布）中央对外联络部批准的如下秘密《指示》：

同意下列会议议程：

1. 东南亚国家青年反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和平与民主的斗争；
2. 东南亚国家青年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状况与需求；
3. 巩固国内青年运动的统一和通过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和国际学生联合会发展同民主国家青年的关系。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428，页码80。

关于东南亚国家青年反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和平与民主的斗争的问题

- 通过支持东南亚国家青年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自由（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马来亚、缅甸和其他殖民地和附属国），争取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决议。

- 会议应该号召世界民主青年支持殖民地国家人民反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这是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总的斗争的一部分。

- 谴责美国、英国、荷兰和法国政府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挑起殖民战争的帝国主义政策。号召法国和荷兰的民主青年组织抵制向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运送武器的活动和反对本国反动政府犯罪政策的群众集会。在这一章节的结束部分，号召谴责英国在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的政策。

在《东南亚青年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状况和需求》这一章，建议听取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缅甸、锡兰、越南代表团就此问题的报告，就一些刻不容缓的要求提出建议，青年应该为实现这些要求而奋斗：

- 对全体青年——提供政治权利和基本的社会权利；
- 对青年工人——工作保障和社会保障；
- 对青年农民——分配土地、限制地主剥削，等等；
- 对青年学生——免费教育和帮助接受教育；
- 对所有人——赋予自由联合建立民主组织的权利。鉴于此，建议批评那些限制民主权利的亚洲国家（中国、埃及、韩国、伊朗）。

会议整理出来的所有要求都应该提交给联合国。

会议应该向全世界民主青年发出号召，号召他们更坚定地支持东南亚国家青年（包括印度尼西亚青年和越南青年）的民族解放斗争，号召他们拿起武器捍卫本国人民的独立和自由。

会议应该向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提出积极与东南亚国家联络的要求。

在这一章节的结论部分写道：

在会议的决定中必须强调，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青年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和民族独立，只有毫不妥协地进行反帝国主义势力和反动派的斗争，才能得到自己的全部权利。

在《指示》的最后一章“关于巩固各国国内青年运动的团结和通过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和国际学生联合会加强与全世界民主青年的联系的任务”中，强调了同一些资产阶级组织的领导人破坏青年团结的企图进行斗争的重要性以及在东南亚国家的企业、学校和农村建立劳动青年群众性组织；建议在印度或印度尼西亚出版面向整个东南亚国家的青年杂志；提醒为青年组织培养领导干部的重要性；建议“同意关于会议结束后指派1~2名联盟的工作人员在某个与会国家长期停留，以便执行这些任务”，通过“关于在印度建立处于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秘书处领导下的联盟殖民地支部”的决定。

苏联代表团事先要广泛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绩，特别是在一些亚洲国家。

1948年3月22日，由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米哈伊洛夫起草的苏联代表团关于《东南亚国家青年会议总结》报告，呈报给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库兹涅佐夫、苏斯洛夫和波波夫。^① 报告开头宏观介绍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团、会议议程和会议进程。

关于第一个问题“东南亚国家青年反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和平与民主的斗争”的报告由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做。许多国家的代表在讨论时发言，包括印度尼西亚、缅甸、马来亚。报告中指出：“所有人的发言都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战斗性质。发言人谈到了民族资产阶级与英国、美国、法国、和荷兰帝国主义相勾结，其实是背叛。”

关于第二个问题“东南亚青年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状况和需求”的报告由印度、巴基斯坦、马来亚和缅甸代表团做。在报告中和展开讨论中谈到了关于这些国家的青年处于无权地位的问题。苏联代表团团长哈尔拉莫夫以苏联代表团名义在会议上致贺词。“他说的关于苏联、关于斯大林同志的话，迎来暴风雨般的掌声和众人欢呼，人们以此表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427，页码46—58。

达对苏联人民和斯大林同志的敬意。”报告中指出，“与会人员认真听取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代表关于苏联中亚共和国青年状况的讲话”。

总体上，会议是在相互信任的气氛中进行的。唯一的不和谐音符是二战期间怀有亲日情绪的印度活动家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h Chandra Bose）^①兄弟及其拥护者强迫与会人员赞成鲍斯的反西方国家的活动。正如报告中指出，“筹备委员会委员们不知所措，他们（拥护者——作者注）准备同意鲍斯的要求。在与苏联青年代表团领导层会谈后，他们明白了自己的错误”，拒绝了鲍斯拥护者的通牒。

报告中说：“会议就所有问题通过的决议均符合给苏联代表团的相应指示。”会议一致同意支持东南亚国家青年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谴责了英美支持的荷兰和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政策，号召青年们阻碍这一政策的实施，支持殖民地青年的斗争和需求，其中包括瓦解大土地所有制的封建体制和对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实施国有化。会议强调了青年团结的重要性，指出，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从事反对美国挑拨战争的斗争是对东南亚国家青年最直接的和最大的帮助。

接着记述了会议期间实施的一些措施：在“把手从亚洲拿开！”的口号下组织游行，在游行中青年喊出了“青年团结起来，冲锋，胜利！”“苏联万岁！”“民族革命万岁”等口号。在随后的集会上还出现了“斯大林元帅万岁”的欢呼声。在其他一些集会和群体性活动中重复使用了这些口号。

苏联代表团同来自其他国家的青年代表团举行了会晤。在报告中对此指出，在会晤过程中讨论了东南亚国家的青年运动问题，讲述了苏联青年的生活状况以及关于苏联的科学、文化和教育情况。向与会人员和广大群众展示了反映苏联青年生活的电影剧目，其中有游行人群表达对苏联和斯大林祝愿的影片。

报告指出，印度政府对会议的态度“非常冷淡”，因为受政府控制

^① 苏巴斯·钱德拉·鲍斯（1897 ~ 1945），印度国大党领导人。曾加入甘地领导的反对英国统治的不合作运动。1938年成为印度国民大会党主席，但因和甘地政见相左于次年辞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鲍斯前往德国，并且在德国组成2000人的印度旅团。1943年前往日本，在东京方面的支持下于1943年10月21日成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并且就任印度国民军的最高司令官，同年参与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鲍斯在8月18日搭机前往日本的途中由于飞机坠毁而去世。——译者注

的报纸对会议保持沉默，详细介绍了苏联代表团的言论，而不探讨其本质。

接着，报告介绍了苏联代表团成员眼中的印度政治、经济特点和社会状况。指出，政府不想进行改革，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增强，亲美宣传的积极性在增长。建议积极加强苏联在印度的宣传，开展青年工作。

对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来讲，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报告的结论部分：

苏联代表团在印度逗留期间，越南副总理范文同博士^①接见了代表团。1948年2月27日，范文同博士在加尔各答发表了如下意见：

关于印度尼西亚的形势。范文同博士表示，近来印度尼西亚的事件——包括《伦敦协定》的签订，表明印度尼西亚党（共产党——作者注）执行了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政策，不善于领导群众运动，把领导权让给了资产阶级政党。范文同博士认为，所有用鲜血夺取的果实未经战斗就被葬送了。在整个战争时期，印度尼西亚的进步力量过多地进行了建立外交关系等方面的国际宣传，而没有把内部力量真正团结起来，最终失去了一切。

范文同博士认为缅甸的形势也不好。“马克思主义同盟”领导一切，与它并存的是共产党。按照范文同博士的话说，两者之间并没有原则性分歧，纲领和口号也是一致的，但在马克思主义同盟和共产党的领导层内部存在分歧和私仇……

按照范文同博士的话说，在东南亚现行条件下，如果不考虑越南的话，缅甸不算是先进的民主国家。范文同博士强调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缅甸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因此，越南同缅甸之间的关系更紧密了。越南的人民战争沿缅甸边界展开，这是为了得到缅甸方面许诺的武器和物资。

范文同博士认为，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一个特点是党内存

^① 范文同（1906~2000），越南共产党、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是胡志明的得力助手，长期出任越南总理的职务，曾协助胡志明建立印度支那共产党。——译者注

在数量众多的“极端左派”集团，不善于看到战略和策略、原则和策略之间的区别。在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只言片语后，他们就患上了“左派”幼稚病。有不少人是公开的托洛茨基分子，对苏联持敌视态度。范文同表示，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都感到经过培训的和成熟的干部严重不足，与设在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联络不够，由于经费短缺无法得到足够数量的报纸《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范文同请求在这方面提供帮助。

……接着，范文同请求转告，询问苏联是否可能向越南提供货币（美元、英镑）援助，原因是中国和菲律宾可以买到足够数量的武器。

范文同还谈到了关于得到党务干部和军事干部帮助的迫切性，因为直到目前仍在进行半游击式的战斗。现在到了决定性时刻，需要有经验的作战人员。……空军（完全没有）和重型武器严重不足。……范文同请求尽力帮助在全世界宣传越南的宪法和散发其他一些材料……

范文同博士到了印度，因甘地遇害一事受官方委托向尼赫鲁政府表达慰问。同时，他还受委托负责参加青年会议的越南代表团的工作，负责同缅甸和其他国家的党建立联系的工作。……

最后，范文同转达了对联共（布）和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兄弟般问候。

显然，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首先阅读了苏联代表团关于加尔各答会议的情况报告。1948年4月5日，对外政策部部长普雷舍夫斯基关于这份报告的总结报送给书记处苏斯洛夫：

与越南相关的问题，单独报告给苏斯洛夫同志，1948年3月16日。此外，1948年4月2日，向苏斯洛夫提交了范文同1948年2月27日的信件，这封信是经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哈尔拉莫夫收到的，在信中谈到了在这份报告中阐述的所有问题（显然，扼要阐述了苏联代表团报告中的内容——作者注）。

关于印度尼西亚的局势，在1948年2月致政治局委员的报告中谈到了，从那时起局势没有发生变化。

关于与情报局联络难以得到报纸《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问题——由尤金定期返回莫斯科时汇报。

情报材料中其他问题，没有要求执行。^①

1948年5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国际学生联合会执委会会议，会议研究了在加尔各答召开的东南亚国家青年会议的情况。参加这次会议的苏联代表在致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和苏斯洛夫的报告中，对国际学生联合会的这次会议给予了积极评价，强调会议具有战斗性和进步性，在团结青年和学生为争取自由、和平和民族完全独立而斗争的事业中作出了巨大贡献。^②

1948年8月，在华沙召开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例会上讨论了加尔各答会议情况。在苏联代表团致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和苏斯洛夫的报告中谈到，印度尼西亚代表苏拉杰（Suraj）在委员会会议上对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支持印度尼西亚民主青年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斗争表示感谢，他请求今后能更积极地支持这项斗争。世界民主青年联盟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表示同意这个愿望。加尔各答会议高度评价了帮助和团结印度尼西亚青年及其他殖民地国家青年的重要意义。^③

在这些分析文件中，没有任何一点关于联共（布）中央通过参加加尔各答东南亚国家青年会议的苏联代表团致力于推动以及直接指示印度尼西亚青年或共产党人掀起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政府的起义、以便在印度尼西亚进行激进的社会变革的暗示。

应该指出，不管是苏联观察员（切切特金娜）还是越南共产党人（范文同博士），都强调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理论薄弱，缺乏拥有经验的、成熟的干部，没有能力领导群众投身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观察家们还指出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队伍中存在着强烈的左倾情绪。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越南共产党人都抱怨说，他们同联共（布）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247，页码59。

②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427，页码147。

③ 同①，页码8—14。

之间没有定期联系，孤立于设在贝尔格莱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之外，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彼此之间也缺少稳定的联系。

分析上述文件后，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尽管联共（布）中央对外联络部努力关注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局势和事件，自然，首先是关注共产党人的生活 and 活动，在这一时期联共（布）中央回避参与他们的事务，不希望牵扯他们的内部政治斗争。

和先前一样，苏联与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尤其在这一地区处于对抗状态，苏联的目标是削弱美国、荷兰、英国和其他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影响。

第6章

慕梭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纲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的新道路》的制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巨大变化。1935年慕梭建立的地下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日本占领时期组织党员参加了抵抗运动。许多党的著名领导人都流亡到国外。结果，在宣布独立的时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处于软弱、涣散状态。

从1945年秋开始，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逐步复兴。1945年10月21日，成立了合法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由名气不大的活动家尤瑟夫（Yusuf）领导。1946年2月，尤瑟夫因参与反政府暴乱被共和国当局逮捕。1946年3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资深领导人之一沙尔佐诺（Sarjono）^①由澳大利亚返回

^① 沙尔佐诺（1898～1948），印度尼西亚社会活动家，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澳大利亚流亡，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后返回印度尼西亚，被选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译者注

爪哇，在1946年4月召开的党的会议上被选为党的领袖。稍后，另一名最近几年在中国流亡的著名共产党人阿利敏也回来了并加入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二战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员都加入了新成立的共产党。许多人加入了其他左派政党和组织——工人党、社会党、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左派工会，很快，他们就在这些组织和政党中处于领导地位。在为争取独立而进行武装斗争和外交斗争以及西方同苏联之间爆发“冷战”的复杂条件下，共产党人采取了形式上加入非共产党组织的策略，努力通过他们动员围绕在左派领导人周围的印度尼西亚劳动人民，此举旨在避免引起国内外反共产主义力量的警觉。

共产党人对印度尼西亚国内政治生活的影响开始逐步增强。到1947年他们已经在临时议会中拥有了明显优势，占据了接近一半的席位。著名的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沙里夫丁从1945年年末起就成为常任国防部长，左派集团在共和国武装力量中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从1945年11月14日到1947年5月27日，政府由社会党领导人沙里尔领导，一些共产党人占据了部长职位。1947年7月3日，亲近共产党人的沙里夫丁组阁。左派——由共产党、工人党、社会党、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其他一些较小组织组成的政治同盟——成为他的执政基础。

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没有制定行动纲领。在注意到共产党人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后，1947年1月召开了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指明了在印度尼西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向。

但是，在1948年1月23日同荷兰签订了对共和国来说灾难深重的《伦敦协定》后，沙里夫丁内阁垮台。新的政府由哈达领导，他推行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武装力量中削弱左派力量的方针。1948年2月，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发生分裂，由沙里尔领导的社会党右派离开了社会党。

在这个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来说复杂的时刻，印度尼西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慕梭返回国内。1897年，慕梭出生在东爪哇谏义里州柏库村。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师范学校学习。在那里，他同阿利敏及一些在当局占据高职并热心于印度尼西亚教育事业的荷兰人交往甚密。同阿利敏一样，慕梭在寄宿学校生活了几年，这所学校得到在泗水的著名印度尼西亚社会政治活动家

佐克罗阿米诺托 (Tjokroaminoto)^① 的资助。慕梭同也生活在那里的未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总统苏加诺结识。慕梭是一位杰出的组织工作者和政治评论家,是为独立而斗争的勇敢无畏的战士。他在殖民者的监狱度过几年,对荷兰殖民者充满仇恨。他先是加入了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联盟,随后加入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并领导当地的一个支部。^② 他参与了共产国际的工作。在荷兰殖民当局镇压了1926~1927年共产党反抗荷兰统治的起义后,慕梭离开印度尼西亚流亡国外。1935年,他曾短期返回印度尼西亚从事重建共产党的工作。随后,离开印度尼西亚在欧洲生活和工作,最后10年一直在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慕梭在莫斯科,在联共(布)中央第205研究所工作,这是一个公开机构,各国的流亡者都在那里工作,准备情报和分析关于本国形势的材料。他参与了关于印度尼西亚的材料的准备工作,收集印度尼西亚、荷兰和其他国家的报刊材料。

在印度尼西亚的,特别是在西方的历史著述中,1948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著名领导人慕梭从苏联(他在那里生活了20年)回国、制定纲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新道路》以及1948年秋天共产党发动的叛乱——著名的“茉莉芬事件”,都被看作莫斯科一手操纵的结果。很多研究者对此都表示确信不疑。美国学者布莱克曼写道:“我们现在不知道,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知道慕梭在离开莫斯科前得到了什么样的指示。”^③ 荷兰学者范·登·克鲁弗附和说:“毫无疑问,作为莫斯科的间谍,慕梭是带着党的战略回到印度尼西亚的。”^④ 其他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较为谨慎。麦克威指出:“毫无疑问,慕梭是按照莫斯科的命令回到印度尼西亚的,并且在莫斯科形成了纲领的轮廓。”^⑤

不久前解密的联共(布)档案文件没有证实西方学者关于这个问

① 佐克罗阿米诺托(1882~1934),印度尼西亚民族运动和穆斯林运动领导人之一,伊斯兰联盟奠基人及其领导人。——译者注

② Ruth McVey,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68.

③ Arnold C. Brackman, *Indonesian Communism. A History*,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 83.

④ Justus Maria Van der Kroe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65, p. 36.

⑤ Ruth McVey, *Soviet View of the Indonesian Revolution (Interim Reports Series: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Southeast Asia Progra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57, pp. 58-59.

题的观点。在可供研究的材料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慕梭得到了“莫斯科指示”的信息，但找到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文件，这些文件澄清了慕梭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制定的决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新道路》的基础计划和思想根源及其回国后的活动。

档案文件表明，不能认为慕梭是“莫斯科的傀儡”或斯大林与联共（布）中央手中唯命是从的工具。他一直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尽管在莫斯科逗留多年，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着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件有自己的见解，不只是考虑了联共（布）的建议，同时也研究了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经验。

西方学者把慕梭从莫斯科返回印度尼西亚同苏联对沙里夫丁左派内阁垮台和政权转到右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哈达政府手中感到不满联系起来。^① 苏联档案文件更为清楚地解释了 1948 年年初慕梭由莫斯科返回印度尼西亚的原因。有如下一些原因：

第一，联共（布）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之间缺乏定期联络，二战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孤立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苏联是通过国外报刊以及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保持联系的荷兰人那里得到关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所发生事件的情报。这些情报都不完整，也不准确，这从 1946 年 10 月 1 日联共（布）情报局简报 №18（42）刊登的文章《印度尼西亚的局势》可以看得出来。文章得出了乐观结论：“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为了获得自由人民群众做好了做出任何牺牲的准备，各阶层广大劳动人民向往一切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关的东西，这为共产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也就是共产党人）应对国内的严峻局势和掌握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斜体为作者标注）创造了客观条件”。“马克思主义书籍在国内流行。《列宁主义问题》《共产党宣言》《斯大林传》等书籍被译成印度尼西亚语出版和传播。”文章还指出：“毛泽东语录也非常受欢迎。”^②

在共产国际解散和印度尼西亚发生殖民战争的条件下，世界青年

^① Arnold C. Brackman, *Indonesian Communism. A History*,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p. 81 – 83. Justus Maria Van der Kroe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65, p. 36. Ruth McVey, *Soviet View of the Indonesian Revolution (Interim Reports Series: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Southeast Asia Progra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57, pp. 38 – 39, 58.

^②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 17，目录 128，卷宗 94，页码 234。

组织、大学生组织以及工会组织和由他们举办的会议成为联共（布）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进行联络的唯一途径，但这明显不够。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努力同莫斯科建立密切的和定期的联络。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阿利敏请求记者切切特金娜向联共（布）中央转告，希望让慕梭——二战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尽可能快地从苏联返回印度尼西亚。^①

切切特金娜在自己的报告的结论部分指出，她访问过的所有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人，“毫无疑问，需要日常的帮助和指导。各党之间需要建立联系，如果不这样做，陷于孤立的重大危险将会威胁到他们，也不可能就重大的国际和国内问题正确而快速地校准方向”。^② 这样，有充分的根据可以推测：慕梭返回印度尼西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打算在联共（布）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之间建立直接的和更为密切的联系，从而绕开荷兰中间人。

第二个原因，正如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苏联对印度尼西亚政权转入资产阶级右派民族主义分子手里感到不满。档案文件表明，苏联把共产党人失去对政府的影响，不仅归因于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分子支持的右派搞的阴谋，也归罪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在国内斗争中策略不当。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对日丹诺夫关于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的理论没有做出什么反应，也引起了联共（布）中央的愤怒。

显然，按照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的命令，慕梭在收集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和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建立后国外报刊关于印度尼西亚局势的系列评论时，格外留心引起苏联领导人不满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1948年1月22日，在关于印度尼西亚局势的意见中，慕梭努力向联共（布）中央解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论证其正确性，并得出结论：这样的策略巩固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左派力量的阵地。^③

慕梭认为，关于九国共产党宣言、日丹诺夫的报告和其他一些材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249，页码49。

② 同上，页码51。

③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75，页码2—16。

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没有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甚至在共和国的报刊上刊登和进行评论的原因是，共产党人在努力使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开展的反共产主义宣传瘫痪。“共产党人在表面上减少了自己的实力，没有突出自己在共和国政府中的主导作用。把社会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推到前列，包括沙里夫丁、泰米尔（Tamdir）、斯地亚齐（Setiadji）和其他一些公开身份是社会党人但真实身份是共产党人的人士。”“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想回避印度尼西亚反动党派的活动家和一些信教居民的反苏反共攻击以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国外有联系的指控。正因为如此，共和国没有选择苏联或波兰加入联合国‘斡旋’委员会，而是选择了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造成的印象是，共产党只是个不起主要作用的小党。”

按照慕梭的观点，1947年11月11日沙里夫丁组建的内阁“明显证明了共产党人的官方地位处于弱势”，“可以说，内阁重组的结果是政府中社会主义集团的力量比过去明显增强了”，“还有一个对民族解放运动来说非常有益的重大变化，各政党和组织的武装力量移交给了由沙里夫丁领导的印度尼西亚国民军”。

慕梭还让苏联领导人相信印度尼西亚群众对苏联的好感，“至于人民对苏联的态度，可以确定，不仅是共产党人向往社会主义国家，其他阶层的人也是如此”。

同时慕梭指出，1948年1月在同荷兰人谈判期间共和国各派力量的统一行动陷入了危险，原因在于美帝国主义以右派政党为支柱企图把印度尼西亚变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慕梭对右派政党颠覆沙里夫丁的左派内阁的能力提出了置疑。

慕梭准备的关于印度尼西亚形势的分析报告墨迹未干，1948年1月23日，沙里夫丁内阁就倒台了。

在慕梭提交报告的第二天，第205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柯岗和普霍洛夫就把名为《对慕梭同志的意见》的报告呈送给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文件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提出了严厉批评，慕梭努力解释和论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行动的正确性的立场也受到严厉批判。

慕梭同志解释了没有刊登九国共产党会议材料和没有就与九国共产党会议章程相关的问题进行宣传的原因，在于印度尼

西亚共产党奉行独特的政治方针，该方针的目的似乎是挫败“杜鲁门主义”和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开展的反共产主义宣传，手段是有意识地隐瞒自己的真实力量、不突出自己在共和国政府中的重要作用、掩盖自己同国外的联系，等等。

按照我们的意见，如果这种方针的确有市场，那也是消极方针，这种方针的后果已经显现出来了，沙里夫丁被迫同荷兰人（美国人充当中介人）签署了协定，这恰恰是因为共和国包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此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揭露不够，同时促使一部分无觉悟的居民增强了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调停”的信任。如果共产党公布了九国共产党会议决议特别是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那么，人民就会明白目前国际舞台的力量对比。二者必择其一：要么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特殊方针”政策不再起作用，是慕梭同志判断错误；要么是，即使那个方针确实有作用，它也是消极的方针，而慕梭论证了该方针的正确性。

接着，又引证说慕梭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实力的问题上也是迷失了方向。

柯岗和普霍洛夫表达了自己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战略和策略的否定意见。

我们的意见如下：

沙里夫丁政府在美国政府的“调停”下被迫同荷兰人签订了协定，这是基于如下一些理由：（1）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此前一直奉行“不干涉印度尼西亚事务”的立场，事实上向荷兰殖民者提供了全面援助。共和国包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抱有美国政府的“调停”作用对他们“有利”的幻想（沙里尔在美国的使命证实了这一点），没有开展反美宣传，也没有充分揭露美帝国主义的占领政策，使一些人对美国政府的“调停”产生了绝对信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对待九国共产党会议和材料刊登以及会议材料的宣传问题上持消极立场，注定了事件的结果；（2）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上出现了对共产党人不利的局面：马苏

米党，该党试图在美国和荷兰的积极帮助下同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和保守分子结盟……由于农业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在印度尼西亚很难立即解决），很大一部分农民在马苏米的虚假宣传下持中立态度，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虚假许诺巩固了这种态度……因此，沙里夫丁和共产党人被迫尊重这一力量对比的不利局面，采取旨在揭露马斯友美党及其身后的美帝国主义分子的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同荷兰人签订协定是正确的，也是被迫的，但是，如果共产党在对待九国共产党会议问题上不持消极立场并且早就积极开展反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宣传，就不会遇到现在出现的这种局面。在文件的结尾部分指出，这些意见还没有同慕梭同志讨论过，因为他生病了。

印度尼西亚的局势在哈达掌权和第205研究所的意见呈报给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后变得更为严重，对外政策部认为，必须让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高层领导人注意到这种情况。

1948年2月18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东南亚司司长普雷舍夫斯基的报告《1948年1月17日印度尼西亚同荷兰签订协定后印度尼西亚的局势》呈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在文件的前言部分直接谈道：“共产党的不正确策略直接导致右派政党掌握了印度尼西亚的政权。”^①

报告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在很大程度上不仅重复了第205研究所的意见，还重复了1948年1月23日慕梭的分析材料，但对慕梭极力辩解和论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的正确性提出了批评。

普雷舍夫斯基1948年2月18日的报告成为理解事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毫无疑问，其内容无论如何一定会让慕梭知晓。如果要谈“莫斯科的指示”的话，那么，这份文件完全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这份文件的主要思想随后体现在慕梭起草的决议案《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75，页码42。

新道路》中。在返回印度尼西亚后，慕梭恰恰是采纳了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战略和策略的意见中所包含的内容，通过对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改革来纠正错误。

普雷舍夫斯基在报告的开头部分就对沙里夫丁率领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在1948年1月17日同荷兰签订协定时做出让步提出了批评。^①第一个让步是同意加入荷兰组建的印度尼西亚联邦，结果使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同其他成员国相比，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内的左派力量足够强大）成为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16个成员国之一，“没有提出担当整个印度尼西亚代表的要求”。第二个错误是同意共和国部队撤回范穆克（Van Mook）^②一线。沙里夫丁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做出这些让步的。

接着，谈到了关于沙里夫丁政府下台后哈达政府的组建中没有吸收左派力量参加，对此广大人民群众反抗不断加大的问题。在此吸引了国外记者关于可能爆发内战的推测：“因为数百万人民群众对反动分子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掌权非常愤怒。”

在没有收到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足够消息的情况下，想就那里的变化做出最终结论是不可能的。同时，毫无争议的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领导着共和国政府，事实上在政府中拥有多数席位，但屈从于美国人和投靠美国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人的压力。共产党人没有呼吁群众，没有经过斗争就把政权让给了亲美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人试图让人民相信，印度尼西亚同荷兰之间的冲突只能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而社会主义集团各政党、首先是共产党的领导层没有去抵制这一图谋。……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人——包括沙里夫丁和沙里尔，对待亲美的新政府的态度与广大人民群众相比也是大相径庭。目前，沙里夫丁和沙里尔正同哈达总理一起巡视全国，这可能使人民在心里产生一种社会主义集团同执政党之间没有分歧的假象，这将会削弱人民群众争取建立真正民主政府的斗争。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75，页码43—48。

② 根据当时荷兰驻印度尼西亚总督范穆克的名字命名。——译者注

因为认为不应该公开地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归为苏联领导的民主国家集团的行列，沙里夫丁政府在自己的国务政策上刻意地远离新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处理同其他加入社会主义集团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策略也引人怀疑。在与共产党的纲领属于同一类型的纲领基础上建立了社会党和工人党，党的领导人和大量的普通共产党人都秘密地加入这些党，此举旨在让党在广大人民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在执行这一政策时，共产党人处处把社会党和工人党推到前台，而共产党处于幕后，尽管共产党事实上既是社会党和工人党、也是政府的领导力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太坚持这样的策略，以致在解决一切原则性问题时完全由社会党或工人党或联盟共同来决定。共产党作为独立的政党，其面目不为群众所见。所有这些导致共产党作用的降低，并限制了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直接联系，这不利于共产党在群众中扩大影响。

总之，普雷舍夫斯基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活动的批评涉及如下几个方面：（1）放弃对荷兰人的武装斗争，在共和国代表团让步的基础上同荷兰人签订了《伦敦协定》。（2）退出政府和把政权交给民族主义政党时没有进行斗争和号召群众。（3）继续同右派政党合作，而不是在人民面前揭露他们的反动活动。（4）远离苏联和新人民民主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拒绝公开转到“冷战”中的苏联阵营一方。（5）按照各政党和组织的次序，共产党的力量最为涣散，在社会主义集团中共产党处于末端，在人民群众眼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失去了独立面目。（6）没有向印度尼西亚人民充分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在分析文件中没有直接谈到关于共产党人重新进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权机构的必要性，但从报告的整篇内容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是在这一间接意义上可以把这份文件看作莫斯科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下达的重新夺权的指示。

报告还提请注意，沙里尔和沙里夫丁是同一战壕的人，尽管沙里夫丁一直被认为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层的秘密成员”，其实是社会党的真正领导人。这表明，联共（布）中央内部保留对沙里尔的观点的不正确评价，这种评价来自与荷兰共产党保持联系的印度尼西亚

共产党，而荷兰共产党人认为沙里尔是“亲近共产党人”的活动家。^①况且，早在1948年联共（布）中央就已经把沙里夫丁看作共产党人。这就驳斥了西方学者关于沙里夫丁不是“有经验的共产党人”，他1948年8月才宣称自己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员，只是因为对美国的印度尼西亚政策失望。^②

印度尼西亚左派力量的复杂状况和联共（布）中央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是不正确的意见，毫无疑问，加速了慕梭从莫斯科返回祖国的行程。可以推测，这位印度尼西亚领导人自己也深感压力和窘迫，因为他的关于印度尼西亚左派力量增强和对他们的行动持肯定态度的预测未变成现实并导致了负面结果。在这种形势下，他可能轻易地就同意了联共（布）中央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批评，并且自己也那么认为。下面要分析的档案文件清楚地表明，慕梭长时间思考了联共（布）中央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战略和策略的意见，逐渐确信必须对之加以根本改变。慕梭是一位拥有15年党龄的共产党领导人，在1926~1927年起义被镇压的过程中离开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解散，1935年时他曾返回过印度尼西亚着手恢复“不合法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显然，此时他得出了结论：只有他才能恢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力量和活力。最后，他确定自己在印度尼西亚的神圣使命——恢复已摇摇欲坠的左派力量，制定正确的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让共产党人走上夺权的正确道路。

慕梭从莫斯科返回印度尼西亚多半是在1948年年初，他离开莫斯科的准确日期暂时无法确定。从档案文件中可知，1948年4月中旬，慕梭已经在布拉格了，他在那里逗留了很长时间。1947年5月22日，苏联驻布拉格大使西林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代表苏里普诺举行了会谈，他在会谈记录中提道：“苏里普诺的秘书穆卡尔·伊万诺维奇参加了会谈。”^③

慕梭在签署日期为5月17日的致联共（布）中央的信中说，他将在5月24日之前与苏里普诺一起离开布拉格。1948年8月11日，慕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216，页码39。

② Arnold C. Brackman, *Indonesian Communism. A History*,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 84.

③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2，卷宗3，案卷1，页码28。穆卡尔·伊万诺维奇，苏联公民，苏联驻德国军管局工作人员，临时在布拉格逗留。

梭回到印度尼西亚。

麦克威表述的思想是完全公正的：莫斯科建议的纲领不会是那样的，“我们不相信慕梭没有对其进行补充或在抵达印度尼西亚后未对苏联给他的指示做过改动；因此，我们不能认为他所推行的政策表明他执行了苏联给共和国制定的纲领”。^①

麦克威的推测是正确的。联共（布）中央档案馆披露的文件表明，在离开莫斯科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慕梭都在制定自己的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纲领。根据文件判断，就算慕梭的纲领是根据苏联指示制定的，中国、荷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经验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同联共（布）中央保持着密切联系，但对莫斯科并不盲目地、完全地听从，而是可以把自己的元素加入普遍原则和指令中。

例如，从1947年11月起，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就开始对苏联在殖民地问题上的观念和东方反帝国主义革命的观念产生了影响。^② 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由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各阶层的代表——甚至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组建民族统一阵线，但共产党在民族统一阵线中始终处于领导地位，苏联从事殖民地问题研究的东方学学者对这一经验给予了积极评价，把它（把民族独立、土地改革、经济现代化都纳入非无产阶级的纲领，当时不是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是用民族主义把所有人联合起来，而共产党人则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看作其他亚洲国家民族解放斗争中共产党所起作用的榜样。慕梭在苏联研究印度尼西亚问题时不可能不注意这一新思想，虽然这一思想尚未得到苏联领导层和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官方肯定和推荐。

对此需要补充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广泛的民族阵线的思想对印度尼西亚来说不足为奇。无论是激进的左派还是掌权后的哈达，都进行过这样的尝试。

同时，英国学者布里梅尔指出，从1948年春天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路线——把亚洲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就开始实施

^① Ruth McVey,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58 - 59.

^② *Ibid.*, pp. 32 - 35.

了。^① 中国共产党把亚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胜利同自己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的斗争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努力向其他亚洲国家的共产党传播自己的经验，在报刊上广泛宣传。慕梭不可能没看到过这些材料。

在布拉格期间，慕梭继续向联共（布）中央报送有关印度尼西亚局势的材料。在档案馆中发现了1948年3月23日出版的杂志《中国文摘》上的一篇文章简介（摘自1948年3月1日新华社报道），慕梭感到这份资料非常重要，他决定呈送给联共（布）中央审阅。文章的题目是《印度尼西亚争取独立斗争的新阶段》。慕梭复述了文章内容，并加上了自己的注释。^②

文章开头就谈到，印度尼西亚革命今天已经进入了自己的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英国的武装干涉为荷兰人打开了门户的时期，一直持续到《林芽椰蒂协定》的签订。此后“印度尼西亚取得辉煌的独立地位”（自然，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慕梭解释说，因为《林芽椰蒂协定》只是赋予了自治地位，事实上甚至比这还要糟糕）。第二阶段开始于美国不断加大的武装干涉。美国向荷兰提供武器和资金，收买一些左派政党领导人，利用“斡旋委员会”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向印度尼西亚施加压力。签订《伦维尔协定》的结果是哈达内阁掌权。处于动摇状态的共和国领导人害怕美帝国主义对人民及其领导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采取敌视态度。在此，他们谈到有必要抗衡美国和打着中立幌子的苏联。

慕梭写道：

接着是文章最有意思的部分，谈到了现阶段印度尼西亚人民面临的任务……必须揭露美荷帝国主义，事实上，美国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人民应该进行反对动摇分子和叛徒的斗争，坚定解放斗争的伟大事业一定会胜利的信念。不应该害怕暂时的困难和退缩，应该始终不渝地开展反美荷帝国主义和哈达政府的斗争，直到胜利。……现在，当他（印度尼西亚人

^① Jack H. Brimmel, *Communism in South East Asia: A Political Analysi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59.

^②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632，页码3。

民——译者注) 看到美国出现了经济危机和全世界人民反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特别是看到中国人民反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解放斗争, 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觉悟大大提高, 抛弃了对美国的幻想和恐惧, 嘲笑印度尼西亚那些胆小的、掌权的、动摇的叛徒领导人, 众志成城地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尽管斗争漫长而又艰难, 最终胜利的曙光已在眼前。美国——这是帝国主义在印度尼西亚的最后一个堡垒, 如果印度尼西亚人民战胜了美荷联合力量, 那么, 任何其他的帝国主义分子想都不敢想奴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事。同时, 印度尼西亚民族阵线将依靠吸收工人、农民、中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主义者而变得日益强大。只是要禁止美国和荷兰的走狗加入。印度尼西亚人民应该懂得, 任何时候都不能相信动摇分子和准备妥协的政党, 而应该相信民族革命组织、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胜利, 他们现在取得了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伟大胜利, 这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榜样。

这样,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这篇文章所包含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印度尼西亚局势的评价和他们遵循中国民族解放革命模式的建议的内容, 可能对慕梭制定印度尼西亚的变革计划产生了重要影响。

麦克威的结论证明了这篇文章对慕梭起到了鼓舞作用——慕梭回国后,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通过了纲领, 这个纲领非常接近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模式, 规定建立由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包括中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统一阵线, 前提是统一阵线处于共产党的领导下。但是, 麦克威不相信是苏联领导人建议慕梭在印度尼西亚推行毛泽东路线, 因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一路线并未被正式批准和推荐。^① 在我们看来, 所列的文件可以证实, 借鉴中国模式是慕梭本人的倡议, 而不是联共(布)中央的建议。

慕梭在制定印度尼西亚的改革纲领时受到了荷兰共产党人的影响, 他自己也对荷兰共产党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产生了影响。在布拉格

^① Ruth McVey,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66.

时，他同荷兰共产党联系过。显然，根据他的倡议，荷兰共产党总书记保罗·德·格鲁特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布拉格代表苏里普诺举行了会谈。慕梭在1948年5月17日致联共（布）中央的信中报告了这件事。^① 这次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印度尼西亚目前的形势。

慕梭在信中报告说，讨论的结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决定，以特别文件的形式附录在信中。

文件的日期是1948年5月4日，标题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②

文件第一部分“党”中谈到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社会党和工人在马恩列斯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联合成为统一的印度尼西亚群众党并开展争取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的斗争的必要性。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统一应该是不仅依据生产和领土的原则，还应依据共和国（当时印度尼西亚被肢解）、民族和其他的原则，可以建立苏门答腊、爪哇、巴苏鲁安、西里伯斯共产党等，但都必须处于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下。

文件的第二部分标题为“民族阵线”。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任务是“依据民族解放纲领建立民族阵线，使之尽可能成为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组织，既包括集体成员，也包括个别成员和通过选举产生的领导”。

在建立民族阵线时，共产党“应该努力同现存所有政党、团体和个别人物进行合作。工会、农民、青年、妇女组织将支持民族阵线”。

文件第三部分标题为“政治任务”。

1. 对现任哈达政府的态度

捍卫工人和农民的一切民主权利和经济要求；组织群众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停止进一步倒退；为军队和被占领土的抵抗运动动员一切力量，使用一切手段加强共和国的战斗潜力；把哈达政府改组成为民族团结政府和国防政府，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应以必要的形式加入政府。

2. 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态度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643，页码6—8。

^② 同上，页码2—3。

拒绝强加的所谓《伦维尔协定》。

在平等的基础上继续同荷兰政府进行谈判。谈判的目标是达成关于完全承认和实现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对印度尼西亚全部领土的主权、所有的荷兰军队和机构全部撤离的协定。

协定应该规定荷兰同印度尼西亚之间在经济和文化领域进行合作，同其他国家相比赋予荷兰以优先权。合作的形式由相互协定明确。

3. 被占领土

所有被占领土上的抵抗运动要联合起来积极行动。

在1948年5月27日从布拉格寄给联共（布）中央的信中附有1948年5月4日的文件。慕梭指出，这个“决定只是我在印度尼西亚应该解决的那些任务的基础。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我期待印度尼西亚的同志们能够抓住这一时机并追随我”。^①慕梭还强调说，在印度尼西亚荷兰占领区组织的秘密活动“应该以格鲁特在荷兰被占领时期的工作经验和我1935~1936年在印度尼西亚秘密工作的经验为基础”。^②

慕梭接着写道：“会议期间最具争议的问题是关于荷兰共产党对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从会议一开始，格鲁特就支持殖民主义政策，该政策的主旨是印度尼西亚应该同荷兰结盟。”荷兰共产党人担心的主要理由是，如果荷兰共产党喊出印度尼西亚完全独立的口号，那些由于荷兰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联系才有工作的人就会脱离荷兰共产党。“自然，我坚决反对格鲁特同志的意见。在辩论时格鲁特称我是冒险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他表示，慕梭没有认清目前世界的整体形势和印度尼西亚的局部形势。但是，不久前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里普诺支持慕梭的观点，他表示，印度尼西亚人民要求完全独立。“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遵循荷兰共产党的政策，支持《林芽椰蒂协定》和《伦维尔协定》，这将给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由于共产党人的改良政策，革命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处于防御状态。”讨论殖民地问题的结果是，格鲁特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他同意慕梭关于为争取印度尼西亚脱离荷兰获得完全独立而斗争的意见，“但设定了前提条件，即：同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633，目录11。

^② 同上。

其他国家相比，荷兰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应该拥有优先权”。^①这样，西方学者论证“正是在莫斯科的坚持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才遏制了民族主义，而推行同荷兰合作的政策”，^②这是没有根据的。所列文件表明，这多半是荷兰共产党的建议。

慕梭制订的计划还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赞许。慕梭写道，格鲁特“在拜访哥特瓦尔德后骄傲地对我说，哥特瓦尔德原则上同意决定”。

接着，慕梭通报说，格鲁特同印度尼西亚人会晤后在布拉格继续逗留了几天，与慕梭住在同一所公寓里，经常同他会谈和讨论。结果，“格鲁特在这几天时间里较好地了解了，对我也更加信任了……最后，他专门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写了封信，号召支持大的变革”。^③这样，西方研究者认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观念和慕梭的计划全是在联共（布）的影响下制订出来的，这是完全不正确的。^④

1948年5月10日，格鲁特在阿姆斯特丹写信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指责他们的政治方针不正确，建议立即予以改变：“推行的政策造成了不良后果。现在您绝对有必要对之做出重大改变，实施新的政策。”接着他建议慕梭：“我们资历深的和值得信赖的同志收到这封信后，会帮助您执行新的政策，你们的人民在巩固的基础上进行斗争。”^⑤格鲁特还向慕梭提供了资金帮助，尽管慕梭向联共（布）中央抱怨，不只是他，还有苏里普诺返回印度尼西亚所需资金不够。^⑥

慕梭在致联共（布）中央信件的结尾部分表示，希望联共（布）中央同意在布拉格通过的决定。他摘引日丹诺夫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的报告强调了自己的期待：“我认为，这个决议是行动指南，可以避免‘低估工人阶级的力量和高估敌人的力量’。”^⑦从这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633，目录11—12。

② Arnold C. Brackman, *Indonesian Communism, A History*,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3, p. 53.

③ Ibid., pp. 53, 12—13.

④ Justus Maria Van der Kroe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65, p. 36.

⑤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633，目录18。

⑥ 同上，目录13—14。

⑦ 同上，目录15。

个结尾可以得出结论，慕梭在布拉格制订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的倡议，而不是“莫斯科的指示”。在援引日丹诺夫报告时，慕梭似乎请求莫斯科批准这些计划，指出这些计划都处于联共（布）批准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方针的轨道内。

应该强调一下，联共（布）中央对从慕梭那里得到的所有情报感到很不安。对外政策部专家科兹洛夫把从慕梭那里得到的材料的译文呈送给自己的首长，他认为必须把1948年6月4日的文件一并呈交，因为那份文件阐述了慕梭纲领的基本思想及对纲领的评价。^①

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同格鲁特在布拉格会谈的情报，关于哥特瓦尔德赞同新纲领的情报，科兹洛夫归纳了思想，在介绍这两份情报时是这样阐述的：这个情报对联共（布）中央来说是个大新闻，因为在慕梭启程时莫斯科没有如此打算。

科兹洛夫对把印度尼西亚左派政党联合成为统一组织的计划持肯定态度，但是，他认为在给这个新政党命名时不应该使用慕梭提议的“共产党”，因为此前共产党在捍卫和巩固共和国的斗争中没有在群众面前展现出在领导力量中起到主导作用，应该使用其他的称号，如“人民的”“民主的”等。

文件中不赞同抵制《伦维尔协定》的想法，因为直接拒绝这份由沙里夫丁政府批准的协定将给左派政党领导层的声誉造成损害。指出：“最合适的策略是坚持捍卫印度尼西亚人对协定条件的解释。”

接着在文件中说：“慕梭把这些建议看作党的政策的根本性转变，他表示在印度尼西亚他应该完成这些重要任务，并期待印度尼西亚同志能承担起这些任务，并做好了追随他的准备”（横线为原档案文件所加——作者注）。

慕梭的这个声明令人担忧，根据他声明的语气判断，他打算在党内起领导作用，这当然可能引起印度尼西亚同志的反对，甚至造成严重后果。

最好在启程回国前告诉慕梭，他的任务是帮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层，而他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的作用问题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自己决定。

联共（布）中央国际部的这份文件表明，慕梭超出了在莫斯科时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633，目录9—10。

为他确定的目标和任务的界限，莫斯科对此很紧张，不赞同采取这样的行动。但是，能够证明联共（布）中央对慕梭采取了下一步动作的文件在档案馆中没有找到。

1948年5月28日和6月16日，慕梭又从布拉格给联共（布）中央寄了两封信以及关于印度尼西亚局势的报刊摘要和情报材料。^①1948年7月12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准备了对这些文件的简介，^②把一些对莫斯科最为有意义和最重要的信息纳入其中。

文件指出，慕梭“期待在组建新内阁之前就回到印度尼西亚，通过施加自己的影响把现内阁（哈达——作者注）改组成真正的对国民议会负责的民族政府”。慕梭还请求苏联政府“继续执行支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政策。特别期待苏联在报刊上继续开展反对美国人和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政策的运动”，慕梭写道：“这对我、对印度尼西亚的左派运动来讲，都是颠覆现今处于动摇状态的哈达内阁的有效武器”，慕梭最后说，“我期待我能够完成这项重要而又有意义的任务”。

文件中的信息还有慕梭关于荷兰共产党人对前荷兰共产党人、现任印度尼西亚工人党领袖谢贾济特不满的情报。格鲁特指控谢贾济特同托洛茨基分子和英国侦查人员有联络。他似乎“号召在印度尼西亚制造一次尽可能大的骚乱和期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认为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印度尼西亚才有可能继续革命，而现在——按照他的话讲——濒临失败”。

慕梭报告说：“有五名前荷兰共产党人——谢贾济特、阿布杜尔·马济德、塔姆季尔、马鲁托·达鲁斯曼、坦林吉来到印度尼西亚，垄断了对共产党和其他左派政党和组织的领导权”，而原来的领导人阿利敏和沙尔佐诺被排在了后面。

这份文件推翻了一些西方研究者的论断。他们认为恰恰是慕梭从莫斯科返回后“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反对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阿利敏，以此论证他们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存在竞争的结论。这份文件表明，这种竞争早在慕梭返回印度尼西亚之前就已经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633，目录40—52。

^② 同上，目录53—57。

有了。^①

慕梭和苏里普诺抵达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所在地雅加达后，1948年8月11日、8月26～27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召开了非常代表大会，批准了慕梭提交的纲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新道路》。会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工人党、沙里夫丁的社会党和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联合成为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统一的共产党领导权委托给慕梭。加入新政治局的有：坦林吉、恩加季曼（Ngadiman）、艾地（Aidit）、沙里夫丁、苏里普诺、阿利敏、沙尔佐诺、鲁克曼（Luckmann），乌季斯曼（Udisman）等人。

1945年8月25日，荷兰共产党领导人格鲁特和瓦赫纳尔（Wagenaar）来到莫斯科，请求联共（布）中书记苏斯洛夫接见和提交情报，其中包括涉及印度尼西亚局势的材料。^②他们报告了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在布拉格会谈的情况，会谈的结果是拟定了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共三份：一份报送给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一份报送给荷兰共产党，一份由慕梭和苏里普诺带回印度尼西亚。接着介绍了文件的主要思想，这份文件就是众所周知的1948年8月13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新道路》。在荷兰共产党领导人的信中指出，印度尼西亚摆脱荷兰的占领获得解放和摆脱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的影响，应该成为拟定中的民族阵线纲领。强调，在布拉格谈判时印度尼西亚同志提醒说，反对政府向帝国主义投降的斗争和共产党向群众发表公开宣言可能导致荷兰当局对共和国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应该指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1948年春天的预言在当年的下半年完全被证实了——作者注）。

同时，信中高估了哈达政府的脆弱性，高估了左派政党的力量以及“群众对共产主义的向往”。

信中指出，慕梭的任务是提出建议和号召三个左派政党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召开统一代表大会，在会议中选出“强有力的中央”。“即，目前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混乱，不仅是由于党的领导同志经

^① Arnold C. Brackman, *Indonesian Communism. A History*,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3, p. 148. Justus Maria Van der Kroe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65, p. 36.

^②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7，页码6—10。

验不足造成的，同时大概也是敌对影响的结果，在政策决议案中应该预料会受到印度尼西亚某些人抵制的情况。”

荷兰共产党人写道，为了帮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完成两项具体任务：（1）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荷兰共产党之间建立稳固的联系；（2）向共和国运送武器。

接着是关于荷兰共产党同印度尼西亚同志之间建立日常联系的情报，强调有必要向印度尼西亚派遣职业代表团以改善这种联系。建议共和国向捷克斯洛伐克购买武器，那里有为以色列共和国工作的军火商贩，或者公开从瑞典买。

根据列举的文件可以得出结论：慕梭和苏里普诺在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制订重组左派力量 and 他们的策略路线计划时，主要助手不是苏联人，而是荷兰共产党人，他们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日常联系。这个结论得到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 1948 年 9 月 15 日为苏斯洛夫准备的报告《关于荷兰共产党的活动》的证实。^①

文件中指出：“荷兰共产党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起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执行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扩大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巩固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力量和团结。其中的一个措施是组建一个真正的群众性的统一的共产党……”接着还谈到了关于建立广泛的民族阵线及其任务，还阐述了荷兰共产党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共同制定的纲领的内容。“为了帮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完成自己的任务，荷兰共产党认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荷兰共产党之间必须建立稳固的日常联系以及向其提供全面帮助。”

在此应该指出，荷兰共产党不是“莫斯科手中”的工具和莫斯科指示的盲目执行者。他们有自己的策略路线，这一路线也不总是能得到联共（布）中央的赞同，在联共（布）档案馆中经常可以见到批评荷兰共产党人的文件。^②

这时在印度尼西亚发生了载入历史史册的“茉莉芬事件”。这一事件对党、对所有的左派力量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致使慕梭制定的纲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新道路》夭折。

兼任总理和国防部长的哈达开始着手共和国武装力量的“正规化”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 17，目录 128，卷宗 1167，目录 13—22。

② 同上，卷宗 1104，目录 78—79；卷宗 1167，页码 14、21。

建设，打算改建并缩小编制。此时的“正规化”旨在清洗军队中共产党人和其他左派政党的拥护者，他们在沙里夫丁任国防部长的两年多时间在军队中已经拥有了不小的影响力。

印度尼西亚左派运动的联合导致哈达政府加强了反共产主义活动，一些亲近共产党的军队被裁撤，一些左派军官被免除领导职务。这些行动导致 1948 年 9 月 13 日在苏拉卡尔塔（中爪哇）发生了深受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影响的军人同政府部队之间的武装冲突。9 月 15 日，苏加诺总统宣布苏拉卡尔塔处于战争状态。9 月 17 日，这个城市的左派军队被镇压。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茉莉芬市总部决定着手反对哈达政府，直到政府不再清洗一切亲共产主义团体为止。9 月 18 日夜里，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几乎未经战斗就完全控制了茉莉芬市。

苏拉卡尔塔和茉莉芬市发生的事件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层来说是始料未及的。实际上，当时共产党的主要活动家都在国内四处奔波，着手革新共产主义运动。慕梭、沙里夫丁当时在普沃达迪（东爪哇），坦林吉、阿利敏、苏里普诺在日惹（中爪哇）。知道事件发生后，慕梭、沙里夫丁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在 9 月 19 日深夜抵达茉莉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投入反政府的武装起义。

9 月 19 日晚，苏加诺发表广播讲话，号召人民支持他和哈达，反对慕梭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按照他的话说，他们在茉莉芬市发动了政变。慕梭发表答复讲话，号召人民摧毁以苏加诺和哈达为首的“日本人的走狗”政府，效仿茉莉芬市的榜样，把共和国领土内所有的政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9 月 20 日，公布了《茉莉芬民族阵线政府纲领》，号召人民夺取国内的全部政权。

苏加诺总统宣布国内处于战争状态，而哈达政府开始着手镇压左派力量的行动。当时在茉莉芬市以外的坦林吉、阿利敏和其他一些共产党人被逮捕。政府抽调部队前往茉莉芬市镇压起义者。政府部队在装备方面优于起义者，到 9 月 30 日就控制了茉莉芬市。一些由共产党领导的起义部队逃出包围圈后转入游击战。1948 年 10 月 31 日，慕梭在战斗中遇害。12 月 1 日，沙里夫丁、苏里普诺和其他一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被捕。到 12 月 7 日，起义被最终镇压。

政府逮捕了近 35000 名共产党人及其拥护者，近 600 人被枪毙或在战斗中牺牲。许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著名领导人如慕梭、沙里夫丁、

达鲁斯曼、苏里普诺和其他一些人被捕或被枪毙。

1948年10月15日荷兰共产党领导人同苏斯洛夫举行会谈之际，印度尼西亚“茉莉芬事件”已经发生了。在档案馆中发现了涉及荷兰共产党形势和印度尼西亚问题的会谈记录。^①

在讨论印度尼西亚形势问题时主要是格鲁特在讲，而苏斯洛夫仅限于简短地答话。格鲁特说，印度尼西亚左派的青年联盟发动茉莉芬起义后，他们还不了解那里的形势。事件发生后，只能通过路透社的消息关注事件。格鲁特强调说：“我们在布拉格同慕梭谈判期间确定了正确的立场——同荷兰殖民者和美帝国主义分子进行斗争，制定了对待印度尼西亚反动派的路线。荷共中央现在应该对哈达政府发动国内战争和向荷兰和美国投降进行谴责。”苏斯洛夫强调这一立场的正确性。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慕梭的思想有不同的来源，这些思想体现在由他制定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新道路》纲领中，1948年8月13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以政治局决议的形式批准了该纲领。在档案馆中存有这份文件的英文本和俄文本。^②这份文件于1948年12月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苏里普诺转交给苏联大使馆。其实，这份文件的文本与后来许多作者引用的文本相同。^③

在第一章“组织”中，谈到了关于三个左派政党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共产党的必要性，找到了联共（布）中央国际部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的反应——持批评态度。那里还有苏联方面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轻视苏联作用和高估美国作用的观点。作为对指责脱离苏联的答复，慕梭提议同苏联建立友好同盟。关于掌握民族革命领导权对工人阶级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必要性的论点，苏联人和中国共产党人都提示过。

在第二章“政策”中，慕梭阐述了自己关于为争取印度尼西亚摆脱荷兰获得完全独立而斗争的思想，这是早先他同荷兰共产党领导人格鲁特讨论时一直坚持的思想。在这一章中找到了对日丹诺夫关于世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7，目录27—30。

②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643，目录83—95、96—123。

③ Ruth McVey, *Soviet View of the Indonesian Revolution (Interim Reports Series: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Southeast Asia Progra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57, p. 58.

界分裂为两大阵营的思想的反映。这里还有联共（布）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未经斗争和发动群众就退出政府的批评。

在关于国内政策的章节中，可以明显观察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以及依靠左派力量领导的军队和警察的中国革命经验。

关于民族阵线的章节中，慕梭阐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人号召建立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下的广泛的、统一的反帝国主义阵线的理解。

在关于领土的章节，慕梭关注了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但没有关注毛泽东的观念。

在结尾部分，他想强调，必须考虑到斯大林的影响和苏联给东南亚共产党人的指示未必是全面的和绝对的。必须牢记，亚洲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革命者，真心诚意地追求本民族的自由和强盛。他们可以听取其他共产党的意见，利用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但此时是拥有足够独立性的领导人，没有丢掉自己的优点和独立思考。

第7章

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关系的建立

“茉莉芬事件”以及在荷兰的压力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拒绝批准同苏联达成的关于建立领事关系的协定生效后，在联合国框架内苏联在印度尼西亚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发生变化。苏联继续支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反对荷兰殖民侵略的斗争，在1948年12月19日荷兰人发动“第二次警察行动”后，苏联要求荷兰军队撤军，释放被捕的苏加诺总统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①和以前一样，总体上，在亚洲“冷战”爆发的情况下，苏联仍对削弱西方国家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影响感兴趣。

总体上，苏联领导层对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件的观点出现了变化。印度尼西亚被看作“冷战”的舞台之一，在这里进步力量（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左派力量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同得到荷兰和美国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力量（右派力量和封建势力）之间的战斗正在进行。当时，在荷兰、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反动力量占了上风。在“茉莉芬事件”发生

^①（苏）绍尔莫夫：《苏联与印度尼西亚，1945～1954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6年，第106—112页。（苏）扎罗夫、康德拉什金：《苏联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友谊与合作，1945～1960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1年，第355—356页。

以前，苏联对印度尼西亚有好感，不仅仅是因为印度尼西亚正在进行反荷兰殖民主义的解放斗争，同时也因为独立初期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领导层和社会上左派政党和组织的实力很强。如上文提及的塔斯社记者在呈送给苏联领导层的关于印度尼西亚形势的秘密报告中甚至指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诉求”，它的领导人考虑过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按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观点，苏加诺“毫无疑问是我们的人”。^①不足为怪，“茉莉芬事件”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击溃后，苏联报刊对苏加诺、哈达、沙里尔进行了强烈谴责，开始把他们列入由荷兰殖民者和美帝国主义分子庇护下的右派反动势力行列。^②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组建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并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纳入其中的计划遭到苏联方面的否定。

由于无法使用武力消除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荷兰在1949年召开的荷兰—印度尼西亚圆桌会议上把承认主权的条件强加给印度尼西亚，即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建立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1949年12月27日正式把主权移交给新联邦。苏加诺被选为总统，政府由哈达领导。

荷兰政府对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得到国际社会承认感兴趣。它照会苏联政府请求承认新建立的国家。1949年12月24日，荷兰驻苏联大使维塞尔（Wisser）会见了葛罗米柯并转交了照会。照会中说，根据1949年11月2日圆桌会议协定，从1949年12月27日起荷兰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表达了新共和国将尝试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在照会中表示，相信将主权移交给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后苏联政府将会承认新共和国。^③显然，荷兰政府也向其他东欧国家提交了类似的照会。

在收到荷兰照会后，苏联外交部开始商讨关于对待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答复荷兰人的照会的问题。同时，1950年1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驻莫斯科大使馆向苏联外交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表示了对苏联是否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问题的关切。^④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6，目录10，卷宗631，案卷46，页码7、13、18—19。

② （苏）《新时代》1949年第48期。

③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卷宗185，案卷13，页码1—2。

④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6，卷宗3，案卷3，页码1—2。

苏联外交部领导层把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看作印度尼西亚封建主同荷兰反动统治集团之间的密谋，在美国的积极参与下对抗争取独立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现实利益。^①因此，对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持否定态度。

鉴于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递交了备忘录，1950年1月12日，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为副外长佐林准备了如下建议：“以口头的形式告诉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参赞，苏联（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已众所周知）把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建立看作是印度尼西亚封建主同荷兰反动统治集团的密谋，在美国的积极参与下对抗争取独立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现实利益。因此，苏联目前不打算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②

苏联外交部恰恰是根据这个否定结论准备了苏联就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问题给荷兰的答复照会的材料。按照惯例，关于这个问题的最终决定应由斯大林做出。外交部精心准备了关于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问题的报告，呈报给斯大林。当时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副外长葛罗米柯和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对文本做了多次修订和校对。

1950年1月16日，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司长谢尔盖耶夫向葛罗米柯提交了关于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问题的方案报告，该草案应该报送斯大林审批。其中写道：

在荷兰驻莫斯科大使馆向苏联外交部递交的照会中含有关于印度尼西亚的主权转交给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通知，指出，荷兰政府相信“移交主权后，苏联政府将会承认新共和国”（维辛斯基批注“不要胡说”）。鉴于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已经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通过捷克斯洛伐克驻莫斯科大使馆向苏联外交部请求告知苏联政府是否打算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建立是美国和荷兰统治集团同印度尼西亚右派民族主义分子相勾结的结果。荷兰政府赋予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主权和独立”，其“政府”完全依附于美国和荷兰统治集团，此举的动机是希望以此分裂印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6，卷宗3，案卷3，页码3。

^② 同上。

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减轻这一运动的压力。根据所阐述的内容以及考虑到荷兰政府的照会就其性质来讲不要求答复，外交部认为对这份照会不予答复是合适的。

至于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的询问，苏联外交部认为可以以口头方式通告捷克斯洛伐克驻莫斯科大使馆，关于苏联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问题不必费心。^①

1950年1月16日，葛罗米柯对东南亚司起草的致斯大林方案报告做了批示：“我认为，这种形式的方案是合适的”，并把文件转给维辛斯基。第二天，维辛斯基对葛罗米柯的方案做了批示后退还了回去，他写道：“在我看来，不合适，请修改。”但是，维辛斯基只是对文本内容过于空洞和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感到不满，而不是对问题的实质内容——驳斥荷兰号召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不满意。^②

接下来，在1950年1月19日由东南亚司起草的、经葛罗米柯修改和批准的致斯大林的方案报告中已经没有“闲笔”，全部删除了那些意识形态内容的段落，如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建立是印度尼西亚右派民族主义分子同荷兰和美国之间相勾结的结果，旨在分裂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同时，葛罗米柯不再坚持在致斯大林的报告中的第一段中在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称谓中加入意识形态成分，称它为“所谓的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

当天，报斯大林的新报告方案提交给维辛斯基，葛罗米柯在上面写下批注：“致维辛斯基。向您提交经修改过的方案，请批准。1950年1月19日。”^③在致斯大林的报告中，按照惯例，附有联共（布）中央决议草案，内容如下：

1. 批准苏联外交部关于对1949年12月24日荷兰驻莫斯科大使馆关于对成立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照会不予答复的建议。
2. 委托苏联外交部以口头方式答复捷克斯洛伐克驻莫斯科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卷宗185，案卷13，页码3—5。

② 同上。

③ 同上，页码6—7。

科大使馆，关于苏联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问题不必费心。^①

从上述文件中可以看出，苏联领导层完全形成了对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及共和国领导人持否定态度的观念。对此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正是他们在“茉莉芬事件”过程中积极参与了打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他左派力量的活动。把主权移交给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以取代1945年8月17日宣布成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毫无疑问，这意味着荷兰殖民主义对印度尼西亚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

但是，对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否定态度突然发生了转变。由东南亚司起草并经苏联副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批准后呈送给斯大林的关于不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报告草案和联共（布）中央决议，因一些暂时不太清楚的原因在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秘书处扣留了好几天，可能是因为他很忙（当时毛泽东正在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维辛斯基本人及其部门都是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950年1月18日，毛泽东从列宁格勒返回莫斯科。不排除维辛斯基在参加了斯大林和苏联高层代表同毛泽东及其代表团成员的会谈后，感觉到苏联领导层对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否定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决定在弄清楚斯大林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之前暂时扣留给斯大林的报告和联共（布）中央决议案。

但是，苏联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对苏联领导层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态度会发生改变持怀疑态度。1月21日，东南亚司向苏联副外长佐林通报了1950年1月17日雅加达（成为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政府的官邸）广播的如下消息：“根据华盛顿的一组消息，苏联打算近期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在此，东南亚司建议苏联外交部领导层对这则声明暂时不要做出什么回应。^②

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在1950年1月25日突然改变了自己在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问题上的态度。1950年1月25日，维辛斯基在由东南亚司起草的、葛罗米柯于1950年1月19日批准的致斯大林的报告草案中，在关于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关键一句话中删除了单词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卷宗185，案卷13，页码8。

②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6，卷宗3，案卷5，页码5。

“不必费心”并坚定地草案上写下批注“反对”。^①

当天，1950年1月25日，维辛斯基向斯大林呈交了新报告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案草案，其内容与先前相比已完全不同：

致斯大林同志：

向您提交：

1. 苏联外交部关于印度尼西亚问题致荷兰政府的答复照会。

2. 致印度尼西亚总理哈达的电报草案。

3. 供报刊公布的消息草案。

附联共（布）中央决议草案。

请审阅。^②

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草案中含有如下几项内容：

1. 通过苏联外交部关于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问题的建议。

2. 批准苏联外交部提交的如下文件：

● 关于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问题致荷兰政府的草案；

● 致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总理的电报草案；

● 供报刊刊登的消息草案。

在这份联共（布）中央决议草案上有一处蓝色铅笔标注：“致波斯科列佩舍夫同志（斯大林的私人秘书）。斯大林同志1月25日批准。请处理。”^③

（无签名）

在苏联外交部准备的致印度尼西亚总理哈达的电报中通告了关于苏联政府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决定，维辛斯基亲笔补充“建立外交关系”，另附“斯大林1950年1月25日11点15分的校改稿”。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7，目录23，卷宗185，案卷13，页码7—8。

② 同上，页码14。

③ 同上，页码15。

维辛斯基大概是在斯大林的命令下直接修改了文件或同斯大林会谈后立即修改的。关于同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语句被维辛斯基加入关于苏联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照会方案中。^①

经过多次修改和确认后，苏联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命令正式形成了相应的文件。1月25日当天，维辛斯基向哈达寄送了关于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电报。关于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问题致荷兰政府的照会，由葛罗米柯于1月25日夜里23点30分转交给荷兰大使维塞尔，葛罗米柯日记证实了这件事。^②第二天，1950年1月26日，《真理报》刊登了苏联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官方消息。

根据稍后葛罗米柯同荷兰大使的会谈来判断，苏联正式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官方行动是匆忙进行的，对葛罗米柯来说也是始料未及的。看来，在决定苏联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问题时葛罗米柯没有在场，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归功于他。

研究者必然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苏联领导层直到1950年1月19日前把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建立“看作印度尼西亚封建主同荷兰反动统治集团相勾结的结果，在美国统治集团的积极扶助下对抗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独立的现实利益”，对荷兰号召承认印度尼西亚归联邦共和国持否定态度，而在1月25日突然改变了态度、并在当天紧急告知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领导人和荷兰。

印度尼西亚报纸《独立报》（*Merdeka*）注意到了苏联态度的急剧变化，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专案文件卷夹中收录了这些报纸（1950年1月27日和28日两期）。^③报纸中指出，“茉莉芬事件”后苏联报刊痛斥“苏加诺—哈达—沙里尔集团”，骂他们是“出卖民族利益的资产阶级叛徒”和“美英帝国主义的走狗”。《独立报》把苏联对外政策突然转到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一方归因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结果。^④

的确，如上文已指出的，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毛泽东在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7，目录23，卷宗185，案卷13，页码12、16。

②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6，卷宗3，案卷3，页码6。

③ 同上，页码8—19。

④ 同上，页码11。

苏联访问，在访问期间毛泽东多次同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1950年1月18日，毛泽东在访问列宁格勒后返回莫斯科，继续中苏谈判。维辛斯基一直参加了这些谈判。在同中国人会谈时肯定会涉及印度尼西亚的局势、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建立和承认印度尼西亚新共和国的问题。大概中国人在正式和非正式会谈中表达了对苏联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持赞成态度。显然，维辛斯基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因此，他不急于签署苏联外交部1950年1月19日准备的关于拒绝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文件，并把它扣了下来。1950年1月22日，毛泽东同斯大林举行了会谈，维辛斯基参加了那次会谈，而葛罗米柯没有出席。可以推断，正是在那次会谈中毛泽东劝告斯大林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

斯大林认真听取了中国同志关于东南亚问题的意见。他认为，由于苏联只是部分领土地处亚洲，而中国完全是亚洲国家，所以，中国在亚洲应该起到首要作用，这样比较好。这一思想在稍后的文件（包括列多斯基编辑的斯大林同周恩来会谈记录）中得到进一步阐述。^①但是，不能排除斯大林在同毛泽东初次会谈之前就初步形成，而在会谈过程中已经明确了中国和苏联在亚洲作用的观点。很有可能，正是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斯大林突然改变了对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态度，快速做出了关于承认它的决定，并安排把这些话列入苏联外交部关于同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方案中。显然，像维辛斯基这样有经验的外交家不可能不注意到苏联领导层在关于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问题上态度的变化，他立即捕捉到了征兆并做出了相应的修改。

在斯大林同毛泽东的会谈记录中找不到关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反映，苏联外交部中国问题专家和著名学者拉赫曼宁的几句话可以解释这个情况。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指出，斯大林同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多次会谈没有做记录。许多记录并不完整，而只是概括了所表达的主要内容、主要信息。^②

①（俄）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周恩来谈判速记记录，1952年8~9月》，《近现代史》1997年第2期，第83页。

②（俄）拉赫曼宁：《亲历者眼中的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近现代史》1997年第2期，第83页。

苏联领导层关注着印度尼西亚对苏联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反应。在《独立报》的评论中指出，苏联的承认总体上产生了积极反响，但有些部长和印度尼西亚政治家对此持谨慎态度。评论所持态度同外界、首先是英国和美国的分析意见相似。^①援引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代总统阿萨特（Accaat）的话说，苏联的承认对于印度尼西亚推行和平的对外政策和统一的国内政策是有益处的，但这种承认不会改变印度尼西亚对美国和英国的路线。^②评论指出，印度尼西亚领导人把来自苏联的承认看作加入联合国的第一步。

鉴于印度尼西亚对苏联方面承认的反应，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认为必须向维辛斯基呈交《独立报》的摘要材料。此时，东南亚司强调了占主导地位的意见，其核心思想是不急于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加黑为维辛斯基强调——作者注）。东南亚司建议发一小篇文章刊登这些言论的少量文章，但维辛斯基决定等同印度尼西亚人的谈判结果，那场谈判始于1950年春。^③

同时，1950年2月3日，苏联外交部收到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总理哈达致维辛斯基的电报。哈达证实收到了苏联承认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的电报，通告说印度尼西亚对苏联的这一行动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准备研究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问题。^④苏联政府表现出了兴趣，准备毫不拖延地建立外交关系。此时，尽管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对苏联的承认总体上持谨慎态度，苏联的态度却是真诚的、热烈的。维辛斯基在1950年2月15日致哈达的电报中建议印度尼西亚方面选择合适的谈判地点。^⑤看来，印度尼西亚当局不想在本国见到苏联代表，经过漫长的间歇后，于4月11日才向苏联通报了关于向莫斯科派遣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着手谈判事宜。^⑥代表团由印度尼西亚驻联合国代表巴拉尔（R. H. Balar）率领。

在西方史学著作中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苏联对在印度尼西亚开设外交代办处不感兴趣，因为当地政权掌握在右派民族主义分子的手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6，卷宗3，案卷3，页码8、17。

② 同上，页码20。

③ 同上，页码24。

④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3，卷宗1，案卷1，页码1—2。

⑤ 同上，页码3。

⑥ 同上，页码4。

里，这些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持不友好的态度。如布莱克曼写道：“巴拉尔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受到冰冷的接待。很明显，俄国人对交流没有兴趣。直到1954年，在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没有向右转之前，俄国人没有在雅加达建立大使馆。”^①但是，档案文件证实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反，苏联对加快建立外交关系表现出极大兴趣，而印度尼西亚人却尽情利用这一兴趣在国际舞台上玩自己的政治游戏。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构成非常具有代表性，其中有国内主要政治力量的领导人。代表团包括雅明（Yamin）——亲近左派集团的无党派人士，苏联驻荷兰大使扎伊采夫认为他是“托洛茨基分子”——担任负责国外事务的议会委员会主席职务。代表哈金诺托（Hadinoto）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政党国民党主席之一。维比索诺（Wibisono）是影响力不太大的马斯友美党副主席。还有两名来自政党机关的官员。在同维辛斯基会谈时巴拉尔强调说，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这样的构成是为了向苏联政府和全世界表明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政府对这个代表团的重视。^②

但实际上，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政府向莫斯科派遣这样的代表团是在努力伪装自己最主要的和最本质的目的，其目的完全不是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而是致力于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因此，苏联的态度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这一点，苏联驻荷兰大使扎伊采夫已经向莫斯科报告了同在那里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会谈情况。扎伊采夫报告说，从1950年4月27日同巴拉尔的会谈中就知道，印度尼西亚代表团不打算事先暴露自己在莫斯科谈判的纲领。扎伊采夫写道：“据我们的消息，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没有权限处理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代表团的任务是阐明苏联在印度尼西亚问题上的态度，其中包括接纳印度尼西亚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并通告给哈达政府。”此后，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政府才打算解决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问题。^③

扎伊采夫收集的情报完全得到了证实。1950年5月5日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在接见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期间，巴拉尔一开始说明了代

^① Arnold C. Brackman, *Indonesian Communism. A History*,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p. 140-141.

^②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6，卷宗3，案卷3，页码26—27。

^③ 同上，页码33—34。

表团的官方目的，更令苏方感兴趣的正是印度尼西亚政府想同苏联互派外交代表。但他还说，印度尼西亚议会代表团应该先阐明互派外交代表的前提是印度尼西亚加入联合国，这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要求，苏联必须同意。经过多次询问后，维辛斯基请巴拉尔相信，苏联对接纳印度尼西亚加入联合国持赞成态度。

维辛斯基在日记中指出，这些成员的所有发言都是一再重复地说，对印度尼西亚来说加入联合国与同苏联交换外交代表问题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

这期间，当巴拉尔得到苏联同意印度尼西亚加入联合国的满意承诺后，就开始努力绕开与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派代表相关的问题。他的借口是由于遭受破坏的印度尼西亚安置苏联代表有困难，没有合适的场所。巴拉尔建议首先派遣少量的技术人员，他们可以熟悉一下当地的条件，为正式派遣代表做准备。他提议也向莫斯科派遣类似的工作组。维辛斯基再次回到对苏联来说最为重要的关于代表的问题上，指出关于其具体形式——是公使团还是大使馆——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巴拉尔答复说，毫无疑问，同苏联互派外交代表的问题应该由高层来解决，也就是说，应该批准设立大使馆，这与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大国——如美国和英国一样。维辛斯基提出了关于达成建立外交关系和互设大使馆的正式协议问题。巴拉尔立即回复说，印度尼西亚遵循必要的外交惯例，也就是交换关于派遣大使的照会。维辛斯基对此表示同意。最后，巴拉尔再次强调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同苏联政府代表之间要相互理解，他指出，他的使团的主要任务是向世界展现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性，消除对这一打算的任何疑虑。他认为，这个使命顺利完成了。^①

但是，尽管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对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性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在执行业已达成原则性协议方面却无任何具体的动作，找不到更多的表述，也没有采取任何步骤。这样，印度尼西亚人实现了自己的主要目的——得到了苏联对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赞同。在利用了苏联对同印度尼西亚建立外交关系和两国互设大使馆的希望后，印度尼西亚方面就开始逃避解决对苏联来说最重要的问题。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6，卷宗3，案卷3，页码28—32。

同时，1950年6月5日，东南亚司准备好了苏联驻雅加达大使馆成员名册方案。但是，东南亚司强调，由于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访问苏联后没有采取任何步骤，那就不能认为苏联同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①但是，在苏联的史学著作中形成了一个传统的认识，把1950年2月3日看作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建立外交关系的正式日期，也就是印度尼西亚政府肯定地回复苏联政府关于承认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和主权的通告的日子。

苏联方面特别是负责苏联与印度尼西亚之间建立外交关系谈判的维辛斯基对现状极为不满，苏联做了充分的准备，而印度尼西亚方面在推进这个问题上没有表现出任何主动性。这种不满在印度尼西亚庆祝独立一周年庆典中表现出来。

1950年上半年在印度尼西亚出现了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向单一制共和国转变的进程。通过把一些邦国合并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来建立单一制共和国。结果，1950年5月19日，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签订了单一制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协定。1950年8月16日，正式宣布建立统一共和国和批准1950年的《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宪法》。

1950年8月8日，苏联外交部的两名高级工作人员——礼宾司司长莫洛奇科夫和东南亚司司长巴希托夫向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博戈莫洛托夫提交报告，建议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独立五周年庆典时在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关系史中首次致以节日祝贺，并委托苏联驻荷兰大使扎伊采夫向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驻海牙最高长官鲁姆转交以苏联政府名义表示祝贺的私人书信。^②所有相应的必备文件都附在其中。维辛斯基强烈指责这一建议。在1950年8月10日由莫洛奇科夫和巴希托夫提议并得到苏联副外长拉夫连季耶夫同意的报告中，维辛斯基写下批注：“不寄发、扣留。8月11日。”^③

想必在1950年11月召开联合国大会期间，维辛斯基在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鲁姆会谈时提出了关于苏联同印度尼西亚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鲁姆答复说，因没有找到符合驻苏联大使岗位的人选而耽误下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6，卷宗3，案卷3，页码37。

②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卷宗186，案卷13，页码1。

③ 同上，页码2。

来，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①但是，互设大使馆的问题因代表亲西方集团利益的印度尼西亚统治集团缺乏兴趣而被拖延下来。

同时，在印度尼西亚也有一个对发展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关系感兴趣的团体。如在1951年11月苏联外交部致联共（布）中央的报告中谈到，多利亚^②多次来找苏联驻荷兰公使询问，为什么苏联没有在印度尼西亚建大使馆。苏联外交部建议答复多利亚同志说，延缓的责任在于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建立外交关系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步骤。^③苏联外交部可能把这份报告转交给了斯大林，试图引起苏联领导层对进一步发展同印度尼西亚关系的注意，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印度尼西亚仍处于苏联对外政策的边缘。

尽管印度尼西亚方面对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缺少兴趣，但苏联在国际关系中对这个国家始终采取友好立场。1950年9月，苏联同意印度尼西亚加入联合国。苏联没有答复所谓的南摩鹿加群岛共和国政府的请求——1952年11月南摩鹿加群岛请求苏联支持其对纳入印度尼西亚的抗议。^④同时，根据目前研究者能看到的苏联外交部文件来判断，苏联在建立同印度尼西亚外交关系方面也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积极性，也没有采取敦促印度尼西亚积极对待这个问题的任何步骤。可能主要的原因在于，斯大林对这个国家仍没有太大的兴趣。同时，正如已经说过的，斯大林认为亚洲是中国的活动范围。

至于印度尼西亚方面，在苏联外交部档案文件中把苏联和印度尼西亚互设外交大使馆长期被搁置的原因解释为受到英美集团的压力以及1950~1953年印度尼西亚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⑤

这样，在斯大林在位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与印度尼西亚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二次尝试同第一次一样没有取得完全成功，没有进入法定程序。不过，正如上文指出的，俄国传统上把1950年2月3日看作同印度尼西亚建立外交关系的起点。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7，卷宗1，案卷4，页码10—11。

② 印度尼西亚驻曼谷代办，1951年在新加坡召开的贸易会议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成员，印度尼西亚驻新加坡和泰国贸易代表。

③ 同①，页码6—7。

④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6，卷宗2，案卷2，页码1—15。

⑤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9，卷宗1，案卷6，页码7。

第8章

斯大林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复兴

共产党人参与“茉莉芬事件”导致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解体，但官方并没有禁止其存在。直到1949年12月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留守人员仍在努力保存党的基层组织残余。但是，1948年8月，联合了许多共产党人控制下的左派政党和组织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再次解体。学者们在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史时所使用的关于党的组成及其活动的资料经常出现矛盾，无法证实其真实性。辛德利写道，起初由额亚迪曼·哈尔佐苏布罗托（Ngadiman Hardjosubroto）负责党的领导工作，履行总书记职责，1950年1月贾东（Djetun）取代了他。后来，由坦林吉领导的共产党控制下的社会党领导人担任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层中还有一些老领导人——阿利敏和维坎（Vikan）。^① 范·登·克鲁弗指出，阿

^① Donald R. Hindle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1951 ~ 1953*,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p. 22 - 23.

利敏成为党的领导人。^① 布莱克曼还谈到阿利敏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作用，并强调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重大影响。^② 但是，没有一位学者谈到位于北京的、中国共产党保护下的一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小组。

所有的学者都指出，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在“茉莉芬事件”后，不仅要保存和恢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游击队伍，还要制订在复杂条件下的新的行动纲领。

对此，多数研究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问题的西方专家一致论证说，“茉莉芬事件”后的几年时间里莫斯科对印度尼西亚事件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命运失去了兴趣。如辛德利写道：“茉莉芬起义失败后，莫斯科很可能认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没用了。也就是说，莫斯科认为遥远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值得关注了。只是在1954年后在艾地领导下建立的民族统一阵线取得显著的成绩时，莫斯科才再次关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辛德利强调说，以前联共（布）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干涉几乎导致党的完全解体，在制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新的计划和章程时莫斯科完全没有参与。^③ 奥特·特恩奎斯特也谈到莫斯科对印度尼西亚革命失去了兴趣。^④ 范·登·克鲁弗只是谈到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可能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物质援助。^⑤ 布莱克曼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想弄清楚，莫斯科是否间接地参与了新路线的制定？”^⑥

不久前在斯大林档案馆中发现的文件，可以让我们清楚而明确地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答复，并完全反驳西方学者关于莫斯科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置于脑后的论断。文件证实，莫斯科和斯大林本人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印度尼西亚事件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命运的关注。

① Justus Maria Van der Krou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65, p. 45.

② Arnold C. Brackman, *Indonesian Communism. A History*,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3, pp. 148 - 150.

③ Donald R. Hindle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1951 ~ 1953*,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p. 30 - 31.

④ Olle Tornquist, *Dilemmas of the Third World Communism. The Destruction of the PKI in Indonesia*, London: Zed Books Ltd, 1984, p. 72.

⑤ Justus Maria Van der Krou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65, pp. 46 - 47.

⑥ See ②, p. 172.

斯大林本人亲自参与了中国共产党人帮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制订新的纲领性文件的讨论。他认真地读了这些文件，做出具体而生动的反应，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详细解释自己的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强加给他们。

“茉莉芬事件”发生后，一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流亡到中国，留在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人看来也没有失去同中国共产党人的联系。被派遣到中国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临时主席坎戈（Kango）^①和其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同中共中央一起制定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日期是1950年10月6日。这份文件是中共中央书记刘少奇呈报给斯大林的，请他提出意见。印度尼西亚人和中国人想得到联共（布）中央——自然，首先是斯大林的批准和支持。在这件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联共（布）之间充当中介人的角色。

1950年10月12日，苏联驻北京大使罗申致电菲利波夫（斯大林的假名），电报中谈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刘少奇请求转告的话：“罗申同志：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代理主席坎戈和其他人同中共中央在中国制定的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的建议发给您，请您把这份文件转交给菲利波夫同志和联共（布）中央，请求给予意见。”^②接着，穆里奥诺同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一份文件，日期为1950年10月6日（这份文件基本上已经在研究领域得到广泛使用）。^③

文件这样开头：“研究了中國革命胜利的经验后，我们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提出了如下建议。”接着，简要介绍了1926～1927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创建到导致再次解体的“茉莉芬事件”期间所取得的历史成绩和不足。强调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处的复杂形势：印度尼西亚政权掌握在荷兰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支配下的反动傀儡政府手中，美帝国主义努力把印度尼西亚变为自己的殖民地。

文件中指出，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封建主义势力毫发无损地存活了下来，战争期间以苏加诺—哈达集团为首的封建买办资本家集团的力量得到增长，他们依靠封建主并与美帝国主义分子保持联系，在国内

① 穆里奥诺（Muliono）的假名。

②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558，目录11，卷宗313，页码2。

③ 同上，页码2—11。该文件中的一些观点见俄罗斯学者盖杜克在1999年9月在美国召开的会议“斯大林和亚洲”上提交的报告“Stalin and Asia: Teaching Revolution, 1950”。

居于统治地位。文件认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表面上的独立掩盖了帝国主义分子的统治。

引起印度尼西亚民族革命高涨的主要矛盾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深重了。由于总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胜利，印度尼西亚民族革命的新高潮将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高潮已为时不远。

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所有的爱国政党及革命组织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印度尼西亚全体国民面前不断揭露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独立”的谎言和欺骗，事实上，国家处于荷兰、美国 and 英国帝国主义分子的统治下；揭露帝国主义统治和压迫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鹰犬和间谍——苏加诺—哈达集团及其政府；增强全体国民的自觉意识，团结所有爱国主义者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创建民族统一阵线，为争取印度尼西亚的真正独立和真正民主，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而顽强斗争。

为实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这些目标，建议采取如下战略和策略：

1. 在所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经验同时也是印度尼西亚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为彻底清除荷兰、美国 and 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统治，必须开展以武装革命对抗武装反革命的斗争。印度尼西亚人民实现革命目标的道路只能是这样。必须采取措施建设一支强大的、坚定的人民解放军开展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2.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应该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族统一阵线，民族统一阵线应具有民族性，吸收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所有的爱国政党和团体以及游击队员，具体的政治要求是：

- 驱逐在印度尼西亚的所有的荷兰、美国 and 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实现印度尼西亚完全独立；

- 摧毁为帝国主义分子服务的国内反动派的统治，用民主联合政府取而代之，保障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

- 消除封建主特权，进行土地改革；

- 保卫民族工业和贸易，发展国民经济；
- 改善工人、农民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
- 赋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盟和信仰自由；
- 权利平等；
- 男女平等；
- 同苏联、中国等人民民主国家结盟，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亚洲事务而斗争、反对把印度尼西亚变成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基地而斗争。

3. 目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各级组织必须学会灵活使用暂时退却的策略并实施这样的退却。建议重新召集党的所有组织和干部完成党的建设，这是 1948 年 8 月会议决定的。应该广泛组织讨论党在印度尼西亚革命运动下一阶段战略和策略任务，同时研究失败的教训，利用这一时机在党内系统地开展培训工作，提高掌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水平，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变成一个统一的、掌握马克思主义武器的、拥有铁的纪律的党。等等。

4. 印度尼西亚革命只有通过复杂的、长期的和艰苦的斗争才能实现。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应该掌握高超的战略原则，直至革命胜利……

为了有效地帮助革命的人民群众和组织革命力量，目前最重要的策略是认真研究和掌握建立秘密或半秘密的群众组织的方法以及与组织保持联系……

在严格遵守秘密活动原则的情况下，为了根据未来的需要开展公开活动，必须确定和培养适合开展合法工作的党的领导人和干部，他们应该适合进行合法活动并利用一切合法手段进行群众工作、参加各级议会活动。

文件中还提到了接收文艺活动家和广大知识分子入党，加强党在工会以及妇女和青年组织中活动的任务。

第六项内容谈到必须“在农民中开展认真的、有计划的和广泛的工作，为武装革命创造基础”，选派最优秀的和有责任心的工作人员进入“反革命军队，乘机夺取武器”。

党现在应该把工作重心逐渐地转移到农村。武装斗争的初期阶段需要选择一个敌人统治薄弱的区域，这一点特别重要，那里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已经准备好；组建一支或几支游击队，游击队要帮助群众和捍卫群众利益，开展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同反动政府进行斗争。

开展武装斗争必须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在军事方面必须掌握游击战的战略和策略，在政治方面必须建立统一阵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逐渐壮大游击队伍和把游击队转变成人民解放军。

现在还有牢固的和不完全牢固的武装区，即所谓的“小的红色区”，在这里需要使用两手革命策略，努力把武器秘密地掌握在农民手里，同时要努力在农民中开展党的政治工作，树立武装革命的观点，以便在成熟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

接着，建议吸收印度尼西亚的少数民族、中国移民入党，增强中国共产党对后者的影响。

在结尾部分，纲领起草者请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讨论这些建议，“如果中央认为这些建议可操作或基本可操作但需要进行部分修改，请中央下令使之生效”。

上述文件的内容和表述证实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战略和政治思维对纲领的起草者起到了重大影响。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典型规定，要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武装反对印度尼西亚的“恶势力”——荷兰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以及以“苏加诺—哈达集团为首的走狗”；党的整个工作重心转移到组建农民游击队和在农村建立“红色”解放区上来；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建立人民解放军；建立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代表在内的广泛的民族统一阵线，开展既反对当地的反动势力，也反对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

斯大林非常认真地阅读了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的纲领方针，在留白处对个别地方做了批注。从对文件的反应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对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事件的意见。

斯大林的第一处批注是在首次提到共产党主要任务的地方，那里说重点是必须揭露有关印度尼西亚独立的欺骗。“农业问题呢？”，斯大

林写道，因为关于这个问题在党的任务中一句也没提。接着，斯大林注意到了关于“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必要性”“建立强有力的人民解放军”这几句话，批注道：“行不通”。对于“从印度尼西亚驱逐所有的荷兰、美国和帝国主义分子”，斯大林补充道：“把他们的财产国有化！”关于涉及“摧毁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势力”和“用民主联合政府取而代之”的建议，斯大林激动地说：“不能这样做！”斯大林对“同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结盟”的号召也是这样反应。

斯大林还反对就纲领进行广泛讨论的号召，指出：“热烈讨论？不。”关于“研究失败的必要性”，苏联领导人感叹道：“正是这样！”他还强调了“在党内系统地开展工作”这些话。关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一整段话被斯大林删除了，认为在严肃的声明文件中这是不需要的、不合适的。斯大林同意“印度尼西亚革命只有通过复杂的、漫长的、艰苦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写道：“是这样。”他不明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把革命进行到底”这句话的含义，问道：“这是什么意思？”他还注意到了关于掌握秘密工作方法重要性的说明，特别赞同合法地“参加各级议会活动”的号召，赞叹道：“这是对的。”

斯大林支持加强工会工作的计划，指出了在自由的工会组织中（不是在各级政府中）工作的重要性。建议印度尼西亚向“反动派的军队安插自己的人”，“渗透到部队中去”。关于建立解放区和游击区问题，斯大林指出：“要大胆地去做。”他还注意到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阵线、中国共产党给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居民做工作等问题。

这样，我们看到，斯大林对把中国革命经验运用于印度尼西亚没有持赞同态度，对共产党在印度尼西亚开展新的武装活动持否定态度，只是支持共产党在群众中以及在各级机关中秘密开展工作，特别强调了农民问题对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重要性。

我们在稍后寄给斯大林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文件中找到了对斯大林对这些意见的反映。但是，斯大林认为，他不可能立即就提交给他的文件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他对目前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形势了解不多，不考虑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形势就很难评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纲领。^① 斯大林向刘少奇索要关于如下问题的材料：

1. 印度尼西亚的哪些工业领域（包括交通）发达，发达程度如何，工人数量多少，工人占国内居民总数比例是多少。

2. 封建主、政府、外国人、农民拥有的可耕地和不可耕地数量是多少，农民占国内居民总数的比例是多少。

3. 印度尼西亚的小农和无土地的农民数量有多少，什么人在雇用他们，国内的农业工人多不多。

同时，斯大林对并不十分精确的资料也感兴趣。^②

1950年10月26日，索要这些材料的密码电报寄往中国。刘少奇的答复和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材料于当年11月23日被送到莫斯科。仔细研究了得到的材料（斯大林在材料中做了很多批注，特别是令他关注的农业问题）后，斯大林于1951年1月才对1950年10月6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方案写了复信。^③

在斯大林的回复中谈到如下内容：

向您通告我们对1950年10月6日收到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的意见。

我们从材料中形成的总的印象是，尽管印度尼西亚的农业国属性非常明显，但那里的工业还是比其他一些殖民地发达。

1. 近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不是“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阵线”去反抗帝国主义分子、争取印度尼西亚的“完全独立”，而是清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把这些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在印度尼西亚最主要的任务是唤醒农民，把他们发动起来。只有消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并把土地分配给农民才能做到这一点。

① 我们不同意盖杜克的这一观点：对斯大林来说印度尼西亚只是他阐述自己对经济形势类似的任何一个东亚国家革命斗争方式的意见的借口“Stalin and Asia: Teaching Revolution”, 1950, p. 5)。为了论证我们的观点，我们请读者注意一个事实，斯大林在研究征求其意见的关于印度尼西亚的材料并提出自己建议时，不仅考虑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特点，还有其地缘特点。

②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558，目录11，卷宗313，页码13—14。

③ 同上，页码57—61。

反封建主的统一战线应该这样建设：孤立封建主，让所有的农民（不包括富农）投身于这项事业。如果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共产党认识到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并在这项事业中帮助农民，作为人民民主革命基础的工农联盟就能得到保障。

2. 党的第二项任务是组建民族统一战线，为印度尼西亚反抗荷兰殖民主义统治、获得彻底独立而斗争。这个阵线的矛头应该不是指向所有的外国帝国主义分子，而是只反对荷兰帝国主义分子。该阵线的目标是，驱逐荷兰帝国主义分子及其武装力量，对他们的财产实行国有化，割断他们同荷兰的联系，宣布印度尼西亚完全独立。如果英美帝国主义分子亲自上阵开始武装支持荷兰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印度尼西亚的傀儡，就必须扩大民族阵线，着重强调民族阵线反对在印度尼西亚的所有帝国主义分子和对他们的财产实行国有化。显然，工农联盟将是该阵线的基础，其中，阵线的稳固与否取决于土地革命的成绩。至于“同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结盟”的问题，应该从文件中剔除，此时提不合适。

3. 文件中提到的共产党的其他任务没有遭到批评。

4. 转到策略问题时文件指出，“武装革命”的道路也就是在农村开展游击战的道路，这是唯一可能取得胜利的道路。自然，游击战和建立游击区以及在那里建立人民解放军的方法（如同中国的经验），应该承认，对于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落后国家这些方法完全适用。但问题在于，同中国相比较，在印度尼西亚的条件下使用这些方法还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第一，游击战的成功适用于领土广大的国家，那里有远离铁路和公路的成片森林和高山。印度尼西亚很少有地方拥有这样的条件。

第二，如果在战争中夺取自由游击区或者在当地由人民解放军建立一个自由游击区，反正都是在国内的一个岛上，这个岛可能被敌人包围，因为这个岛没有自己稳固的后方。当然，可以放弃自由游击区，突破包围在其他地方建立新的自由游击区。但无法保障它不会受到新的包围，游击队员不得不再次转移到新的游击区。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但他们最终找到了一条好的出路，转移到了满洲里，由于与友好的苏维埃共和国

为邻在那里找到了巩固的后方。中国同志在满洲里有了巩固的后方后，在依靠苏联作为自己的后方后，敌人才不能再围攻他们，中国共产党人才有可能由北向南向蒋介石军队发动进攻。印度尼西亚同志占领游击区时，是不是有可能像中国同志一样躲到某个邻国边境去，以此作为自己的后方，使敌人不能再围攻他们？不，不可能，因为印度尼西亚是海洋包围的群岛，印度尼西亚同志无处可藏。

第三，1927年中国同志当同国民党决裂时已经拥有了几万人的有战斗力的部队，可以依靠这些部队同蒋介石作战。而印度尼西亚同志现在没有任何军队，他们还要组建部队。

印度尼西亚的特殊条件限制了游击战、“武装革命”等方法的运用。

出路在哪呢？出路在于对游击战进行补充和完善，利用工人阶级在城市和工业企业的革命行动组织经济和政治总罢工，使反动政府的活动陷于瘫痪，还依靠在农村的游击战的支持。出路就是两种方式的配合。

印度尼西亚的航海工人、铁路工人和机械制造厂工人的罢工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可以影响国内的经济生活，使政府机关的活动陷于瘫痪，这样可以帮助游击战。

因此，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视在工人阶级中开展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性。此外，无论如何都要争取工人阶级中的绝大多数，要记住，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工作绝对不能少于在农民和游击队员中的工作。

5.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的主要过失是，到目前为止他们被左倾话语绑架。不努力认真分析形势，他们试图通过一次出击就解决所有问题：消灭封建主义，同荷兰决裂，消灭所有的帝国主义分子，摧毁反革命政府，消灭富农。事实上，他们得到的是：一切现实的和潜在的敌人联合起来反对自己、孤立自己，把自己的党削弱到最低水平。经常是这样，左倾狂热的后果令人悲伤。我感觉，左倾狂热情绪直至目前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仍然存在。为了把这种左倾情绪从党内清除，需要让党的工作人员深入实践，去从事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日常生活需要相关的“脏活”。只有在这里，在这样的工作中，

他们才能把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当然，这项工作不会出彩，没有排场，不喧嚣。但这将是目前印度尼西亚条件下最富有成效的工作。

文件中还有对在党内“自下而上”广泛讨论的必要性的指示：

我建议印度尼西亚同志不要迷恋讨论。无休止的讨论会正在摧毁印度共产党。这样做也将毁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我们要告诉他们，对于处于秘密状态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来说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是：负责同志制定党的纲领，在小范围内组织讨论，不要在报刊上公开进行讨论；文件经大多数负责同志通过后就批准，作为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的党的纪律生效；全体党员都应该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宣传和维护党的纲领；之后，在实践中检验党的纲领，党的会议纠正、补充和修改党的纲领。我认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暂时只适合采用这种方法。

这样从斯大林的答复中可以看出，他不赞成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方面盲目地遵循中国的革命模式，他建议要与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政治的具体条件乃至所处的地理条件相适应。其实，斯大林反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开展新的武装斗争，号召首先利用合法手段，如罢工和农民夺取土地。对于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落后农业国，他特别强调发动农民夺取土地运动的重要性，建议在党的计划中把农业纲领放在首要位置。

斯大林警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存在“左倾幼稚病”的危险，建议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不要打算一口气就解决所有问题，而要分阶段地进行斗争，逐渐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及其纲领的吸引力的任务。尽管此时在国际舞台上都在准备“冷战”防务，首先是苏联同美国对抗，但斯大林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首先把精力集中到反对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残余的斗争上，去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把印度尼西亚变成前殖民地的一切桎梏。（这同荷兰共产党人的努力相反，荷兰共产党人坚持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同前宗主国结成“特殊关系”列入到慕梭和格鲁

特1948年制定的纲领中。)①

很明显，斯大林对必须把“同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结盟”这类唱高调的宣传性句子写入纲领感到不满，大概这是基于讨好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的目的。

总体上，斯大林号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从事与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的日常利益和需求相关的实践工作，教育群众，整顿党务，不要把类似武装夺权这么困难的事情列为近期目标。

密码电报于1951年2月3日发给苏联驻北京大使，当天夜里22:00点由大使转交给刘少奇。②但是，此后中国方面长时间沉默，斯大林一直在关心自己书信的下落。1951年4月3日，他通过苏联大使直接联系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几个月前，刘少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询问菲利波夫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的意见。菲利波夫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件事的结果。可否得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消息。③

1951年4月5日，刘少奇给斯大林回了电报。④在电报中刘少奇表示完全支持斯大林的指示，他答应尽一切努力把这些指示转告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层。关于这件事耽搁的原因他解释说，根据中共中央得到的消息，1951年1月6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党的高层领导进行了调整：

先前的政治局常委中有四人被开除，包括前总书记成林茹⑤（坦林吉——作者注）。他们被开除的原因是，以成林茹为首的常务局没有执行政治局关于解散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决议，他们认为这是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局会议上，选举了新的常务局，通过了新的政治决议《印度尼西亚的形势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任务》。我们还不清楚新的印度尼西亚共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28，卷宗643，页码2—3。

② 同上，页码62。

③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558，目录11，卷宗313，页码63。

④ 同上，页码64—65。

⑤ 音译。——译者注

产党中央的情况，而他们也还没有表达得到我们给予政治建议的愿望。因此，我认为暂时还不是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提出任何正式建议的时候。

待接下来弄清楚形势和他们也请求我们给予建议时，到那时我们将向他们提供积极协助，向他们提供建议。

刘少奇答应把中共收到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的所有决议转交给斯大林。

这个情况在1951年4月7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的复电中得到证实。^①电报中说：

由于印尼共中央政治局在今年1月进行了调整，而新的领导层还没有向我们表达提供政治帮助的请求，因此，暂时没有合适的时机转达您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指示。需要等一段时间，以便弄清楚情况，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层提出政治援助请求时，到那时我们再以必要的形式转达您的指示。

在此，毛泽东承认，他本人“很少研究印度尼西亚问题”。

接着，毛泽东答应，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层调整的材料和新领导层的政治决议将转交给联共（布）中央。他还向斯大林建议，如果有新的指示，还可以通过中国共产党向他们转达。

1951年1月选举出以艾地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新领导层后，中共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联系才逐渐恢复。中国人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新领导人转达了斯大林的建议。结果，斯大林撰写的这些建议经过一年才传达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那里。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新领导层没有立即接受苏联领袖的建议。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与斯大林之间以书信形式和私人会谈形式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最终，斯大林说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相信了他的意见的正确性。斯大林在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讨论过程中所表达的思想，我们可以在1954年通过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新党章以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的演说和文章中找到反映。

斯大林对制定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重建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558，目录11，卷宗313，页码66—67。

战略和策略问题持如此认真、耐心、细致的态度，这自然引出了关于其原因的问题。对研究者开放的斯大林案卷的文件无法清楚地解释印度尼西亚在斯大林的亚洲政策或世界革命计划中的角色和地位。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中国取得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联共（布）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推测斯大林很可能是想利用苏联的经验、帮助和支持来巩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逐渐使其成为亚洲共产主义运动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抗衡力量。但是，这种观点与这样一个事实相矛盾，即斯大林认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通过中国共产党来找他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这完全符合苏联领袖说过的话：恰恰是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应该在亚洲共产主义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正如前文所述，斯大林认为，苏联只有一部分在亚洲，而中国整个在亚洲，中国在亚洲居于主导地位更好。这一思想在列多夫斯基刊登的斯大林同周恩来的会谈记录中有所体现。^①

因此，只能推测，在提出鼓励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后，斯大林在欧洲和亚洲努力重建和巩固尽可能多的共产党，他尽全力和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去完成这项任务。对作为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潜在领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关注，符合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制定的国家纲领任务：全力援助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不允许恢复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主义制度，因为美国夺取了印度尼西亚就总体上实现了美国在东南亚的扩张政策。^②

①（俄）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周恩来谈判速记记录，1952年8~9月：出自俄联邦总统档案馆文件》，《近现代史》1997年第2期，第83页。

②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91，目录1，卷宗1，案卷1，页码6—8。

第9章

斯大林和艾地

1950年6月，离开18个月之久的年轻领导人艾地和鲁科曼回到印度尼西亚。“茉莉芬事件”后，他们流亡到越南作战，尔后参加了1949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澳大利亚工会会议。艾地和鲁科曼开始在政治局工作，负责宣传和鼓动工作。

1951年年初，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年轻的活动家更新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层。艾地成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新领导人。^①艾地立即承担起了恢复党的统一的工作，这是慕梭在“茉莉芬事件”前就计划好并准备实施的。同时，艾地着手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制定新的战略和策略。西方研究者在分析了艾地为共产党制定的纲领及其思想基础后极力强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是从马列主义、而不是斯大林主义或毛泽东主义出发。他们论证说，尽管中国的榜样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产生了影响，但艾地绝对是独立地制定了自己的战略和策略。西方学者特别强调，在艾地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制定新计划和章程时莫斯科没有任何

^① Donald R. Hindle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1951 ~ 1953*,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p. 22 - 26.

参与。因此，他们表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新纲领摆脱了“斯大林教条”的影响。^①

在不久前开放的斯大林案卷中找到的文件完全驳斥了西方学者的上述论点。

“茉莉芬事件”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更新了领导层，以艾地为首的年轻领导人进入党的领导层，此后逐渐恢复了斯大林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新领导层之间的联系。档案文件证实，斯大林本人亲自积极参与并且是直接参与了艾地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制订新纲领的工作。斯大林会见了艾地和其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和长期的书信交流，直至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周。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论证说，不只是马列主义和中国的榜样，同时还有、并且首先是斯大林的思想，对年轻的以艾地为首的共产党新领导层制定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文件起到了重要影响，也对艾地本人的观点和观念起到了重要影响，这在他后来的演说和著作中能够看得出来。

1951年4月9日，通过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纲领，新纲领的最初方案是由艾地及其拥护者——新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年轻成员——制订的。在档案馆文件中找到了该文件的英译俄文本。^②

纲领中写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最高的阶级组织形式”，“目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正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人民民主制度而斗争，下一步是建立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指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全部活动都是建立在马列主义在印度尼西亚的革命实践——慕梭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决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新道路》（1948年8月27日）中所阐述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

文件称，印度尼西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小业主、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人士。革命的现阶段被定性为“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帝国

^① Donald R. Hindle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1951 ~ 1953*,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 31. Justus Maria Van der Kroe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65, pp. 51, 72. Justus Maria Van der Kroe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65, p. 130.

^②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558，目录11，卷宗315，页码22—26。

主义阶段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该文件接着指出：“印度尼西亚革命是人民民主革命，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是旨在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革命。”

“为了使印度尼西亚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获得解放”，强调了把一切反封建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人士团结起来的必要性。但在此指出，解决这项任务需要很长时间，而最直接的和近期的任务是培训党员和建立民族统一阵线。

纲领中顺便提到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由于印度尼西亚是个农业国家，党在农村的工作应该扩大和深化。”

如果把在艾地领导下制定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驻北京代表穆里奥诺与中国共产党于1950年10月6日制订的纲领建议^①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份纲领比较温和，摆脱了革命性的蛊惑宣传和左倾倾向，在较小程度上借鉴了中国革命的经验。两份纲领的共同之处是不重视农民及其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斯大林在分析1950年10月6日纲领建议初稿时指出的不足被删除了，但没有全部删除。

应该指出，斯大林对1950年10月6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初稿的意见，只是到了1952年2月才由中国共产党转告给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新领导层。显然，因为老的领导人被开除出政治局，中国共产党这时才成功地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恢复了联系。1952年3月，印度尼西亚同志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件中通报收到了“联共（布）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印度尼西亚问题的信”。^②

但需要强调的是，“印度尼西亚同志”——艾地领导下的印尼共产党新的、年轻的领导层——一开始并没有接受斯大林的批评，既不同意斯大林关于印度尼西亚局势的一系列评价，也不同意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战略和策略的一系列评价。年轻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意见在1952年3月20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得到阐述。^③1952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把这封信转交给苏联同事。^④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558，目录11，卷宗313，页码2—12。

② 同上，页码16。

③ 同上，页码9—21。

④ 同上，页码19。

信中说，政治局讨论了联共（布）中央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的意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不完全同意信中的意见。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信中表达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层对斯大林的意见和建议的异议。

这封信表明，艾地及其志同道合者不知晓穆里奥诺和中国共产党在1950年制定的纲领建议。信中说：“我们不知道联共（布）中央寄来的所有材料是否都是正确的。因此，我们热切期盼你们把“穆里奥诺同志的建议草案”寄给我们。接着，对斯大林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战略和策略中重要问题的意见提出了异议。

第一个意见涉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斯大林写道：“近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不是建立反帝国主义、‘争取印度尼西亚真正独立’的广泛民族统一阵线，而是根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并把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如果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共产党理解了土地改革的重要性并在这方面帮助农民，作为人民民主革命基础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盟将得到巩固。”^①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对这个建议答复说：“的确是这样，到目前为止印度尼西亚仍是农业国家，但是，在印度尼西亚没有封建地主……爪哇在革命时期就消灭了地主……在印度尼西亚反封建主义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封建习俗的斗争。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反帝国主义占有者、也就是反政府的斗争”，政府把土地租给了外国人。“我们认为：根据印度尼西亚现行土地所有制和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现在我们党的首要任务不是建立反封建主义阵线。我们认为，现在党的主要的和首要的任务是建立广泛的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的民族统一阵线。”在此不仅强调了反荷兰帝国主义斗争的重要性，同时还强调了反美帝国主义的重要性，因为美国正不断地渗入印度尼西亚。“这种情形同我们的苏联同志描绘的情形有些不同”——“印度尼西亚同志”在书信第一部分的结尾处这样写道。

第二部分涉及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在这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赞同斯大林的意见。“至于战略问题，我们完全同意苏联同志的意见，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综合使用两种方式：武装革命和工人的革命行动。我们请您相信，我们党正在这方面努力。”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558，目录11，卷宗313，页码51—52。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新领导层把斯大林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所有人都是左倾漂亮话的俘虏”的意见归因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过去的活动。现在“我们的党员特别是我们党的干部，开始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和毛泽东著作……这是唯一的保障，我们党有能力逐渐克服在为完成伟大而复杂的任务而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缺点和软弱性”。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指出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存在和活动所处的困难的国内政治条件，以此证明自己实行半公开工作方式的正确性，显然，这是对斯大林提出的关于向党员发出深入实践，去从事琐碎的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日常需要相关的“脏活”的革命性号召建议的答复。在此，印度尼西亚人援引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我们认为，现在我们所使用的方法符合《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报纸上经常刊登的建议。”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表示希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驻北京代表伊斯坎达尔·苏别克季（Ickander Subject）、林托（Rinto）^① 能向苏联同志解释他们的观点。

显然，为努力消除与苏联同志首先是斯大林本人的分歧，1952年5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致信联共（布）中央，请求在莫斯科召开联共（布）、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三方代表会议。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的请求得到“中国同志”的支持。但是，1952年5月20日，联共（布）中央决定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的这个建议不予答复。这可以理解，斯大林认为他已经足够详细地解释了自己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战略和策略的意见，并通过中共于1951年2月2日转告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很有可能，苏联领袖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反驳他的意见以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处于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影响之下感到不满。

在我们看来，斯大林在同中国领导人就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亚洲国家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谈话时玩的那个文字游戏可以论证这个情况。一方面，他们怂恿中国共产党成为亚洲共产党的老师和帮手。1952年8~9月，斯大林在同周恩来会谈时说：“中国应该变成亚洲的军火库。日后中国应该向其他国家派驻专家”，“现在应该执行这样的路线——中国在亚洲居于主导地位，这是最好的情况，因为苏联只是

^① 艾地的助手。——译者注

部分处于亚洲，而中国整个都在亚洲，它应该起到主要作用”。^①列多夫斯基写道：周恩来援引刘少奇的话向斯大林报告说有两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作为联共（布）十九大的嘉宾将要来莫斯科，他们可能是想同苏联和中国领导人就党务问题进行会谈，斯大林回答说，如果中国同志想这样做，他就不反对，如果不是，那就不行。^②在已刊登的1952年9月19日斯大林同周恩来的会谈记录中，斯大林在回答周恩来关于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会谈的问题时更具倾向性。他说，暂时就这个问题谈些什么意见还有困难。他指出，这是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不是直接找联共（布）中央，而是通过中国人。他举了一个印度共产党的例子，印度共产党人请求帮助他们制定党的政策，“我们应该去做，尽管我们很忙”。^③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力求自己的活动能事先得到斯大林的支持，联共（布）中央的拒绝令他们惶恐不安，但他们没有放弃同“苏联同志”进行直接联系的尝试。鉴于参加联共（布）十九大会议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阿斯穆（Acmu）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驻北京代表伊斯坎达尔·苏别克季已启程前往莫斯科，1952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转达了印度尼西亚人关于在莫斯科举行讨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问题的三方会谈的请求。阿斯穆和苏别克季被授权在三方会议中代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但是，1952年11月3日，阿斯穆和苏别克季收到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的来信，信中通知说，考虑到讨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问题的三方会谈的重要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决定扩大参加三方会议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人数，增至四人，指派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和印尼共中央委员约多（Nioto）为代表团成员，他们要参加荷兰共产党会议，应该在1952年11月25日前抵达。

收到这封信后，阿斯穆和苏别克季向苏共中央提出在艾地和约多抵达前延期讨论印度尼西亚问题的建议。

但是，艾地和约多抵达荷兰后被荷兰当局遣送回印度尼西亚。

^①（俄）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周恩来谈判速记记录，1952年8~9月：出自俄联邦总统档案馆文件》，《近现代史》1997年第2期，第83页。

^② 同上，第84页。

^③ “The Cold War in Asia”,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6-7, p. 19.

1952年12月15日，艾地和约多抵达布拉格，准备前往苏联。^①

同时，已经抵达莫斯科的阿斯穆和苏别克季于10月25日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形势的报告。他们在报告中阐述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对联共（布）中央1951年2月2日来信所涉及问题的意见，请求苏共中央讨论这些问题。

报告中还附有一封阿斯穆和苏别克季署名的致苏共中央委员的信。在档案馆中找到了这封信的俄译本，上面带有斯大林的批注。^②

信中谈到如下内容：

向你们提交关于印度尼西亚国内形势的报告，关于党的战略、策略和党的组织结构的报告，关于党的组织群众工作的报告。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认为：

目前的形势让我们有理由期待印度尼西亚的革命形势再次成熟……我们收到了苏共中央来信，在阐明给我们的指示方面已经成功地开展了工作。但是，直至目前我们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鉴于此，我们非常想组织关于印度尼西亚形势问题的讨论，以便让我们对您来信中就我们目前还不够明白的所有问题的意见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例如，为什么在印度尼西亚反荷兰帝国主义的斗争被认为是首要的任务？为什么应该只建立反封建主义阵线呢？

我们确信，只有仔细研究了苏联共产党的经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才能正确地领导印度尼西亚人民群众取得革命的胜利。

鉴于印度尼西亚问题也与中国同志有关系（从地理角度来看是这样，还由于在印度尼西亚生活着250万中国人，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经济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建议邀请来自中共中央的同志参加这次讨论。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558，目录11，卷宗315，页码16—17。

② 同上，卷宗314，页码5—6。

实际上，阿斯穆和苏别克季信中的所有引文都被斯大林标出来了，特别是关于反荷兰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建立反封建主义阵线的问题。

保存在档案馆中的报告俄译本极为冗长和翔实。报告中还附有许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文件的俄译本：1948年通过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新道路》；1952年3月1日批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决议《工人统一阵线的任务》；《关于党在土地改革领域的政策》（据我们推测，是1951年11月通过的）；《党机关会议总章和共同纲领》（摘自杂志《红星》，*Bintang Merah*，1950年3月21日至4月1日第6、7期，有100多页的机器打字件）。^①从文件中可以看出，斯大林极其认真地阅读了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准备的报告。^②报告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形势、政治力量和国家政权的特点，阐述了以艾地为首的领导层拟定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政策和任务的基础。斯大林用蓝色铅笔在他看来最为重要的地方画了线。第一处是一整段内容，谈到了关于为废除同荷兰达成的不平等协议而斗争和拒绝同美国签订相互安全保障协定；第二处指出了对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实行国有化，斯大林补充道：“没有外国企业么？”在国有化的归类中没有包括外国企业。关于必须清除大土地所有制的句子，他补充道：“把这些土地转交给农民。”印度尼西亚提出的“以赎买方式向农民分配土地”的建议令他困惑不解。

斯大林仔细阅读了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起草的关于这份报告的简介^③。他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及党提出的要求等处做了许多标注。文件中的许多内容引起了斯大林的怀疑和讥讽。例如，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要求号召所有外国军队撤出印度尼西亚和整个亚洲、反对重新武装德国和日本，斯大林批注：“哈哈！”批注随处可见。与此同时，斯大林特别注意了关于农业问题的建议，对耕者有其田的正义要求做了标记，补充“归私人所有”。

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文件《党在土地改革领域的政策》简介^④中，对印度尼西亚土地关系的性质和农村居民的阶级分化的内容做了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558，目录11，卷宗314。

② 同上，页码7—35。

③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558，目录11，卷宗315，页码8—12。

④ 同上，页码27—32。

展开评注，对党的领导干部在农村工作给出了详细指示。斯大林强调了农民问题在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农业国家的重要性，在关于国内没有进行彻底的土地再分配、甚至归还了外国大资本家对土地的所有权利和特权这些内容的地方作了标记。他支持剥夺（没收）封建主的土地和把主要的生产资料国有化的要求，支持把对土地的最高权力转交给政府、再把土地分配给农民私有。总体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土地纲领没有遭到斯大林的反对。

可以认为1952年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问题的情报简报中所刊登的内容，是苏共中央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这些文件的初步反应。^①简报中还评价了1952年3月20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1952年10月23日才转交给苏联共产党）以及1952年10月25日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形势的报告（其中有考虑到斯大林的反应撰写的批评意见）。

印度尼西亚同志提交的两份文件含有不正确的内容。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层表示完全不同意联共（布）中央的一些意见。例如，印度尼西亚同志认为，在印度尼西亚没有封建地主，土地属于处于帝国主义分子影响下的政府，因此，按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观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头等任务是反帝国主义斗争、而不是反封建主义斗争……但是，在阿斯穆和苏别克季的报告中列举了关于印度尼西亚农民的一些具体材料，这些材料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关于印度尼西亚不存在封建地主的说法相矛盾。报告中说，“在革命时期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取了大量土地，现在再次被武力夺走了。况且，直至目前农民仍在受封建剥削……”接着报告使用数字材料展示印度尼西亚小农的数量。

印度尼西亚同志也不同意争取真正独立的斗争锋芒应该对准荷兰帝国主义分子。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反荷兰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同反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未必能区分开来。”这样，印度尼西亚同志就过早地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提出了挑战，扩大了自己的敌人数量，令自己在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558，目录11，卷宗315，页码16—18。

斗争中失去了策略优势。

关于联共（布）中央所说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层的“左倾”错误的意见，印度尼西亚同志在信中表示，这些意见只是在评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过去的活动时才是正确的。但是，简介的作者不同意这样提出问题。他们指出，在阿斯穆和苏别克季的报告中有一些正确的内容和评定“存在不正确的表述”，这可能对党的工作造成错误。例如，他们表示现在印度尼西亚的政权掌握在同帝国主义分子结盟的印度尼西亚民族资产阶级手中，但没有提到作为国家政权参与者的地主阶级具有部分资产阶级性质的问题。印度尼西亚同志有时把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定性为帝国主义的间谍。

报告中没有直接谈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应该把荷兰帝国主义分子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看作同一类敌人，应该同时开展对他们的斗争，但是，实际材料是带着这个目的挑选的。

报告中还列举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的一些要求，其中有些要求是不正确的，与现阶段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运动不相适应。例如，要求对最重要的国有企业——大型工厂、矿井、交通工具、大农场以及一些私人所有的大楼——实行国有化。

1952年12月，艾地和约多抵达苏联，在这里参加联共（布）十九大会议和庆祝斯大林73岁寿辰。1952年12月29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致信苏共中央，信中附有关于印度尼西亚事件进展的简要报告。艾地在信中再次请求举行苏共、中共和印尼共三方会议讨论印度尼西亚问题：

您已经知道，阿斯穆、伊斯坎达尔·苏别克季、约多和我已经来到这里，我们期待同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讨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我们对苏共和中共表示感谢。^①

1953年1月6日，印度尼西亚同志受到了斯大林接见。他们举行了会谈，会谈记录在目前可供研究者接触的斯大林档案馆中没有发现。但是，讨论的问题的性质应该是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活动的理论和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558，目录11，卷宗315，页码2。

实践，这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艾地和斯大林的通信中得到体现。

一封是 1953 年 1 月 13 日艾地给斯大林的信。^① 信件开头就奉承地对斯大林关注印度尼西亚表达敬意和感谢，他们努力博得领袖的好感。可以推测，斯大林之所以令印度尼西亚人激动，是因为他们只能通过中国人接触斯大林，他们之前没有考虑斯大林关于党纲的意见和建议，所以，现在他们想请斯大林宽容地允许他们当面解释一下没有注意他的指示的原因并请求原谅。

我们对您向我们提供拜见您并同您就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的机会表示高兴和敬意。同您——全人类伟大的导师和领袖——会晤和会谈，这是我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代表团的莫大荣誉。聆听您的鼓舞人心的话和全面的批评，这对我们来说是珍贵的和必要的。这次会谈和其他一些会谈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革命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

艾地在信中表示，实际上他同意斯大林的所有意见，解释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的立场，询问斯大林的意见和建议。

约多、阿斯穆、伊斯坎达尔·苏别克季同志和我讨论了 1953 年 1 月 6 日第一次会谈期间您关于三个问题的意见：（1）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农业纲领；（2）民族统一阵线；（3）关于不久前印度尼西亚政治事件的策略。

我们讨论的主要结论如下：

农业纲领。我们同意您的意见。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 33 年来直至今日，农业问题在我们党内始终处于次要地位。正如您向我们解释的，农业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和具有决定性的问题，这已为欧洲以及亚洲的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所证明。我们认为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如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现在不重视农民问题，就会再次经受 1926 年和 1948 年那样的惨败。

直到 1951 年年末，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没有很好地制定农业纲领。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 558，目录 11，卷宗 316，页码 2—6。

1951年11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公布了农业纲领，当我们于1952年2月经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来信时，我们的农业纲领已经全都准备好了。

至于“土地国有化”的口号，我们不久前才明白这是不正确的。尽管农民还没有积极反对这个口号，大概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直接认识到它的缺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完全不明白这个口号的意义，对这个口号持消极和怀疑的态度。我们自己的经验表明，这一口号会阻碍农民运动的发展。我们完全同意您关于有必要放弃这个口号的意见。正如您所说的那样，土地国有化完全是必要的，但是，在现阶段的印度尼西亚并不是纲领性要求（斯大林强调——作者注）。（最后一句话是斯大林在文件留白处强调的。）

我们现在确信，归根结底，农民得到土地是革命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因此，提出“土地属于农民”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要用这个口号无条件地没收外国人以及印度尼西亚地主的土地。我们将向农民解释，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根除封建主义（斯大林把“封建主义”改为“封建主义残余”）。

您向我们指出，在拟定农业纲领时不要迷失在资本家的法律中。我们认为，您说的完全正确。

接着艾地写道：

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农业纲领中谈到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需要从事把得到土地转为私有的工作。

最后一句话是斯大林强调的。

在对信中的第一部分做总结时艾地说：

我们想说，现在您在苏共中央信中所阐明的观点同我们对上述问题的意见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分歧了。

艾地信件的第二部分题为“民族阵线”。他写道：

您指出，我们应该在把所有的农民团结在我们周围或建立没有农民参加的民族阵线之间做出选择。（斯大林对这句话批

注：“我没说过这样的话。”“没说过”这个单词斯大林两次强调。)我们认为，同农民结盟是我们的基础，因为这意味着同绝大多数人民结盟。但有时在国内斗争策略上需要同印度尼西亚各政党在最低纲领（斯大林强调——作者注）的基础上建立共同阵线。

艾地请求斯大林解答这样一个问题：

在研究同其他政党的统一阵线问题时，我们想问：您的意见如何？（斯大林强调——作者注）您对此有何建议？”（斯大林反对提出这个问题，两次用符号“+”和“NB”强调——作者注）。

至于刘少奇同志关于国有化纲领的意见，对首先是属于帝国主义分子以及叛徒的企业实行国有化，您赞同他的观点，现在我们也完全同意。

信件的第三部分是“策略”：

我们完全同意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使用什么样的策略必须适合目前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形势。

目前我们的任务是在军队领导机关中占有尽可能多的职位。此外，为了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我们应该要求一些具体的让步，其中包括，出于自卫目的要求武装人民防范恐怖主义集团特别是封建主的走狗的侵犯。

我们对您在第一次会谈中提出来的一些主要问题的意见就是这样简略。

在结尾部分，艾地向斯大林通报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目前正在制订的文件。

现在我们在准备：

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草案取代现行由12点内容构成的纲领，这份纲领远没有实现，还含有一些错误。

为我们党的干部和党员制订一份决议，决议中明确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任务和策略，旨在在党内就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达成统一，因为这是实现我党纲领的基本条件。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打算把目光由中共转向苏共，中国共产党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他们的思想和实践仍有影响。

在中共中央同志的帮助下，我们准备了上述文件的草案，随后，刚一完成制定工作就提交给您审阅。我们期待知道您就上述草案的意见。（斯大林在最后一句话打上符号“+”）。预致谢意。致以同志般的问候，艾地。

斯大林给艾地回信的日期是1953年2月16日，也就是斯大林逝世前的两个星期。在档案馆中存有一份斯大林用铅笔写的第一稿和几页斯大林校对过的机器打字件。在本书中引用的是其中誊清的一份。^①

开头斯大林是这样写的：

您1953年1月13日的信件已收到。我不想答复您是因为考虑等您再次进行会谈时再谈这件事。但随后我了解到您在等待答复。因此，我决定答复，不等再次会谈了。

接着就讨论的主要问题做了具体答复。

1. 农民问题。值得高兴的只是，我们在农民问题上没有大的分歧。但是我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不应该有分歧，还不应该有误解。我指的是在您的信中有一个地方说：“我们将向农民解释我们党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封建主义。”这句话可能引起误解，因为人们可能会认为在印度尼西亚存在彻底的百分之百的封建主义，自然，这是不正确的。在同您会谈时我就已经说过，在印度尼西亚不存在百分之百的封建主义，不可能存在，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就不存在百分之百的封建主义，正如在中国和其他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反封建主义革命开始时都不存在一样。

有人会问，当时这些封建主义国家的特征是什么？现在印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558，目录11，卷宗316，页码14—19。

度尼西亚也是这样么？自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封建主义，而是大的、沉重的封建主义残余。关于封建主义残余，俄国共产党人说过，当时他们在 1917 年发动农民反抗地主。在人民民主国家推行农业改革时也说过。我认为，现在印度尼西亚也是这个情况。因此，在撰写纲领时消灭“封建主义”换为“消灭封建主义残余”更为准确……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封建主义残余，其本质是什么？

第一，大地主事实上保存着对农民耕种的土地的垄断性占有权，大多数农民由于贫穷，没有占有土地的可能性，因此，农民被迫在任何条件下都得向地主租借土地（在封建主义条件下地主对土地拥有“垄断权”）。

第二，实物地租对地主有利，这占了农民收成的绝大部分，导致大部分农民处于赤贫状态（封建主义下的实物贡赋）。

第三，地主经济中的劳役制，通过粗暴地清点农民的财产来实施，使大部分农民陷入奴役态度（封建主义下的“劳役制”）。

最后，沉重的赋税义务压在大多数农民身上，使他们成为没有偿付能力的债务人，陷入地主的奴役之下（封建主义下的“债务奴役制”）。

封建主义残余的所有后果就清晰了：农业技术落后，绝大多数农民贫困，国内市场狭小，国家没有能力工业化。

由此共产党人面临的首要任务：铲除封建主义残余，开展反封建主义的土地革命，把地主的土地无偿地转交给农民所有。

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放弃土地国有化和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私有——放弃农业发展的社会主义前景，是否意味着暂时退却。不，不意味着。

在俄国可能，也需要以直接的方式实现土地国有化，因为那里存在这样做的有利条件（存在农村公社，布尔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得到农民的信任）。在人民民主国家，情况正好与此相反，那里有很深的土地私有制传统，因而那里的国有化

必须通过迂回道路前进：首先把土地转为私有，但随后劳动农民志愿结合建立合作社。这些国家在实行土地国有化之前使用了限制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的中间手段。中国走的就是这条路。“我认为，印度尼西亚土地革命胜利后也会这样做。”

2. 民族阵线。自然，如果共产党力量很软弱，没有能力同时既要建立工农联盟和又要建立民族阵线，就不得不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集中自己的力量去建立工农联盟，这是更为重要的事。无论如何不能认为这是令人满意的情况。令人满意的情况与此相反，党应努力同时建立工农联盟和民族阵线。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民族阵线是绝对必要的，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不仅要反国内的反动派，还要反外部威胁。

我的建议是：在土地纲领的基础上建立工农联盟，同时要改善和巩固民族阵线，使共产党在该阵线内部居于领导地位。

对您信中的其他内容，没有任何意见。

致以共产党人的问候，1953年2月16日。

众所周知，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逝世。显然，斯大林没有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再进行会谈或书信往来。

1954年3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通过了共产党新纲领，斯大林的解释和阐述都加了进去。

首先，这涉及印度尼西亚作为半封建主义国家的性质。在艾地及其志同道合者早时起草的文件中经常交替使用“半封建”和“封建”。例如，在1951年4月批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中把印度尼西亚称为“半封建主义国家”，而在那份文件中接着说，革命旨在反对“封建主义”、争取摆脱“封建主义压迫”。在1952年3月20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在印度尼西亚不存在封建地主，应该进行反“封建习俗”和反“封建主义残余”的斗争，而在1953年1月13日艾地致斯大林的信中谈到了消灭“封建主义”。

辛德利注意到，艾地对这个问题理解得不够透彻。他写道：

艾地的领导层关于印度尼西亚革命问题的理论建立在印度尼西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观念基础上。首先，这是党的领导层的简单判断，因为领导层自身都在犹豫……另一方

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开始也没有解释应该怎样理解印度尼西亚的半封建主义性质，很有可能，这是因为在1953年之前没有从事过农村工作。

艾地在1953年7月的纲领性文章《今后的印度尼西亚农民运动》中才使用了“半封建主义”这个单词，这意味着定义明确了。这篇文章标志着在农村繁杂工作的开始。

接着，这位西方研究者援引了艾地文章中的主要内容：关于存在“严重的封建主义残余”、地主垄断土地；农民被迫在地主的条件下租种土地；为得到土地缴纳大量实物地租、服劳役；农民劳役负担沉重。^①如果我们把这些内容和艾地后来写的文章中的内容同1952年2月16日斯大林给艾地的信中的内容加以比较，斯大林的解释和表述的影响就显而易见了。正如辛德利指出的，相对于1953年7月艾地在文章表达的观点来说，1954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纲领中没有任何新东西，没有任何补充。这样，可以得出结论，印度尼西亚作为半封建主义国家的定性直接受到了苏联领导人的影响，或者按照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是“斯大林风格”。

斯大林在分析第一份1950年10月6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建议时给出的建议，可以在1954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中找到，那里谈到了关于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主要目的。辛德利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目标。尽管艾地强调两者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一下子就解决这两项任务是不可能的，他号召首先集中精力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然后再根除封建主义残余。^②

斯大林所说的话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制订和明确革命动力和无产阶级盟友关系也产生了影响。斯大林多次重复了印度尼西亚农业问题的头等重要性的首要建立的不是广泛的反帝国主义的阵线，而是反封建主义的阵线。在分析1950年10月6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的建议时，他直接强调说，在印度尼西亚人民民主的基础只能是工农结成的牢固同盟。最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同意提出这个问题，这在

^① Donald R. Hindle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1951 ~ 1953*,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32 - 33.

^② *Ibid.*, pp. 37 - 38.

1953年1月13日艾地致斯大林的信中可以看出。正如辛德利强调的那样，从1953年年中开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层开始把注意力放到了农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把目光转向农民的标志是1953年7月艾地的声明：“土地革命是印度尼西亚民族民主革命的本质。”^①这实质上是重复了斯大林的话。

苏联的建议在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评价中得到了反映。在联共（布）中央对外联络部的报告中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把所有的民族资产阶级都定性为“帝国主义间谍”进行了批评。艾地的领导层考虑了这个意见，把资产阶级划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接下来争取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为自己服务。^②

斯大林认为印度尼西亚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斗争。最后，艾地和他的同志们同意了这个意见。他们表示地主是“革命最主要的敌人”。^③

艾地和他的同志们同斯大林讨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民族阵线。在上述所列举的联共（布）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之间关系的文件中可以看到。

辛德利写道，一开始艾地和慕梭一样，认为建立民族阵线是党的战略的主要方面。但是，以艾地为首的领导层在最初几年没有对民族阵线进行过明确定义。正如辛德利强调的，1950~1952年研究了这个问题。西方研究者指出，党的活动经验和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的研究是促进制定党接下来所使用的策略、统一阵线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的主要因素。^④档案文件证实，斯大林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形成关于民族阵线的观点作了很大贡献。

斯大林认为，应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阵线，为争取印度尼西亚完全独立而斗争，同时，还应该建立反封建主义阵线。稳固的工农联盟应该成为这个阵线的基础。可以把劳动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也吸收进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应该逐渐在这个阵线中居于领导

^① Donald R. Hindle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1951 ~ 1953*,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 41.

^② *Ibid.*, pp. 43 - 45.

^③ *Ibid.*, pp. 45 - 46.

^④ *Ibid.*, pp. 47 - 48, 55.

地位。

可以推测，不管怎样，同斯大林的讨论帮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明确了在民族阵线问题上的观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最终是在 1956 年夏天形成的。这些表述同苏联领袖的建议没有分歧。^①

斯大林的建议被艾地一字不差地搬到他的著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简史》（1955 年版第四章）和《印度尼西亚社会与印度尼西亚革命》（1957 年版第五章第一节和第二章第二节）中。^②

最后，可以有充分依据地说，斯大林的观点、意见和建议（绝对不是教条主义的）对艾地领导时期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的制订以及 20 世纪 50 ~ 60 年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的制订产生了实质性的、重要的影响。这样，艾地及其战友成为真正的斯大林主义者，但并不是西方学者赋予的那种概念——把斯大林主义解释成强硬路线、教条主义的、革命极端主义的、盲从“莫斯科路线的”代名词。正相反，在解决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相关的问题时，斯大林的指示旨在追求更为灵活的、实用主义的方针，温和的立场，极其谨慎和耐心。

应该指出，无论是艾地还是其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从来没有谈过斯大林思想对他们的世界观的影响。显然，这是因为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的党的领导层提出了批评领袖和同斯大林主义进行斗争的口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活动家对来自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援助和支持感兴趣，不想与苏联新的政治和思想路线分道扬镳，想保持时代精神。

在研究者能接触到的档案文件中，有这一时期印度尼西亚发的三封关于斯大林逝世的唁电。韦洛坡（Wilopo）^③ 政府的官方唁电语气非

^① Donald R. Hindle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1951 ~ 1953*,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47 - 59.

^② （印度尼西亚）艾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简史》（译自印度尼西亚文）。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1956 年。（印度尼西亚）艾地：《印度尼西亚社会与印度尼西亚革命》（译自印度尼西亚文）。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8 年。

^③ 韦洛坡（1909 ~ 1981），印度尼西亚政治活动家，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成员。1949 ~ 1950 年任印度尼西亚劳动部长，1952 年任外交部长，1952 ~ 1953 年任印度尼西亚总理。——译者注

常谨慎。苏加诺总统的唁电很有个人色彩、情感丰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唁电中表达了深刻缅怀，并许诺完成领袖的所有遗训。^①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91，目录6，卷宗1，案卷2，页码1—3。

结 论

根据对不久前开放的档案文件的上述分析，我们对二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印度尼西亚政策提出了更正意见。

从研究一战和二战之间印度尼西亚的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苏联领导层和领袖本人清楚地知道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国际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状况，就重要性来讲，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在亚洲大陆处于第二位，在中国共产党之后。印度尼西亚左派积极分子在苏联共产主义学校接受培训，在位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各分支机构和境外支部工作。共产国际——自然包括斯大林本人，对印度尼西亚——当时称荷属东印度——共产党人的活动作出了积极反应，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的极左言行，他们的目标是不仅要摆脱殖民依附获得独立，还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伊始，由于苏联的严峻局势以及共产国际的解散，苏联领导层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之间的联系中断了。部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其中包括慕梭）留在了莫斯科，同祖国没有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阶段，当二战后苏联对亚

洲战略计划制定完成之际，日本占领下的荷兰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处于苏联最高领导层的关注范围之外。甚至在绝密文件中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对印度尼西亚也没有兴趣，原因是苏联同日本签订了关于在二战中中立的条约。再者，那些年发生的同苏联利益相关的主要事件，除了欧洲以外，主要是在东北亚展开的，首先涉及中国、日本和朝鲜。同时应该指出，像迈斯基这样极具政治远见的苏联外交家们当时预先提示了制定苏联在殖民地问题上的明确立场的重要性。

最终决定参加对日作战后，苏联在政治战略中首次提出了关于东南亚殖民地——其中包括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的问题。但是，斯大林首先关心的是保障苏联国界周边直接毗邻地区的安全。远离苏联国土的东南亚和那里人民的命运，当时对领袖来说不是迫切问题。在划定东南亚（其中包括荷属东印度）势力范围时荷属东印度被划为英国管制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新高潮，结果在前殖民地领土上诞生了一批新的独立国家，其中许多国家由民族资产阶级集团的代表来领导，1945年8月17日在前荷属东印度殖民地领土上宣布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就是其中之一。新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由苏加诺总统领导。

众所周知，苏联领导层和斯大林本人对亚非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持肯定态度。对欧洲共产主义革命的期望破灭后，苏联领导人开始把亚洲反殖民主义运动看作摧毁资本主义——它的对外政治基础是世界上的帝国主义——阵地的的重要工具。这些观点在共产国际的亚洲政策中得到反映。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斯大林关心的是二战后欧洲安排、与盟国关系、与日本的协调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这反映在斯大林领导班子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布自己的主权的态度上。

出现独立的印度尼西亚这个事实本身及其最初向苏联发出请求给予承认和支持的呼吁，都没有引起苏联领导层的任何正式的反应。显然，原因之一在于苏联领导人对这个国家发生的事件的情报掌握得不够。这一结论来自在档案中找到的报告和情报，其中所包含的信息是不充分的、相互矛盾的，有时是歪曲的。

苏联领导层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持谨慎态度，不排除荷兰共产党在其中起了作用。起初，荷兰共产党对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持否定态

度。后来，荷兰共产党人承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荷兰共产党得到了当时在荷属东印度殖民地荷兰经济利益服务而领取工资的劳动者的支持。对他们来讲，印度尼西亚脱离宗主国意味着失去工作岗位和丰厚的工资，而这可能会严重削弱荷兰共产党在荷兰政治舞台的地位。

1946 年，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开始活动。荷兰在英国军队的掩护下发动了反对印度尼西亚主权共和国的殖民战争，印度尼西亚成为斯大林在国际舞台上反对前盟友——英国，尔后是美国——政治游戏中的一颗重要棋子。捍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抗击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的侵略意向的宣传效应，随着“冷战”在亚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加剧而增强。要求荷兰停止对印度尼西亚的殖民战争和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在这一时期逐渐成为斯大林对外地区政策中的固定内容。

应该补充一下，按照报送莫斯科的不完整的和不准确的情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政权逐渐转到亲共产党的左派领导人的手中。这个情报来源于荷兰共产党人，他们是从一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活动家那里得到的消息。苏联领导层习惯相信这些情报渠道，因为按照共产国际的传统，宗主国的共产党照料“自己的”殖民地共产党，殖民地共产党同莫斯科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宗主国共产党来实现的。

根据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左派力量得到巩固这一情报，苏联对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关注不断加大。在维护这个国家的主权时，除了基于纯粹的权宜之计外，斯大林和苏联领导层的对外政治意向仍然和以前一样，由世界革命思想和苏联的地缘政治利益这些固有因素决定。

在“冷战”加剧的形势下，苏联领导层越来越积极地使用宣传性言辞为自己的现实政治利益服务。在苏联报刊、学术性的政论刊物上，在国际论坛特别是青年论坛上，猛烈地开展了反帝国主义运动。支持印度尼西亚反殖民主义斗争就是这一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1948 年东南亚各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茉莉芬事件”）左派力量反政府行动的重要刺激因素，有可能是号召亚洲人民为了过上美好生活去同帝国主义及其在各殖民地和独立国家内部的民族资产阶级走狗进行斗争的宣传，而不是出自“莫斯科之手”或斯大林本人的指示。

当时，莫斯科在现实政治中持极为克制的态度。联共（布）中央严厉制止充满激情的共青团员过多地从事空洞的宣传工作，指示他们

采取实际行动去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

在与苏联的相互关系中，印度尼西亚方面首先考虑自己的生存利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布主权后，它的领导人致力于得到所有大国的承认以及同荷兰殖民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支持，同时不受他们的思想政治倾向限制。因此，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对苏联在联合国维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利益的行动表示热烈欢迎。同时，苏加诺总统及其战友不想损害同西方国家首先是同美国的关系，努力避免把印度尼西亚列入“冷战”中的苏联阵营。

但是，当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陷入存亡危险的紧急时刻，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向苏联发出了援助呼吁，期望苏联无论是在联合国内还是在联合国之外都坚定地开展反对荷兰殖民侵略的行动。美国在印度尼西亚问题上持更为克制的态度，从而帮了荷兰人的忙。

为了满足印度尼西亚的倡议，苏联领导层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司法讨论后，迈出了事实上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苏联外交实践中尚属首次）和同其建立领事关系这一步。同时，苏联拒绝进一步密切联系和官方承认。

印度尼西亚领导人甚至是右派民族主义者都明白苏联这一步骤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重要性。但是，在荷兰叫嚣的影响下，他们不想把同美国的关系复杂化，在“冷战”的框架内此举可能被看作苏联的地缘政治优势、苏联的胜利，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倾向于批准同苏联签订领事协定。最终，对苏联的这一举措没有回应，这引起了苏联领导层的不满。

第二次关于承认印度尼西亚独立的倡议是荷兰发出的，期望荷兰庇护下的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得到国际承认。苏联领导层起初对荷兰的呼吁持否定态度，最后还是承认了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这显然是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此时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正式承认，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荷兰承认取决于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得到中国的承认。

应该指出，与其说印度尼西亚领导人想努力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不如说是想努力得到苏联同意其加入联合国。印度尼西亚人刚刚达到这个目的，就开始拖延与苏联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派外交代表。直到苏联史中斯大林时代的结束互派大使也未能实现。

这样可以得出结论，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对苏联利益来说实际成果很少，但对印度尼西亚达到自己的目的极为有益。

斯大林对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关系问题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上文已述及，许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曾在苏联流亡。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追踪自己国家发生的事件、左派政党和组织的形势。在联共（布）中央机关中设有隶属于对外政策部的东南亚司。关于印度尼西亚形势的报告定期汇报给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知晓。

二战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努力同联共（布）建立直接联系。许多印度尼西亚左派不喜欢来自荷兰共产党方面的强大影响，荷兰共产党对反殖民主义斗争持否定态度。在荷兰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左派领导人多次被迫同殖民主义者进行协调，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拖向深渊。以艾地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亲苏集团希望更多地依靠苏联和联共（布）去实现自己国家的完全独立。

应阿利敏的请求，联共（布）中央允许在二战前就是共产党著名活动家的慕梭返回印度尼西亚。按照联共（布）中央的想法，慕梭应该研究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形势和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的共产党并掌握党的领导权。按照联共（布）中央的设想，重建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应该使用政治斗争手段逐渐地、以和平方式在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国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慕梭的报告令苏联对外政策部领导人不知所措，慕梭表示，他承担着“伟大使命”，不只是重建和领导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还要带领它取得决定性胜利。

文件证实，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其他左派力量静悄悄地发动了反苏加诺政府的事件，不是根据莫斯科的指示，而是完全出乎莫斯科的意料之外。其结果导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崩溃，许多共产党著名领导人——包括慕梭殒命。

尽管遭受沉重打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很快得到重建。20 世纪 50 年代初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制定战略和策略方面，斯大林起到了领导和导向的作用。领袖亲自修改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纲领文件，深入研究了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进行了会谈，提醒他们不要冒进。

斯大林的建议成为艾地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战略和实践活动的基础。在斯大林指示的基础上制定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章程和纲领，其效力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未发生改变。拒绝这些章程和纲领、加入苏加诺总统的政治冒险，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再次遭受覆灭的危险，离开了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舞台。



斯大林和印度尼西亚

1945~1953年苏联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不为人知的一页

最新披露的联共（布）—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文件和资料揭穿了20世纪一个关于苏联的谣传：1945~1953年苏联基于冷战的需要而支持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事实上，是印度尼西亚方面主动向莫斯科提出建立外交关系，其真正目的是借助苏联成为联合国会员国。1950年9月苏联支持印度尼西亚加入联合国后，印度尼西亚开始刻意回避正式建交。对此，苏联不仅依然采取友好立场，而且斯大林一向认为“亚洲是中国的活动范围”。



世界知识出版社官方微信



“一知”官方微信

上架建议 国际政治 ■ 冷战

ISBN 978-7-5012-5189-6



9 787501 251896 >

定价：32.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丛书 斯大林和印度尼西亚 1945-1953年
苏联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 不为人知的一页

作者=(俄)叶菲莫娃著

页数=152

SS号=13968967

DX号=

出版日期=2016.05

出版社=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